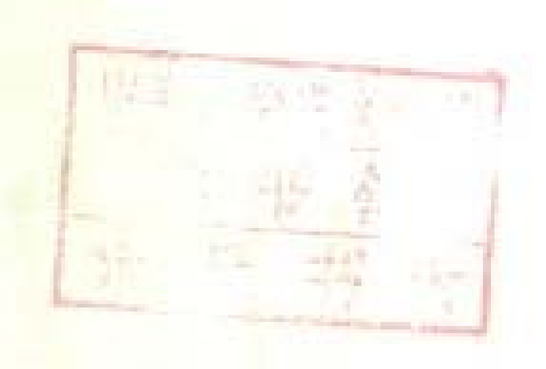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祖国在危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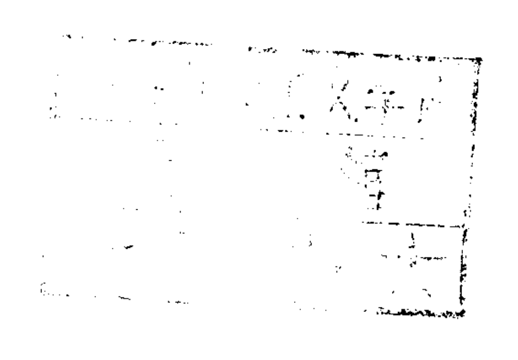
〔法〕奥·布朗基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祖国在危急中



〔法〕奥·布朗基 著

顾良 冯文光 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祖国在危急中

〔法〕奥·布朗基 著

顾良 冯文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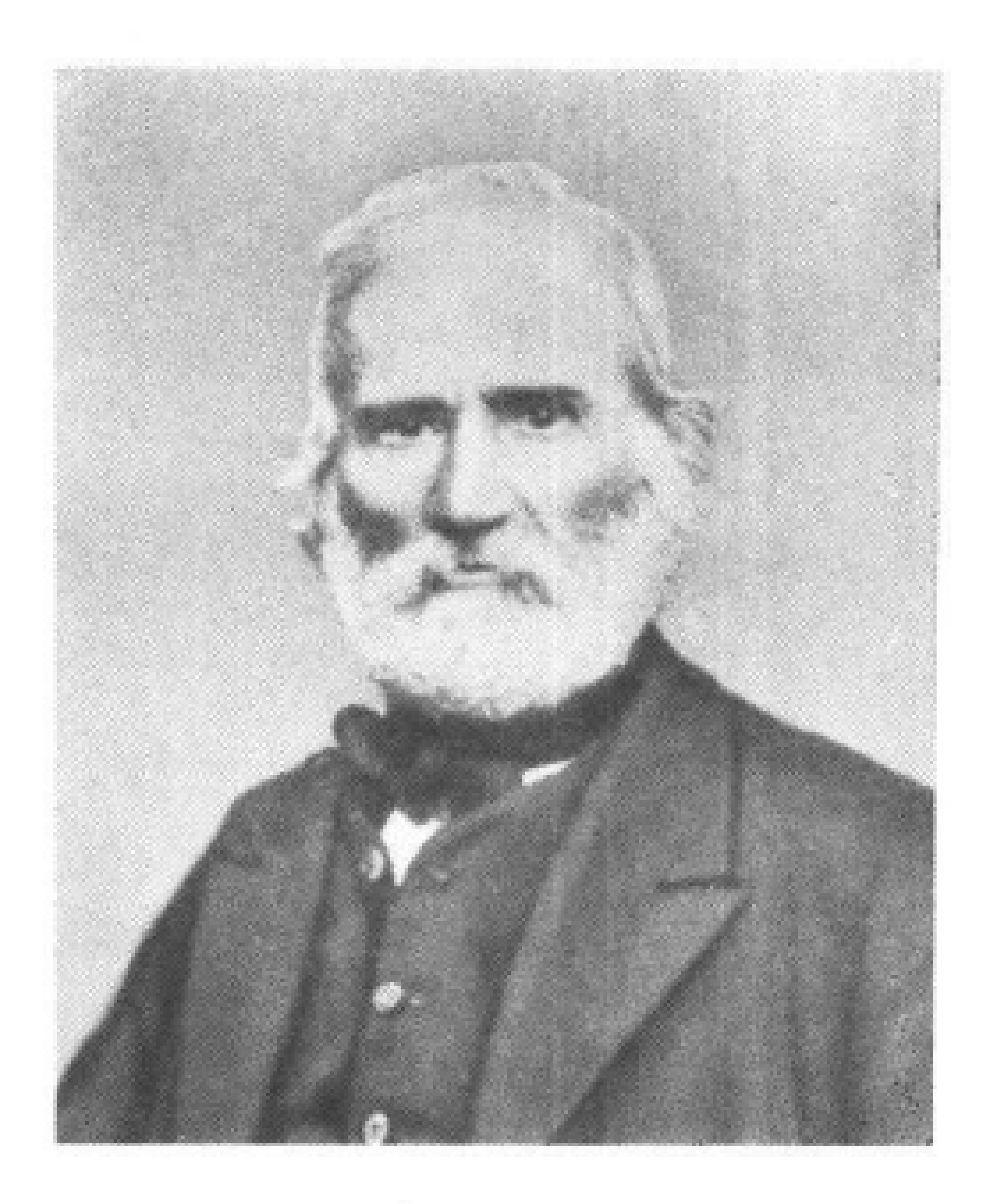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3017·266

1980年3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2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195千

印数10,900册　　印张8 1/4 插页5

（60克纸本）定价：1.05元



布 朗 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 年和 1982 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 年 1 月

译者的话

谈起布朗基，人们往往想到布朗基主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布朗基主义无非是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而行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布朗基主义者曾干了许多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蠢事，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种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思潮具有欺骗性，因而在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往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敌人。但是，对于布朗基本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历来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①，“无可怀疑的革命家”②。这似乎是个矛盾，其实不然，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等同起来。

毫无疑问，布朗基一生曾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应该进行历史的分析，因为布朗基是时代的产物。当时，法国工人阶级虽然“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③，但在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法国主要地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难免要在革命的领袖人物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在这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指出的，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④。

即使在布朗基在世的时候，他本人和布朗基主义者也是有区别的。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正确指出：“布朗基的革命本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45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0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2页。

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① 确实，布朗基所特有的革命家的品德和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始终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辈，为了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翻译了布朗基的《祖国在危急中》，并写了一篇布朗基传略，附在书后。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承蒙王锡君、刘　焱、顾家庆、殷叙一等同志大力协助，顺致谢意。

译　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89页。

目　录

序

这是一部充满忧伤的书。

这部充满忧伤的书是一位殉难者写的。

本书各篇发表在普鲁士的隆隆炮火声中，言简意赅，只要读上几行，人们就会感受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这种痛苦似乎仅仅出自一种预感，但它是来自确切可靠的经验。

因为，付出一定代价所取得的经验，能使人们具有洞察、预见和先知的本领；在历史上各个时代，曾有少数几位杰出人物真正掌握了这种经验，本书作者也许是其中最可靠的一位。

九月四日事件①后，本书作者立即看清了那些肩负拯救祖国重任的人的真面目，根据他们最初的所作所为，他预料到了他们最后的行径。

逻辑的推论！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重重的压迫和迫害下——作者在一生中，始终光荣地承受了这样的压迫和迫害——，作者日复一日地写下了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篇章；今天读起来，祖国经历的种种惨状犹历历在目。

命定的结局，阴险的背叛，把人民出卖给国王，这一切的一切，

① 1870 年 9 月 2 日，法军在色当被普军击溃，拿破仑第三被俘。9 月 4 日，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国防政府。——译者

都活生生地、有血有肉地出现在本书中；可惜呀！可怜那崇高的巴黎竟没有懂得阅读这些每天刊登在小报上的文章；今天，在这局势再一次令人感到担忧的时刻，正当法国军队代替了普鲁士人，又把炮弹从高地打进巴黎城墙的时候，我们重读这些坚定不移的文章，再一次看看这帮依靠帝制为生的强盗和杀人犯如何压制人民的命运，确实是十分富有教益的！

本书所收文章摘自《祖国在危急中报》。

这些文章是在火热的环境中随手写就的，如果能加以修饰和压缩，当然更好。由于需要重申一个相同然而又是不可缺少的思想，有些句子难免重复。但是，和每篇文章所得出的惊人的真理相比，这也就不值一提了。

怎么，这些文章是在十月，甚至在九月写的！早在十月，您已经在说垂死的挣扎！

怎么，就在谁若是对胜利流露一点怀疑，全巴黎都要他脑袋的时候，您早已预料到了灾难！

为了这些预见、建议、请求和愤怒，您遭到了如此激烈的攻击和诽谤！……

为了要把出卖祖国的这些混账家伙们打发回俾斯麦那里去，您被判了死刑！

可怜的人，您永远是受害者！您的命运是多么不幸，但又是多么崇高！

我们知道此人的一生，我们了解他，在他的神话般的经历面前，我们确实佩服得五体投地。

至今没有人敢于或能够写出他的历史！

布朗基是个完人。

他是泰伦斯[1]笔下的男子汉，尤维纳利斯[2]笔下的大丈夫，他既是人又是公民。

在他的身上，首先引人瞩目的是他的坚毅、镇定和刻苦，使人确信无疑地感到他是一个百折不回的人，是一个贺拉斯[3]所说过的那种坚守志向的人；他是一个始终坚信自己的信仰，即使葬身于世界废墟之下也无所畏惧的人……天塌下来也许会使他吃一惊，但决不能把他吓倒。

布朗基实际上是用头脑生活的。他的一切全都集中在那里。

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面对着社会问题，他立即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可是在新世界的大门口，有一只无情的斯芬克斯[4]，谁走到它的面前而又不能猜中谜语，就会被它吞食掉。

布朗基很快懂得，在这场决死的斗争中，必须准备丢掉脑袋；从那天开始，他就把生命置之度外了。

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充分的准备。

确实，历史可以见证，在一八二七年，他才二十一岁，就在

---

① 泰伦斯（公元前190—159年），著名的拉丁文诗人。——译者

② 尤维纳利斯（公元60—140年），著名的拉丁文诗人。——译者

③ 贺拉斯（公元前65—8年），著名的拉丁文诗人。——译者

④ 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它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就被它吞掉。——译者

街垒上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脖子；一八三九年，他被判处了死刑；后来，被流放到蒙圣米歇尔岛、贝尔岛、杜朗；随后又被送到非洲。他总是受压制，受迫害，被流放，然而他反抗更加激烈，斗争更加英勇。

我们看到，在一八七〇年，他参加了十月三十一日事件；在一八七一年，参加了一月二十二日事件。几天以后，他的名字在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又一次出现，他第二次被判处极刑。

他的整个一生就是如此。从斗争开始直到现在，他永远坚定不移。

他将坚定不移，直到死去。

看到布朗基的百折不回的坚定性和始终如一的勇气，人们可能以为他是一个敢于冒险、勇于作战的斗士。

错了！……他首先是勤于学习的人，是思想家。

不过这位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英雄。

事实上，很少的斗士能像他那样努力研究、思考和探索，很少的斗士能像他那样善于学习、刻苦地思考和研究。

他的深刻、敏锐而又自信的思想足以剖析问题，洞察事态，扭转局面。这种奋发学习的精神使他赋有——我们已经说过——某种新的官能：预见；而这种预见，归根到底，无非是推断的正确。布朗基能由此而及彼，得出结论。论据的基础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前提始终是无懈可击的，得出的推理，即判断，也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在面临某种局势时，由于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布朗

基能够超脱并控制局势。

因为布朗基——请允许我们借用这个古老的比喻——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巧匠，而且是掌握着一切最完美工具的巧匠。

布朗基是一位学者。他是数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他的头脑里有整整一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是特别严肃的，因为布朗基已经想到了从中排除掉低级学者们在公众面前用以炫耀自己的华而不实的陈词滥调，而这些东西只能搅乱人们的思想，此外毫无用处。

因此，布朗基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物。他以永恒原则作为他立论和思考的基础，他是能够应付各种局面的人物。

他的敌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布朗基是革命派中最完备的政治家；对他很了解的蒲鲁东常常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以上谈的是政治方面。

他的私生活也许更不寻常。

这位穿着红色服装的杀人凶犯，极其普通、憨厚、坦率、温和、亲切——一种毫无拘束，有时显得粗犷，但却十分真实和持久的亲切——，这样的品格简直举世无双！只要同他有过一次亲切的会面，人们就可以感到，在他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几乎是冷淡的外表后面，有着对于一切受难者和战斗者的真正关切。

因为，我们要说，布朗基不仅是个诚实的人，而且是完美无缺的人；这位典型匪徒的诚实是如此的真实，因而他周围的人从来都

是诚实的朋友，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此外，他的俭朴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是当代的辛辛纳图斯①——这个称号对他是最恰当不过的——，他不知道什么是肉体的快乐。再说一遍，他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在头脑里。

由于铁窗生活养成的习惯，孤独简直成了他的一种需要。在随便一间小房间里，他考虑、研究和思索。

他按时用一点粗茶淡饭，总是那么几样，蔬菜、牛奶和水果。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人肉，喝过人血。

当人们看到这个身体瘦弱、面目清秀——温和而带讥诮——的人的时候，人们真是难以相信，他竟是一位具有惊人生命力的人物。

他的一位囚房难友是这样谈到他的："我们上百次地看到他躺在专为他设置的可怕的牢房深处，半死不活地忍受着痛苦和创伤的折磨，突然因为头脑中闪现一个思想，他站立了起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富有生气和热情。"

这位囚房难友接着又说："只有一次，他的内心为激情所冲动。这次感情冲动使他的头发都变白了。他的庄重而又勇敢的妻子去世了，他为此流下了痛切的眼泪，也许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我们看到他在一个月内为痛苦而形容憔悴，几乎精神失常②。"

因为布朗基深得他的妻子、母亲和姐妹的疼爱，正如他受到一

---

① 辛辛纳图斯，罗马人，生于公元前 319 年，以生活简朴闻名。——译者

② 这里，我们不禁要引用布朗基的一段雄辩的文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永远铭刻在心头的痛苦：

"在我的同伴中，有谁像我那样喝干了忧愁的苦水？在一年里，我的爱妻远离着我，奄奄一息，在绝望中死去；然后，又是整整四年，我在牢房中孤身一人，始终思念着

切了解他的人的喜爱一样。

他现在只剩下两个姐妹和一个同她们一样值得尊敬的兄弟。但是，军事法庭的判决和监狱大门把布朗基和他的兄弟姐妹隔开了，梯也尔先生甚至不顾这些家属的痛苦，拒绝把监狱的大门哪怕打开一个小时。

布朗基从一八二七年开始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是的，正是他的高贵品德，正是他的毋庸置疑的权威，正是他的天才以及他的忠诚和老实的品格所赋予他的惊人力量，才给他招来了狂暴的冲击，使他成为别人发泄仇恨和愤怒的对象。

因为，在现今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类演员：社会主义共和党人，他们是少数；保皇党人；还有一帮形形色色的共和党杂种，他们的带有弹性的理想可以同样轻易地从儒尔·法夫尔跳到甘必大，从梯也尔跳到特洛胥，从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跳到一八七〇年九月共和国。

这些投机的共和党人，当然自称是君主制的敌人。

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搞掉某个王位，例如他们搞掉了路易—菲力浦的王位。

不过，在被推翻的王位上，他们又安上了一个由普选而产生的

故妻的亡灵：这就是我——唯独我——在这但丁的地狱中所受的苦难。我出狱时已是白发苍苍，身心俱裂！我这个可怜的幸存者，衣衫褴褛，拖着受伤的躯壳在街上游荡，被人指骂为卖身投靠的小人，而那些路易—菲力浦的仆从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共和主义的彩蝶，在市政厅里熙来攘往；这些饕餮之徒满口仁义道德，训斥刚从他们的主人的监狱中脱身的可怜的穷光蛋！”

庸碌人物。

这位新主人，他们把他叫作共和国总统，并在墙上写着：自由、平等、博爱。

总之，这些人都自称为共和党人；不幸的是，由于不断地重复这个神圣的名称，他们最后也许真的相信自己就是共和党人了，并且他们无论如何总是使大家都相信了这一点。

他们是共和主义者，但仅此而已，他们决不赞成社会共和国。

他们要搞的革命仅仅是政治革命，也就是说，是不全面的、不现实的革命，是欺骗。

这些误入歧途的资产者，无论他们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出身，他们对于那些他们平时称之为社会党人，而在发怒时称作共产党人的贱民们，感到深恶痛绝；而他们对于那些真正革命的社会要求，则用枪弹来回答。

他们就是六月共和党人。

可是，这些无情的死敌人数众多；正因为他们打着共和党的招牌，所以他们对付平民的确是有力的。

现在请大家设想一下，在人民的行列中，即在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共和党人的少数人中间，出现了一位人物——我想说的是一股力量。

假如他具有足够的智慧，能提出彻底解放人民的要求，假如他有足够的意志去进行这样的尝试，假如他有足够的魄力去完成这项事业。

最后，假如他具有必要的品德、天才、诚实、学识和忠诚，总之，

假如他十分全面，因而能在群众中树立起权威。

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保皇派——正统派、教会、奥尔良派、宪章派、波拿巴派等等——将对他群起而攻之。

共和党人——那些我们称作六月共和党人的人——将站在保皇派的一边。

那是秩序和自由的十字军征讨！

在一声号令之下，诽谤、咒骂、侮辱将像可怕的雪崩似地向这位改革者压来，嘲笑、指责、谎言和污蔑将交织成一个无边无际的火网，一股猛烈而又一致的反动潮流将向这位改革者扑去，于是人民——永远是无知的，也就是说，永远是受害的人民，——最终只得在无耻的判决面前俯首听命。

虽然改革者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名誉和友谊，牺牲了他能够享受到的一切的快乐和未来的幸福，但是即使你为此向人民提出责问，那也是徒劳的。人民将固执地回答说："每个人，甚至共和党人，都说他有罪。"

唉，这就是永恒的历史！这就是所有人民的敌人怎样互相配合，共同制造出这个令人奇怪的反对布朗基的神话的经过，而这个神话至今还没有被击破。

为了制造这个神话，敌人们花了不知多少时间、耐心、功夫、心血和计谋；只有那些有幸真正见到过布朗基的一生和他的赤胆忠心的人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敌人的谎言、花招，卑鄙的捏造和恶意的杜撰。

我们今天不准备回溯布朗基过去的生活了。

我们总有一天会谈到，在这段经历里，曾经有过多少为人们所不知道的忠诚、牺牲和痛苦。

让我们暂且把布朗基在蒙圣米歇尔岛、杜朗、贝尔岛、科尔泰和非洲的流放生活放在一边，赶快来阐述《祖国在危急中报》向我们展示的那个黑暗时期。

第二帝国末年，布朗基受到了波拿巴警察当局的残酷迫害和不断追捕；对于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警察当局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于是布朗基到比利时避难去了。

帝国在摇摇欲坠。

这是彻底垮台的开始。陈旧的机器齿轮已经看得出在松动了。

显然，瓦解已经不可避免，崩溃已经肯定无疑。

帝国刚刚掉进了一个险恶的陷阱，与此同时，它把祖国也拖了进去。

帝国已经向普鲁士宣了战。

可是，这场战争，普鲁士已经准备了四年。

普鲁士手中有强大的军队，用之不尽的物资，聪明的将军，深思熟虑的计划，还有金钱。

而法兰西，经过十八年的帝国统治以后，已经民穷财尽，满目疮痍；在她被硬拉进这场不幸的蠢举时，她的军队涣散，物资不足，一些可悲的奴才们冒充当了将军，参谋部里塞满了奸细。

因此，在同普鲁士的第一次交锋中，法兰西就垮了一半。由无名英雄组成的法兰西军队在风暴中节节失利，因为这支挨饿的、被分割和被出卖的军队，掌握在那个哭丧着脸的混蛋手里；这个混蛋，我们的父兄称他为十二月杀人犯，我们叫他是色当的投降者。

布朗基已经看到了危险。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法兰西及其剩下的军队从这个杀人狂那里夺过来。

那伙由于误会才上了战场和戴着金色肩章的强盗走狗们把祖国半死不活地放在了敌人的“靶床”上，必须唤醒祖国，让她重新振作精神，在一七九二年的马赛曲歌声中、在热迈普①和弗勒律斯②的共和主义旗帜下胜利前进。

必须推翻帝国。

推翻帝国吗？不，或者最后助帝国一臂之力；或者把各种政府机构夺过来，派人去组织残余的军队以争取胜利，并对他们说：共和国命令你们打败敌人；或者广泛地发动群众，并通过全国人民的奋起抗战，彻底消灭外国侵略军。

布朗基来到巴黎。

---

① 1792年11月，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在热迈普同奥军进行会战，法军取得全胜。——译者

② 1794年6月，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在弗勒律斯同英、奥、普、荷等国联军进行大会战，把敌人完全击溃。——译者

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一小批富于热情和幻想的人们，他们为着一个空想而兴高采烈地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空想在他们牺牲后不久，就已经成了现实；正是他们，在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四日向帝国发动了冲击。

这就是拉维叶脱事件。

一场革命无非是普遍愤怒的总爆发和结果。

可是，在当时，愤怒还不普遍。

永远是天真的人民还希望发生奇迹般的转折，然而这样的转折是不可能的，只能成为人们的笑柄。

人民落后了十五天时间。

拉维叶脱事件的策动者因而遭到追捕，有些人被关进了监狱，有些人被判处死刑，他们全都受尽了诽谤、污蔑、侮辱和践踏。

十九天以后，人民终于一致奋起了。这场斗争如果在八月十四日得以成功，也许能挽回局势，然而，它在当时却遭到了人民的谴责和拒绝；而现在，人民通过一场为历史称之为革命的起义，漂亮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布朗基又一次事先估计到了形势的发展。

帝国已经死去，布朗基又着手工作。

需要向人民指明方向。

需要向人民指出，应该达到什么目的，采取什么手段以及避开什么暗礁。

他拿起了笔并创办了《祖国在危急中报》。

人民已经接受了那些代替波拿巴当政的人们。

布朗基了解这些人，知道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但是这些人发出了拯救祖国的庄严誓言。他们向法兰西宣了誓。他们自称是国防政府。布朗基答应，在他们履行自己的诺言的条件下，给予他们全力的支持，但是保留了在适当时机施行检查、批评和监督的权利。

本书正是在九月四日至十二月八日巴黎被围困的这三个月内写成的。面对新主人们的所作所为，布朗基在本书最前面的几篇文章中，揭发了他们初期的卖国行为，指出了这个国防政府把法兰西置身于可怕的绝境，这个政府在向人民作出保证以后，却对自己和对敌人发誓，它决不保卫我们。

当然，巴黎现在知道了这些人安的什么心。但是，在布朗基怀着满腔痛苦进行揭发他们的时候，巴黎就应该看到布朗基所预料到并逐一加以揭露的保皇党阴谋。

这个保皇党阴谋，我们几个当时有幸在布朗基身边的人也看到了……

此外，还有一些和我们殊途同归的人也看到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们都在场。

我们以后再谈十月三十一日事件的经过。我们这里仅仅要说，在那个使人民有可能赎回祖国的历史性夜晚，布朗基是唯一能胜任其任务的人。

但是，决心要出卖共和主义法兰西的九月四日政府不可能不

背弃他们向人民当面许下的诺言。

他们果然背弃了诺言，而布朗基不得不隐藏了起来；由于他要使这个也许是历史上最可耻的背叛不能得逞，布朗基在三个月后光荣地被判处了死刑；他在当时再次受到了迫害、追捕，受到了那些今天已经跟着九月四日的恶棍们逃到凡尔赛的黄色小报的空前诽谤。

布朗基重新拿起了笔。

但是卖国已到了最后阶段。波拿巴曾经在色当演了第一幕的戏剧，现在巴赞① 在麦茨演完了第二幕。

普鲁士的炮弹在巴黎城内爆炸。人民饿得奄奄一息，而国民自卫军在特洛胥预谋的最后一次失败中，在比桑瓦耳平原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投降已经接近。

布朗基看到了这一点。

十月三十一日事件的几名参与者集合起来了。

他们发动了一月二十二日事件。

阴暗的日子！……我们大家事先有一种不幸的预感。我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向人民开枪射击的回响……

---

① 巴赞（1811—1888年），法国元帅，普法战争期间任法军总司令，他率领十五万法军，被围困在麦茨，于1870年10月27日投降普军。——译者

布朗基也感觉到了。但是，这次最后的尝试也许还能有成功的一线希望。

布朗基来了。

在交出巴黎以前，九月四日政府为布列塔尼酒徒[1]手中的沙斯波式步枪装上了子弹。

他们向人民开枪射击。

六天以后，巴黎总督投降了。

投降书一签字，军事法庭就判处布朗基死刑；三月十七日，布朗基在菲热克被捕，在零上两度的冷天，拖着有病的身体，被押进了监狱。

从那天起，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任何人，甚至他的家属，都无法知道他在哪里。

对于像他这样的囚犯，人们是特别注意看管的。

瞧，竟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岂不是奇怪的命运，可怕的故事吗？

怎么，居然有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交给了人民，他在开始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就知道将会遇到悔恨、幻灭、困难和痛苦！……居然有这样一个人，他在生命的六十六年中，有四十五年在监狱和流放中渡过。——并且，这是什么样的监狱呀！杜朗的掩蔽部，贝尔岛的木笼，蒙圣米歇尔岛的闷罐，以及

① 指布列塔尼别动队，特洛胥的亲信部队。——译者

种种酷刑和中世纪式的迫害！居然有这样一个人，他到了六十六岁的年纪，好容易才把已经答应交给刽子手的脑袋救了出来，又把它交给了共和国！这个人如果能再次逃脱苦难，如果有必要的话，将再次把自己的脑袋交出去……这个人在度过这可怕和苦难的一生以后，还准备向更高一层的十字架攀登，只要那里有人民的事业需要保卫。而现在，他被关在那根据他的身材所准备的黑牢里，甚至不能知道共和国是取得了胜利，还是在宪兵们的扫射下倒了下去！……或许人们已经把他枪杀在一个角落里，或许人们把他关在坟墓般的地牢里，慢慢地折磨致死，而他在死的时候，也许不能够同爱他的人最后一次握手，却听着他所反对和揭露的人对他的最后一声辱骂，或者最后被他为之牺牲自己的那些人们所遗忘！

可怜的人民！可怜的群众，愚蠢而又高尚的群众！……你们永远自愿受害，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错误首先要归于你们？你们真是不明事理，你们张着耳朵听那些以剥削你们为生的人的污蔑诽谤，而闭着眼睛不看那些热爱你们的人的英勇献身。

这种状况，在那献身的勇士活着的时候始终如此，只是在他死了以后，才把他送上人民的祭坛。

啊，人类！

再说，就在我们荣幸地握着布朗基的手的最后一天，他激动地满怀着信心对我们讲："必须重新开始。必须重建共和党！"

经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以后，依然满怀希望！……经历了这么多的失败以后，依然信心百倍——这难道还不足以判断一个人吗？

卡西米尔·布衣

发 刊 词

大敌当前，不应再有党派之分。

背叛民族的旧政权，不能与之合作。

九月四日伟大运动所诞生的政府，是共和主义思想和全民抗战的代表。

这就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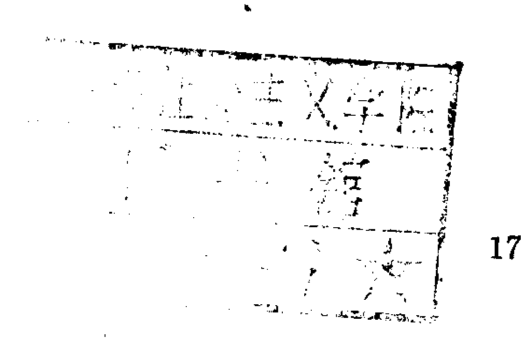
应该消除一切对立和矛盾，共同救亡。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普鲁士人以及他们的同伙——企图依靠普鲁士人的刺刀在巴黎建立秩序的旧王朝的拥护者。

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谁再为个人打算，心怀二意，就将为天地所不容。

只要政府依然维护共和制度，和我们一起同巴黎共存亡，而决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和割让法兰西的领土，我们愿意抛开一切个人之见，无条件、无保留地给予临时政府以最坚决最充分的支持。

巴尔桑，布朗基，卡西米尔·布衣，布勒叶，布里多，卡里雅，爱德，弗洛特，爱·戈阿，格朗热，拉康布尔，爱特·莱弗罗，莱翁斯·莱弗罗，皮尔斯，雷尼亚尔，苏尔，特里东，亨利·弗尔莱，埃米尔·维尔纳夫，亨利·维尔纳夫。





巴黎的防务

1870年9月7日

共和国宣告成立了。法兰西恢复了呼吸并且苏醒了。她从此摆脱了恶梦——慢慢地掉进万丈深渊，而又手足被缚挣扎不了，那是多么可怕的恶梦啊！法国军队的覆灭使法兰西获得了解放。法兰西虽败犹胜！普鲁士将在它的胜利中被埋葬。

让法兰西无愧于为着我们的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战士们！让共和主义的巴黎首先来报答他们的殉难！

不要再夸口！不要再幻想！不要再自我陶醉！专制主义的谎言终于不能再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不，我们并没有取得节节胜利，所谓节节胜利是厚颜无耻的帝国政府① 对我们的欺骗。不，普鲁士人并没有失败，否则他们决不会如此迅速地由维桑堡推进到圣德尼平原。

我们在博尔尼②、格腊韦洛特③ 和圣普里瓦④ 都吃了败仗。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寡不敌众。谁是造成这种众寡悬殊的罪魁祸首呢？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用二十五万人去同六十多万人作战的

---

① 指第二帝国政府。——译者

② 博尔尼位于麦茨以东。这里指1870年8月14日发生的博尔尼战役。——译者

③ 格腊韦洛特位于麦茨以西。这里指1870年8月16日发生的格腊韦洛特战役。——译者

④ 圣普里瓦位于麦茨西北方。这里指巴登率领的莱茵军团在格腊韦洛特失败后又于8月18日在圣普里瓦失败。历史文献上往往把这两次战役合并称作圣普里瓦战役。——译者

波拿巴。这就是他为什么把我们的失败说成胜利的原因。

应对错误负责的不仅是波拿巴一个人。还有那些惯于大吹大擂的卖国贼，他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对我们阿谀奉承，用以麻痹我们的警觉。他们过去说，我们是不可战胜的。现在又说，巴黎是攻不破的。可是，正如我们不是不可战胜的一样，巴黎也不是攻不破的。

大家要警惕呀！如果我们再次过份地自信，我们就会毁灭。人们一再说要把普鲁士人埋葬在我们的田野里，一再说决不让一个普鲁士人活着回到德国。群众对于迟迟不能实现的诺言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要求早日见到分晓。谁胜谁败，决不能靠说大话和吹牛皮，而要靠兵力、武器和勇气。首都的工事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坚固，却成为今天肆意吹嘘的题材。过于轻信的人们竟把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谎言都信以为真了。

敌人并没有上当。人们可以蒙骗我们，却骗不了敌人。敌人对我们的城堡、堑壕和炮台了如指掌，并且确切地知道他们需要用多长时间和多少兵力就能夺取这些工事。

炮台、小五面堡或四面堡，都经不住一次猛烈的炮轰。普鲁士人有几种进攻方式可以选择：集中部队于城周围的四分之一的战线上，而置其它于不顾，以堑壕掩护自己的侧翼和正面阵地，同时向三个堡垒掘壕推进，直至城墙；或者实行远距离包围，以阻止外来的救援，使要塞城市陷于饥馑。

第一种办法收效要快得多，而且在巴黎四周几乎所有的位置上都可以施行。在拉布里什堡垒和蒙瓦勒里安堡垒之间，有一片十三公里宽的开阔地，没有任何防御设施。围城部队在阿尼埃尔的掩护下随时可以开始挖掘工事，先越过村庄，然后渡塞纳河，安全穿过克里希，直插巴黎城下。

从维耳纳夫—拉—加勒内到库尔贝瓦一段，敌人可以在库尔

塞莱、克里希或圣乌昂的掩护下，在任何地点渡河并随后向城墙挺进。我们正在阿尼埃尔附近修筑土质工事，以资补救，但是这个办法不足以解除危险。

在蒙瓦勒里安和伊西堡垒之间，敌人如在塞夫勒修筑工事，就能进逼城墙西南角。只要压倒伊西堡垒的火力，这条进军路线是稳妥可靠的。整个十七区和十六区的大部分几乎毫无屏障，处境十分危急。

巴黎人以为在堡垒的保护下，不会受到轰击。这是极大的错误。从梅宗到克拉马尔一线，位于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的敌人可以不受堡垒的干扰，以村庄或堑壕作掩护，随意配置臼炮，并把炮弹打到河左岸各区。同样也可以打到河右岸的十六区、十七区和十八区。

在巴黎，人们以为大炮的射程为六千米，但是有的大炮的射程达八千米、一万米，甚至更远。这些大炮的炮弹可以飞越堡垒的上空，直达巴黎市中心。例如从维耳茹伊弗发射，炮弹可以打到蒙马特尔林荫道。

自从重炮发明以后，巴黎只有在堡垒前沿的远方，沿着巴黎地区的四周，建筑起巨大的工事体系，才能免受炮火的轰击。但这些工事却一点也没有，而现在着手如此巨大的工程，也许已为时过晚。

难道巴黎就不能抵抗了吗？当然不是。但抵抗是困难的，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夸夸其谈和傲慢自大都无济于事，有百弊而无一利。

现有的工事至多只能起些辅助作用，不可过于信赖。真正的办法是俄国人在塞瓦斯托波尔采用的战术①，夜以继日地用铁镐

① 1853年至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土三国联军围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俄军采用工事防御战，从1854年9月至1855年8月进行抵抗，使三国联军久攻不克。——译者

进行战斗。唯有采取进攻性的防御战才能拯救巴黎。必须以进攻性更强的对抗工事来对付围城敌人的工事。假如他们的工事向前发展二十米，我们就向前发展四十米。

进攻的迹象一旦出现，我们就要集中强大的炮火，在炮火的掩护下掘壕前进，以便夺取土地，构筑多面堡，并立即设防。只要我们极大地扩展要塞的范围，我们就能够在各处与敌人势均力敌地作战，并通过堑壕和炮火发动攻势。这是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

但是，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巴黎需要有五十万名士兵。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用相等的兵力和优势的炮火同普鲁士人展开一场持续的战斗。然而，我们现有的真正能作战的士兵不足二十万。

必须颁布法令，征召十六岁至六十岁的全部男性居民参加军队。在十六岁至二十岁的青年中，选拔八万精兵。要征召一八四八年的别动队① 重新入伍。

巴黎能够在四十八小时内征集四十万人入伍，再加上塞纳省以及其它邻近各省的别动队、现有的正规部队和水兵，就会有六十万名士兵来保卫首都了。

枪支是否够用呢？我不知道。要把法国各地军火库的武器由铁路迅速运到巴黎；兵力和武器不应分散使用，而应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地点集中使用。有巴黎在，就有法兰西在。普鲁士人完全是靠兵力优势赢得胜利的，巴黎应该把这个优势夺回来。

此外，巴黎能够不停地铸造大炮，制造多管炮② 和枪支，以补充战斗中的消耗。政府应该向英国、美国和其它各国购买雷明顿步枪③，以便武装外省。

---

① 别动队或称流动国民自卫军，是由那些没有服现役和预备役的适龄应征人员组成，其使命是担负边防、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译者

② 是一种装在沉重的炮架上的多管连射武器。——译者

③ 一种后膛枪，因其发明者而得名。——译者

因此，建立庞大的城防军，把居民组织成工兵营，既用枪打仗，又用镐修筑工事，这就是我们必须日夜不停地从事的工作。

敌人在迅速逼近，而巴黎依然睡眼惺忪。必须唤醒它，使它警觉。巴黎受了大言不惭的报刊的蒙蔽，不了解危险的严重性。巴黎过于自信。自信是件好事，但是发展到了自我陶醉的地步，就会致命。

让大炮的报警声宣告祖国在危急中。我们应该明白，不是获得新生，就是走向灭亡。

1870 年 9 月 9 日

在这危机深重的时刻，巴黎人民表现出空前的伟大和忍让。他们把一切怨愤都抛在一边。从前唯一能够激起巴黎人民热情的革新思想，今天在巴黎人民的心目中已失去了它的地位。

战斗到底，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拯救巴黎和法兰西，这就是巴黎人民坚定不移的宗旨。他们再不能容忍谈论别的事情了。他们充满了狂热的牺牲精神。只要政府率领他们去打普鲁士人，他们就服服贴贴地、盲目地跟着政府走。

然而，巴黎人民对于政府的任何一点软弱和犹豫的表现都感到愤慨万分。他们开始产生一种模糊的不安感觉。他们历来对报刊上的爱国主义热忱信以为真，而现在看到的却是行动落后于言词。他们在怀疑，也许是自己搞错了或者是自己缺乏耐心。总之，不信任感已经露了头。

他们感到担心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当局对巴黎的近卫队①和警察的问题迟迟不作决定，以及明显地不作抗敌的准备。

为什么不遣散原来的警察部队呢？四、五千名穿着便服的警

① 1830 年七月王朝政府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在巴黎建立的军事化警察部队。——译者

察比他们穿制服的时候更加令人害怕。如果他们采取敌对态度，危险将更加严重。此外，兵营里的市近卫队也是个威胁。就是那么温和的二月革命都把他们遣散了，现在为什么不把他们并入正规部队呢？

人们也强烈地担忧着武器不足，由于新政权对此默不作声，更使人们疑虑丛生。有人说，军火库是空的，大炮也残缺不全。为什么不说明有关的全部真相呢？沉默已不合时宜了。有人居心险恶地以不让敌人取得情报为借口，卑鄙地欺骗了法兰西。今天是必须说话的时候了。

人民感到不安的是，一方面听说枪炮不足；另一方面却亲眼见到军火工厂不开工。巴黎有大批大工场，里面的机器设备完全有能力改装旧枪，制造沙斯波式枪①、多管炮和大炮。

可是，这些工场都不开工。有些工场已经关闭，有些接近关闭。没有一家在造武器，尽管机器完全能够用来造武器。为什么呢？人民要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大声疾呼地提出这个要求。

同样使人民感到十分忧虑的另一个原因是几乎不构筑工事。可惜，群众对这方面的问题一窍不通，无法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也不知如何是好。

人们用空话来敷衍群众，吹嘘堡垒和城墙的炮火如何强大，而群众则呆呆地听着。事实上，堡垒简直是些纸糊的盒子，大炮轰上几天就可以彻底摧毁它们。

城墙发挥不了作用。炮弹的发射路线被阻拦住了。首先必须夷平文森和布伦的树林，这还容易办到；其次要拆掉城墙和堡垒之间的房屋，这在当前是绝对做不到的。我甚至怀疑，无论如何，人们

① 一种后膛枪，因其发明者而得名。——译者

也不能下决心把所有这些人口稠密的市镇牺牲掉。

你们想想，在右岸区要夷平阿尔福尔、沙拉顿诺、孔弗朗、沙拉顿、圣莫里斯、圣芒代、文森、外夏隆、巴尼奥莱、蒙特勒伊尔、封特内一奥一布瓦、罗马维勒、圣约尔维、邦丁、奥贝维利埃、圣乌昂、克里希、库尔塞尔、讷伊、维耳埃、勒瓦卢瓦、普安一迪一儒尔、比朗库尔，以及布伦树林中的高大树木。

在左岸，要夷平的是伊西、旺韦、外蒙鲁日、冈蒂利、阿尔居埃、比塞特尔、伊弗里！要毁掉这么多的村镇，这简直不可想象！

但恰恰是这些在城墙和堡垒之间的建筑群使城墙上的炮火陷于瘫痪，而有利于敌人向我们逼近。

原炮兵军官布律内先生在这方面十分内行，他在《世纪报》①发表的一篇十分清楚的文章中全面地阐明了这种危险。他建议在这些市镇的出入口修筑工事，以减弱这种危险。可是，他应该懂得，这个软弱的补救办法只能略为减慢围城敌军的前进速度，因为敌军将始终受到大批民房的掩护。

这样的缺陷在一八四〇年还没有现在那么严重。那时大炮远没有现在那么大的威力。城墙四周的两个外围地区假定拆掉房屋的话，比较靠近的那个地区有六百米宽，等于多管炮的有效射程；较远的那个地区有一千二百米宽，等于臼炮的有效射程。

我刚才说假定拆掉房屋，是因为一向只禁止在第一个地区，即在六百米的距离内建筑房屋。而在第二个地区，人们可以随意建筑。尽管在第一个地区有不准盖房的禁令，人们照样还是盖了，因为在那时，巴黎的被围困似乎只是某种幻想。工兵也不加阻止，只保留了在需要的情况下收回土地的权利。

六百米的距离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呢？等于前膛枪的射程。沙

---

① 《世纪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当时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报。——译者

斯波式步枪具有杀伤力的射程超过一千二百米，等于臼炮原来的有效射程。

老实说，城墙从来也没有被重视过。路易－菲力浦不愿意兴建城墙，他只是为了要建造独立的堡垒才勉强同意筑墙的。从原则上说，只有建造堡垒才是防御手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进攻手段，因为它们完全是针对巴黎的。政府敢于把第一个堡垒（埃皮纳堡垒）设在贝尔－拉雪兹高地，就是一个明证。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全体居民的愤怒和谴责。政府的意图实在太明显了。经历过此事的人现在还能记得，建造堡垒的计划曾经在报刊上引起了长时间的激烈论战。

人们很愿意加强巴黎的工事，但这些工事必须用以对付外敌入侵。反对派之所以建议修筑城墙，这是因为城墙对巴黎没有害处，是保护巴黎的，城墙只会使入侵的外敌感到害怕。

这却和国王的意见相左。他不太担心外敌入侵的危险，确实他也从不挑起事端。他所需要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于镇压可爱的城郊①的炮台。他在他写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的话，后来信落到他的政敌手里，在《法兰西报》②公布出来。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堡垒位置的选择也明显地暴露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君主的意图。他被迫把堡垒建在比原计划的位置远得多的地点。大家看到，在城市最不需要防卫的方向，却堡垒林立。贝尔维尔高地本身就是有力的工事。

虽然外国军队一到，伯利维尔高地首当其冲，但敌人可以从北

① 城郊是巴黎的工人住宅区。——译者

② 《法兰西报》是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日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派机关报。——译者

部绕过这些丘陵。在一八一五年，滑铁卢大战以后，普鲁士人在巴黎的下游渡过塞纳河，直扑凡尔赛、默东、克拉马尔和伊西，从西南方进攻巴黎，而威灵顿统率的英军则从圣德尼平原包抄巴黎。

更加清楚地说明路易－菲力浦罪恶用心的是：设计的时候，在邦丁堡垒和东堡之间的北方公路上，故意留了一段长达六千多米的缺口，那里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来自比利时的敌人可以长驱直入。

这件事暴露了政府的秘密意图，引起了一场风波；为了安抚舆论，就建造了奥贝维利埃堡垒，但这也是远远不够的。

再有一件事，也使国王的意图暴露无遗，就是在整个巴黎西部不设一个堡垒。在这个方向，没有可爱的城郊，因而设了堡垒也没有用。而在今天，这个缺口就显得特别突出。整个这块大平原很容易受到普鲁士人的攻击。

蒙瓦勒里安可以保护相当大的一块地方，但当时建筑这个堡垒，只是为了集结部队掩护土伊勒里宫和香榭丽舍大街的后方，以及用作向东城工人居民区作战的基地。

修筑连绵不断的城墙还是建筑独立的堡垒，这两种方案之间的争执十分激烈，路易－菲力浦看到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便实行了妥协。他同意筑城墙，反对派答应修堡垒。

以上略为冗长地介绍了防御工事的历史，目的是为了说明造成这些工事的缺陷的原因。修筑这些工事，不是为了防止外国入侵，而是为了对内镇压。由于城墙和堡垒之间有大批村庄，城墙发挥不了作用。对此，不得人心的国王觉得无关紧要。这些堡垒虽然在围城的炮队面前起不了多大作用，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付没有大炮的起义者。

保卫首都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堡垒前沿三千米的地方进行

工事战。只要有略高的地形掩蔽炮队就可以，而这样的地形是能够迅速造成的。

为了进行这样一场工事战，首要的条件是要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已不是要塞保卫战，而是在堡垒掩护下和凭借工事的平地持久战。

这些工事可以互相衔接在一起，中间留有骑兵的通道，也可以分别设置在外围，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大炮为主，集中各个工事的火力。

如果早先在长达八万米（二十里）的外围修筑这样一道工事体系，工程量大概不会超过高达十二米的现有城墙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这条固定的工事防线高出堑壕底部五米，有石砌的内岸和外岸，斜堤坡度平缓，胸墙的最高点同斜堤相平，以防远方的射击。工事与工事间有相当宽阔的通道，便于战斗时骑兵的行动。

时至今日，着手这项工作已经不可能了。相反，利用较高的土质工事进行防御是十分可行的。

必须严密监视敌人，不受敌人声东击西的欺骗。一旦发现敌人准备进攻，便立即出动劳动大军，于当晚在整个攻击前线建立起工事防线，配置大炮，以便随时进行战斗。

如果敌人挖壕向我工事推进，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法前进，并超过敌人，不让敌人夺得一寸土地。以相同的战线和同等的兵力作战，全部优势都在防守者方面。

沙文主义者对此感到愤慨，他们也许会说，以相等的兵力，法国人完全应该不必这样费事就把普鲁士人歼灭。由于听了这些形迹可疑的沙文主义者的话，我们已经倒过霉，今后再也不能听信他们的夸大之词了。

如果兵力相等，训练有素的法国士兵确实能够很快地消灭普

鲁士人。但是，巴黎的守军成份复杂，有正规军、别动队、义勇军和老少不一的住在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大多数人对于武器的使用还很不习惯。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决不能冒然去干蠢事。在这样一场斗争中，时间对我们有利。

1870年9月12日

至少现在总应该恢复理智了。但是激昂慷慨的言辞仍然不绝于耳。人人都准备战死在街垒上。这种空洞的大话连篇累牍，堆积如山。

如果只想死于街垒，那么人们倒是会活得更长，而且发誓要这样英勇献身是万无一失的，因为誓言不会损伤人们的一根毫毛。

在我们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四十天以后，人们至今还固执地把普鲁士人当作傻瓜，这真是太过份了。沙文主义简直死不改悔。它总是想着：善良的德国人为了让我们开心，为了给我们提供自我吹嘘的材料，决心送死来了。

你们可以连续炮轰斯特拉斯堡十二夜，可以焚毁图书馆，可以炸平具有几百年历史的首屈一指的教堂，可以把居民埋葬在硝烟弥漫的房屋废墟下，但是你们不会触动武装的城堡；你们可以把人杀光，但决不会毁坏街垒的石块，从而使诚实的巴黎人确信，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充当他们街垒的靶子！

当然，普鲁士人将故意来打街垒战！他们会在每一个障碍物的面前，大方地葬送两三个团！他们有的是人，为了光荣，不惜这点代价，是吗？

好极了！你们就这样去想入非非吧；你们尤其要准备有足够的耐心，等着他们来接受最后的审判，因为不等你们有幸见到任何一个普鲁士人，你们早就都死光了。他们很想杀死你们，而不大想同你们闲谈。

人们还记得一八一四年，普鲁士将军穆夫林在蒙马特尔高地安下了十二吋口径的大炮，以一种凶狠而带嘲讽的口气问亚历山大皇帝："要不要点火开炮?"亚历山大回答道："啊，不!"

可是这一回，他们将对我们"开炮"了！因为他们不再有牵制他们行动的盟国。他们一旦突破城墙，甚至不等突破城墙，就可以对准我们"开炮"。

众所周知，即使他们处于堡垒的外线，他们也能轰击巴黎四周各区。他们只要攻下一个堡垒，炮弹就可以落到巴黎的纵深地区，也许一直能打到市中心。

只要城墙被攻破一个缺口，大屠杀就立即开始。普鲁士人决不会深入到街道。也许任何普鲁士人都不会走下城墙；他们将沿着胸墙的内侧掘壕前进，直达城堡的平台。

他们的臼炮将在堑壕中向巴黎倾倒大量的炮弹，制造破坏和死亡。从这火网射出的倾盆大雨似的炮弹将在各处引起火灾和造成废墟，直到伟大的首都被毁灭或者投降。

维克多·雨果雄辩的恳求挽救不了首都。啊，伟大的人，您在火上加油，却并不知道。您以为您的恳求可以打动这些野蛮人的良心，而这只能使他们更加狂暴。巴黎的光荣使巴黎遭受苦难。您热情奔放地以人类的名义向他们呼吁，要他们尊重这个最古老的城市，而他们梦寐以求的正是要把她搞得支离破碎。

巴黎的火种，他们要熄灭；巴黎的思想，他们要淹没。这批五世纪的蛮族再一次在高卢的土地上泛滥，他们曾经吞没了希腊和罗马的文明，现在又要一口吞下当代的文明。

他们在野蛮地叫嚣："让拉丁族死绝!"你们听到了吗？他们摆起了人肉宴，唱着西兰部族的曲子："挥动战斧，劈开敌人的脑壳，饥食其肉，渴饮其血，多么快乐!"

柏林应该是未来的圣地，它的光芒将普照世界。而巴黎则是

叛逆的、腐败的和出卖肉体的巴比伦，上帝派遣的执法天使将手持圣经把她从地面上扫除干净。上帝已经在日耳曼族身上打上了天命的印记，你们不知道吗？日耳曼族的肠子也比我们的长一米多哩。

我们要自卫呀！向我们的城镇进军的敌人，如同奥丁[①]和摩洛赫[②]那么凶残，如同汪达尔人[③]和闪米特人[④]那么野蛮。我们要自卫，我们不要依赖任何人。

让我们重申：不要再抱幻想！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城墙和堡垒，它们不能保护市郊免受炮轰。必须使炮弹远离我们的神圣家园。

仅仅依靠力量薄弱的堡垒，打退不了野蛮人的侵略。谁只是胆怯地满足于单纯防御，不幸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必须远在圣德尼和阿尼埃尔平原，在桑努瓦和默东高地，挡住敌人的各路进攻，不让他们逼近我们的城墙。

敌人的进攻大概将指向最薄弱的城西部。据人们推测，敌人将在两河汇合处的上游渡塞纳河，从南部包抄巴黎，并取道树林直扑默东。

树林是普鲁士人最喜欢利用的屏障。在树木的掩护下，他们静悄悄地调动大军，就像豹子匍匐而行，接近它的捕猎物一样。他们将在默东的河谷地区架起大炮，直接攻打从普安-迪-儒尔门到多菲内门一线的城墙。

同时，他们的炮火将轰击整个十五区，即格列涅尔和伏日拉尔，以及十六区的南部、奥特伊和帕西。

---

①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战神。——译者

② 犹太人的神。——译者

③ 公元初期东日耳曼的一个部族。——译者

④ 中近东地区的一个部族。——译者

他们的另一部分军队将在埃皮内附近利用小岛的方便渡过塞纳河，取道让纳维利埃和阿尼埃尔向前挺进，以便与南部的进攻相配合，包围整个城的西部。蒙瓦勒里安堡垒对于这两路部队的进攻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这两路进攻部队将通过韦齐纳树林、蒙特农、韦耶斯和桑努瓦在堡垒的后方会师。

在一八一五年，布吕歇尔统率的普鲁士军队曾从北部包抄巴黎，经由韦齐纳半岛，通过夏图桥并攻下凡尔赛；然后，穿过树林，沿着默东、克拉马和伊西一线驻扎待命。普鲁士人很喜欢这条他们认为最可靠的进军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受到塞纳河的河曲以及首都西南偏西部的成片树林的保护。

当时，普鲁士人来自滑铁卢，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右方夺取默东。看来，他们今天是从北面和东面同时向巴黎进逼。由此可以预见到他们的两条进攻路线，一路将取道埃皮内向阿尼埃尔平原挺进，另一路将取道默东河谷直达帕西。

从东面来的敌人，将在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在南面相当远的地方渡塞纳河，从西北方向到达默东树林。

从郎城方向来的敌军，无疑将由埃皮内发起进攻。

惯于狡诈行事的敌人故作秘密地放出风声，说他们准备从罗曼维勒发起攻击。他们希望这种秘密能传布出去，并使人们信以为真。

其实，不管敌人在哪一方面出现，重要的是要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为谨慎起见，应当在默东的上方大规模地建立工事，以箝制由于交通方便而容易得到补充的大量敌军。因为，如果普鲁士人选择默东作为攻击点，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攻克它，他们将袭用他们的老办法，成批成批地向这里调兵，以便以多胜少攻下阵地。

1870年9月13日

人们依旧以夸夸其谈和胡言乱语欺骗群众。为了恢复理智和认真抗战，我们要坚持不懈地阐明事实真相。乐观派的主要论据，是说我们在制造恐慌；对此，我们要回答说，你们是在麻痹人心。

我们提起人们的警觉，决不是为了泄气。完全相反，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消除可悲的幻想。在人们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突然从天降临的灾祸，几乎总是致命的大祸。最危险的大敌莫过于麻痹人心。大家知道，波拿巴的这种惯用伎俩把我们引到了什么境地。

这种伎俩虽然几经破产，却总是卷土重来，现在又发起了攻势。它利用某些人的恐惧心理，并使这些总是以受骗为快事的胆小鬼变成沙漠中的鸵鸟。

为了安抚这些惶惶不安的软骨头，人们散布了多得无法想像的废话和自我吹嘘。这是预示着衰亡的不祥之兆。人们企图使我们陷入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被围时所处的境地。

在一份严肃的杂志上，人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些话：

“设置在堡垒线以外的普鲁士大炮打不到巴黎城。即使把这些大炮移到城墙上来，射出的炮弹也只能勉强越过巴黎旧城的城墙。因此，整个巴黎旧区始终是巴黎居民的可靠庇护所。”

事实是，设置在南部堡垒线以外的普鲁士大炮可以轰击到十三区、十四区和十五区。而在东部的奥贝维耶和罗曼维尔堡垒的防线外侧发炮，炮弹就可以轰击到十八区和十九区的大部分地区。

当然，人们也可以对这些炮兵阵地进行回击。但是，敌人的大炮阵地已经做好了受到回击的准备，何况其面积又很小；而敌人炮击城市，则不用瞄准，也能弹无虚发。

有人说：“从某些地点，敌人不能向我炮轰，因为他们处在我方

堡垒的炮火之下。"这是一种很糟糕的辩解。他们也同样会说:"敌人不能向我们开枪,因为敌人会受到我们的回击。"

再则,在枪支对射的情况下,双方同样都有危险。但就炮击而言,情形则完全不同。

所有的炮弹都能命中被围的城市,而能命中围城敌人的狭窄炮兵阵地的炮弹则为数甚少。

"如果敌人从城墙平台发射炮弹,整个巴黎旧区始终是居民的可靠庇护所。"对于这种难以置信的论调,又该说些什么呢?

假如把大炮设置在城墙四周的工事上,那么,处于塞纳河、大林荫道、盖隆街、圣罗什街和腾普尔街之间的巴黎城区将受到全部炮火的轰击。而巴黎的其余部分,则仅仅受到四分之三的大炮的轰击。这就完全够了。

如果大家都看到了这种前景,那么决不会有十万名妇女从偏僻的外省拥到巴黎来寻求这些所谓打不垮的工事的庇护。因为,所谓攻不破的巴黎的神话早已到处深入人心了。

这些可怜的妇女原来所在的地区很安全,敌人永远不会去那里,因为那里不是敌人进军路线经过的地方。她们惊惶失措地逃到巴黎,正像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炮声一响,出现的将是一片呼天唤地的景象!如果一发炮弹不幸落在市郊,这些不幸的人将是何等的恐慌,何等的绝望!她们将要求逃难,重新回到她们自己的小城镇去,并为此而大吵大闹。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误信了巴黎具有火怪萨拉芒德的本领。

当然,防御的任务应该是防止敌人的炮弹打进首都。今天要取得这种把握,已经略为晚了一点。不过,只要努力,采取主动,也还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

应当在离城较远的地方摆开战场,使普鲁士人不能靠近城市。

为此，需要有大量兵力，许多大炮，需要大力兴建工事，而这些就是取得胜利的手段。

塞夫勒高地和默东高地大概将是围城的关键。如果敌人深入该地区的广阔树林，他们就很安全，而我们则观察不到他们的动向。这样，他们就具备了他们所寻求的作战条件：隐蔽、掩护和秘密。

这些树林有两条通向凡尔赛的铁路穿过，是防守十分薄弱的巴黎西南角的屏障；如果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我们就应该派大量的兵力固守这些树林。

一份报纸天真地说："在塞夫勒瓷器工场的对面，刚发现了一个极好的阵地，它可以控制塞纳河和巴黎要塞。工兵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要害地点设立工事。如果我们听任普鲁士人自由行动，他们就可以从那里随心所欲地炮击我们。"

这份天真的报纸接着向善良的人们发出绝望的呼吁："来三千人吧，来三千人拯救巴黎！"

说实在的，这点人太少了。虽然晚了一些，如果政府终于看到，防御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修筑这些用来全面地对付敌人的外围工事，政府就应该大声地把话说清楚，就应该发布告示，动员巴黎的劳力，动员人们拿起锹镐。

不是有别动队吗？这些身强力壮的人兴建工事是他们的老本行了，让他们去干，会干得很出色。最紧迫的任务是在离城较远的地方到处修筑土质工事。在南部和西部，这些工事是绝对必需的。

为了掩护夏朗东堡垒免受炮轰，在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的克雷泰高地修筑这类工事也是非常有益的。

总之，需要有一支四十万至五十万人的军队，在堡垒线前沿一里的地方同普鲁士人进行持久战。巴黎将听到炮声，但见不到炮弹；这样，居民就会很快安下心来，他们将以更大的热情参加战斗，

准备作出牺牲。

可惜我们现在没有五十万人。如果听信一份狂热的报纸的说法，我们现有的兵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

我们且看一下它的办法。它说：

“十五区区长科尔崩①先生搞到了一万五千支枪，刚好足以把到目前为止已经报名的第一批国民自卫军武装起来，还有五万名新报名的国民自卫军，这就要求科尔崩先生再搞五万支枪。”

由此可见，十五区将有六万五千名国民自卫军。特别奇妙的是，这个区仅有七万名居民。在这个区里，妇女一定身价百倍，因为从一岁到八十岁的妇女只有五千人，而成年男子却有六万五千人之多。假如整个巴黎都是这个样子，普鲁士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报纸上充斥着这些离奇的故事。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竟这样胡说八道，真是可怕。这些空话多数并没有太严重的危害，但其中有些可能使我们付出重大代价；而公众对于这些空话全都信以为真。

下面再指出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据说，这个错误决不会导致恶劣的后果，这是毫无疑问的！

布尔日是炮兵的大军火库；那里的大炮和弹药堆积如山。

可是，有一份报纸却说：“四面有滚滚的卢瓦尔河为屏障，布尔日城是法兰西第二个设防的都城。它的战略位置使它不可能受到敌人的袭击。普鲁士军队要到达布尔日，必须首先攻克巴黎，然后才能去法国中部寻找法军较量，而那时法军早已严阵以待了。”

人们总是戴着玫瑰色眼镜盲目乐观！总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总以为敌人是无能的！忘记了法国已没有能打仗的军队，忘

① 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第二帝国崩溃后任巴黎的区长，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译者

记了普鲁士人控制着战场。他们高兴去布尔日就可以去，不必先夺取巴黎，甚至可以根本不顾巴黎。

只要我们还没有数量可观的正规军去抗击普鲁士人，他们只要带着一万五千匹马和四十门轻炮，就能在全法国纵横驰骋，从北到南，从施特拉斯堡到巴荣纳，从尼斯到布雷斯特。

他们将攻占和破坏一切没有要塞防守的军火库、军事设施、火药厂和兵工厂。圣亚田、蒂尔、夏特罗、布尔日都是不设防的城市，看来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部队能够阻拦敌人对这些要地实施其行动。

也许，十天或十五天以后，情况会有所改观。而现在，显然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这些破坏性的行动。

敌人很可能在进军巴黎的同时，迅速派出一支大军去进攻军火库，使我们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愿国防部已经把炮兵物资、武器、火药从这些毫无保障的不设防地点运到了巴黎、贝桑松和其它要塞。

博　爱

1870年9月8日

近来又有人在咒骂白大褂①了。这在帝国时代是对的；但在今天，应该公道地说，这是污蔑。

当时，缴纳出版保证金的报纸虽然不喜欢帝国，但又不愿豁出命去反对帝国；它们曾在道义上声援了一八六九年五月和六月的暴动以及一八七〇年二月和五月的暴动。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曾模糊地希望暴动能够成功；后来，一当暴动失败，他们就

① 第二帝国末年，警察局长比埃特里雇用工贼冒充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人们把这些工贼称作白大褂。——译者

袭用五十年来的故伎把暴动者说成是奸细。

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愤怒地谴责这种无耻行径，但他们的声音太小。他们根本没有发言权；要想有权开口说话，就得付十万法郎保证金。他们的低声咒骂丝毫抵消不了报纸所散布的数以万计的污蔑之词。

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穷人也可以大声说话了。缴纳了出版保证金的报纸的先生们，对不起，收起你们那一套大骂白大褂和游民的陈词滥调吧！

那些只顾逃命的百万富翁才是游民，他们揣着自己的金币溜走了，却把巴黎和法兰西留给普鲁士人。

我看小偷要比为富不仁的懦夫强一千倍，至少小偷还准备站在我们一边去同日耳曼蛮族作战，而逃命的懦夫们，却也许希望那些力图复辟封建贵族制度的日耳曼人能够胜利。

在这些遭人唾弃的所谓惯犯中间，有多少人是为贫困所迫，他们的不幸和错误应该归罪于社会。如果他们在祖国危亡的时刻拿起武器，拚死拯救祖国，如果他们在绝望中重新焕发神圣的团结感情，如果他们忠诚于共同救亡的事业，有谁敢向他们丢石头，又有谁敢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报之以辱骂！

在九三年，正人君子们把土伦交给了英国人，而那些苦役犯却砸开身上的锁链，把法国舰队从大火中救了出来；在这个被叛徒出卖的城市里，没有发生一件盗窃案。

在这祖国、家园和个人的命运朝不保夕的时刻，人们不能过于挑剔，而应该放下有钱人的架子。

要从塞纳省征集十六岁到六十岁的全体男性居民参加军队，不问他们的品德如何。谁能够担保说，这场生死考验不会使那些迷途的人们经受锻炼而改造成为纯洁的新人？

无论任何人，只要他为法兰西继续留在欧洲的地图上而战斗，

他就是兄弟，因为他也拯救了大家庭。

为什么要害怕游民？心胸多么狭窄！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怎么会在少数无业游民面前吓得发抖！只有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才不再危险，不再作恶，难道不是这样吗？

只要他们亲眼看到社会隆重地接待他们，把他们所受的耻辱洗刷干净，那时他们自己就将毫不留情地把阻碍他们弃恶从善的作恶天性压制下去。这比任何警察手段都更加严厉。

请不要忘记，明天进行的战斗，不是为了政府，不是为了特权阶级或一党一派的私利，甚至也不是为了荣誉、原则或观念，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呼吸与生命，为了作为人的最高表现，为了祖国。

如果明天我们丧失了祖国，我们将沦于什么地位？也许正是这些遭人唾骂的贱民感到最为悲痛，因为祖国是他们唯一可以引以为荣的资本。

第二帝国末年，犯罪行为大肆泛滥，显示着社会解体的开端。犯罪分子非但不受惩罚，反而趾高气扬，这样的事例几乎使人们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观念。

既然全体人民只能屈服于坏人当道的政府，我们待人处世又何必约束自己？偷盗、凶杀、抢劫迅速从上流社会发展到社会底层。恐慌万状的富裕阶级高声呼救，要求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用这样的手段来医治人们的精神创伤，未免太可悲了！没有正义而施加武力，那就是强暴行为。

由于战争，关闭的工厂日益增多，大批工人流落街头，造成了新的恐慌。随着敌人围城日紧，报纸纷纷要求把“没有生活来源”的闲人遣散。

最初，搜捕只限于流浪者。但不久，失业工人也被包括在内。“没有生活来源”这个可怕的词，范围真不知道有多广？也许，任何没有地产收入的人都将属于被放逐之列？

九月四日的伟大运动迅速制止了不经审判的处决：博爱精神的复兴何等好啊！这种精神发自每个人的肺腑，势如破竹，不可抗拒！在博爱的声浪面前，偷盗和凶杀一概销声匿迹。从此，这些令人沮丧的报导不再充斥于报刊了。

共和国的成立使犯罪分子不再为非作歹。为什么？因为它重新激起了欢乐、希望、同心同德的感情以及所有其他崇高的本能。

不要用恐怖去压制群众。不要用利剑威吓他们。要向群众伸出你们友谊的手；同他们握手，你们就有了充满激情和忠诚的战无不胜的力量。

改组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

1870年9月10日

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以及后来的一八四八年共和国期间，国民自卫军根本不成其为一支军队，而是一伙乌合之众。从来没有见过哪支军队竟是如此地混乱，简直毫无组织可言。

奥尔良王朝时代的国民自卫军总共有九万人，分为十四个军团：十二个军团建立在城里，二个军团建立在郊区（当时的郊区包括现今的十五区、十六区、十七区、十八区和十九区，以及十二区的一半、十三区的三分之二和几乎整个十四区）。

每个军团下辖四个营。

由于各区的居民人数不等，各营的兵员总数相差甚大。

按平均数算，每营有一千六百人，人数同临时政府刚成立的六十个营差不多。

一八四八年共和国成立后，国民自卫军一下增加到了四十万人。全体公民统统都参加了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虽然那时候普鲁士人并没有打进我们的国门。

极其荒唐的是，这支全民皆兵的新军队沿用了原国民自卫军的编制：十四个军团，五十六个营，每营辖六个连。

人数最多的第六军团辖四个营，每营的人数达八千人，因而每连的人数超过一千三百人。

为了使部队能够机动灵活、令行禁止，以及官兵比例恰当，参照过去的经验来确定营的建制，显然是合乎常理的；否则，过去的经验也就不成其为经验了。

然而，要使部队易于行动和指挥，每营最合适的编制应为王百人，分作八个连或排，每连（排）有六十名士兵和三名军官。

无论在外国或在法国，一个营的兵员有时达到一千人，例如文森的猎兵，甚至高达一千二百人，又如一八七〇年的别动队也是如此，这种编制不免使营丧失其机动性，特别是在成二列横队的时候，排面拉得实在太长了。

这种缺点在训练有素的部队中已经很明显了，在新兵中则显得更加严重。一个营的编制如此庞大，只能造成行动迟钝和混乱。

奇怪的是，人们却硬要把这种新的困难强加于临时拼凑起来的，没有经过军事训练而仓促上阵的部队。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真是使人莫名其妙。

国民自卫军新编的六十个营都是每营一千五百人。原有的各营维持原状，人数肯定更多些，但每营的人数差别很大。这样做，既没有秩序，尤其很不谨慎。对于未经训练的部队，编制应该便于它们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妨碍他们的行动。

国民自卫军将是巴黎军队的主力。照现在这种搞法，它将不成其为一支军队，而是一群老百姓。

这种编制在政治和士气方面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要比纯军事方面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波拿巴为了破坏民兵的影响而想出来的一个恶策，共和国为什么还要保留它呢？

军团原来既是保卫本区，又是保卫祖国的部队。它使居民们武装起来，成为自己家园的保卫者。恶棍波拿巴把这个大整体分割成互不相关和各行其事的小团体，从而破坏了它的结构，分散了它的力量。

这些涣散和杂乱的营队，既无统一的部署，又无统一的意志，不起任何作用，究竟成了什么东西？这决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伙乌合之众。

现在战争尚未开始，进行整顿还为时不晚。如果政府愿意一视同仁地给全体公民发枪，塞纳省的国民自卫军将组成一支四十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所起的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编制是否完善。

必须恢复军团作为部队的主要建制，军团下属的各单位必须成为赋有军事活力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一盘散沙。

每营的定员为五百零七人，下辖八个排。

每排设上尉一名，中尉一名，少尉四名，士官八名，鼓手一名。

撤销原有的军士长和负责给养的下士官。其职务由中尉兼任。

营级设中校一名，负责武器和装备等总务工作的少校一名，助理总务的上尉一名。

二至三营组成一团，由一名上校指挥。

二团组成一旅，由一名准将统率。

二旅组成一师，由一名少将统率。

二师组成一军，由一名中将指挥。

二军组成一军团，军团长为一名上将。

一切尉官、校官和将官，包括军团长在内，无条件地由国民自卫军选举产生。

凡穿着原来军服的国民自卫军战士，如果有足够的人数，可以

在本军团内自由结合，组成单独的营、团、旅、师、军。相反，其余各团、旅、师、军将由不同军服的营所组成。

全体国民自卫军战士应当隶属于其居住地点所在区的军团。

将级军官可以在他们居住地点以外的区当选。

这样的改组能够很快完成。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当选的军官将根据新的级别取得相应的军衔。

对于许多至今没有参加巴黎民兵的公民，这次改组也是他们加入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机会。

我们将不厌其烦地向政府呼吁，征召十六岁至六十岁的全体男性居民入伍，组织起一支精锐的部队；否则，我们将后悔莫及。我们将从中选拔出八万名十六岁至二十岁的青年，他们将给普鲁士人一点厉害看看。我们为什么要失去他们的支持呢？如果说不愿意强制实行义务兵役制，那么至少也应该接受适令的志愿兵。而志愿报名参军的人将成千成万。

全民族的抗战

1870年9月14日

一个新的危险威胁着我们。普鲁士人宣布，他们将在距巴黎十里之外围困巴黎。他们向来很少泄露自己的计划。可见他们这种公开宣布包藏着祸心。什么祸心呢？是在当天或在当晚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吗？——这也可能。

也可能他们有一个完全相反、但更加危险的计划：用少量兵力把巴黎当作一个普通的要塞城市包围起来，这点兵力虽然不足以攻城，但却足以截断交通补给；然后分兵几路，向法兰西全国四面出击，攻占或破坏军事设施，摧毁新兵的征集和部队的集结，破坏各级行政部门，总而言之，搞乱并占领全国各地。

如果这一计划得逞，开始就疏忽和被动的巴黎很快将被全部敌军围困，得不到外援和补给，而现有的城防部队孤掌难鸣，只得坐以待毙了。

那时候，这个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抗战中心，失去了任何获救的希望，只得放下武器，让法兰西落入普鲁士之手。

敌人的这种计划很容易识破。只要普鲁士人用很少兵力围城，而大部队却分兵几路向外地开拔，那就可以肯定，普鲁士人的企图是要占领全国，从而使首都孤立无援。

由于正规军被消灭，我们的处境很困难，而敌人显然利用了这一点。刚征集的新兵，既没有经过训练，又没有足够的武器，特别是缺少大炮，因而无力摆开战场同刚打了胜仗的普鲁士鬼子较量。

单靠几支游击队，无法阻止配备有炮兵和骑兵并拥有一万五千至三万人的敌军前进。游击队的作用只限于骚扰敌人的后方和侧翼，消灭敌人的侦察部队和辎重。这么一支大部队，在它肯定不会同我正规军遭遇的情况下，要在进军途中收拾几小股分散部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普鲁士人大军逼境。眼看着他们不费一枪一弹，长驱直入地开到我们的城下，我们实在感到痛心。位于蒙费尔梅和伊弗里之间的谢耳要塞，有树林为屏障，本是很好的阵地，应该使普鲁士人付出重大的代价。

现在我们知道，在阵地攻击战中，攻方总要付出重大的伤亡。我们原有足够的部队，可以节节据守通向首都的各条大路。只要我们大量地杀伤普鲁士野蛮人，而无损于我们的战局和兵力，这对保卫城市就是一个很好的前奏。呆在堡垒里等待敌人，这是可悲的。

我们的仗是不是这样打的呢？军队慢慢后撤，节节据守阵地，箝制敌军的前卫，迫使敌人展开兵力，这种战术在今天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厉害；这样可以利用新的大炮的杀伤力，给攻城部队造成惨重的伤亡。

我们早就应该派出强有力的支队出城二十里去迎击普鲁士人，然后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堑壕。我们的每一个有利阵地都应该为胜利作出贡献。因为大量杀伤敌人就是胜利。

抗战的前途出现了不祥的征兆。梯也尔正拜倒在外国宫廷的脚下，履行他的外交使命。难道人们寄希望于这种外交使命而不信任共和国的战士们的勇敢和爱国精神吗？

我们即将掉进什么样的深渊呀！

1870年9月15日

人们忧心忡忡，不知道法兰西的命运将是什么。敌人已经打到门口。在巴黎的街头，到处都是备战的景象，到处都可以听到兵器碰击的声响，到处都可以见到成群结队的士兵。可是，在这一片喧闹声中，人们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感到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被迫的，得到的印象是令人寒心的，似乎所有这些轰轰烈烈的场面无非都是为了装装门面，不过是一个转瞬就要破灭的肥皂泡。

人们满腹疑团。心情十分沉重，怀疑自己是否上了一个弥天大谎的当。人们隐约地感到有两股潮流正在暗中搏斗：一股是忠于祖国的潮流，另一股是利己主义的潮流。究竟谁战胜谁呢，是热情洋溢的群众还是老奸巨猾的少数人？可惜，也许我们就要看到，这场持久的对抗将以极其悲惨的结局而告终。

抵抗外敌只是表面的活动。在这种表面背后潜藏着投降。当面慷慨激昂，暗中卑躬屈膝。谁知道这场战争儿戏不会导致签订屈辱的和约呢？

欧洲对我们十分嫉妒和仇恨，它但愿我们早点垮台。它也乐于嘲弄我们。对我们来说，它的婉惜就是讥讽，它的怜悯就是侮

辱。没有一份黄色小报不摆出拉达芒脱①的架式，趾高气扬地向我们发号施令。我们到处受欺侮，连驴子也要踢我们一脚。

欧洲的焦急心情说明他们在害怕，他们担心火山有一天要爆发。在波拿巴给我们带来重重灾难的时候，欧洲默不作声，他们看到这种场面感到高兴得很。

一旦共和国成立，他们却流着鳄鱼的眼泪，急忙赶来，像披头散发的萨平妇女②一样，扑向对阵相争的两军之间。在我们失败以后制止战斗，并且不准我们报仇雪恨，这就是欧洲各国的普遍打算。

他们都知道普鲁士人已经占了便宜，他们还希望普鲁士人今后也不吃亏。这些伪君子们对我们喊道，“你们战败了，赔款吧！”

“塔尔丢夫们③，管你们自己的事情去吧！我们的事情有我们作主，不用你们多管。”

人民只能自己靠自己。谁指望外人来救他，谁就活该倒霉！我们的失败已经使法兰西的威信扫地。法兰西的功绩、法兰西的光荣已经从人们记忆中消失。只有掌握实力才能受人尊敬。我们昨天受人尊敬，今天受人轻蔑，而明天则将受人鄙视。屈辱性的和约将使我们任人践踏。

报纸上有一种含糊不清的提法，这使我们感到震惊。它们不厌其烦地重复儒尔·法夫尔的名言：“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堡垒上的一块石头”。至于战争赔款，却一字

---

① 希腊神话中主宰地狱的神。——译者

② 萨平为定居在罗马附近的一个拉丁民族。据古代传说，罗马人抢走了萨平妇女，于是萨平人与罗马人之间发生了战争。根据这个题材，法国十九世纪著名古典画家路易·大卫曾画了一幅名为《萨平妇女阻止罗马人和萨平人之间的战争》的油画。——译者

③ 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的名字，后来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译者

不提！

可是，人人知道普鲁士提出了赔款的要求。普鲁士要得到五十亿法郎的赔款，它要吸尽我们的民脂民膏，它要使我们陷于赤贫，使人民死于饥饿。

人们应该对此作出解释！

接受这种同割地一样可耻，但却更加野蛮的要求吗？有钱的特权阶级不会受到多少影响；但对于劳动者来说，这几乎是把他们置于死地。

不要模棱两可，不要吞吞吐吐。在经过巴黎的虚张声势的抗战以后，我们究竟是否还要纳付几十亿法郎？

人们也许以为这样做可以挽回荣誉。

结果，我们将把体面以及其它一切统统丢光。

拉维叶脱事件

1870 年 9 月16 日

上个月的今天，在拉维叶脱林荫道紧挨运河桥的地方，有一百来人慢慢地聚集到一起。

那是个晴朗的星期天。附近的街道上，许多人三三两两地在散步，暗中准备着举行一次集会。

离消防营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耍杂技的正在卖艺，四周围着几个好奇的行人。

策划这次行动的领导人提前到了现场，通知参加该行动的公民们混到耍杂技的周围的观众中去。人群就这样集中了起来，而没有引起警察的怀疑。

将近三点半钟的时候，布朗基发出了信号，集中起来的人群不慌不忙地小步向消防营走去。队伍走的是对面的便道；要到达警

卫队，必须横过马路。

由于他们突然来了个九十度的转弯，岗哨和营地的士兵警惕起来，纷纷赶去拿起自己的枪枝。

这是令人痛心的一个失着。

人们本来指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武器而不发生冲突。消防队是一支从不参与国内斗争、并且以其民主思想而享有盛名的队伍，深得巴黎人的爱戴和尊敬。因此，事先约定决不为难消防队员。哨兵由于反抗被手枪打伤；为了争夺武器，起义者同警卫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起义者内心十分厌恶使用暴力。他们不愿意利用人多势众以武力夺取枪支。为了争取消防队自动缴枪，他们举行了谈判。谈判耽搁了时间。

驻在附近的一队警察闻声赶到，挥舞着刀剑向起义者扑来。听到“警察来了！”的叫声，布朗基、爱德和格郎热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于是立即开始了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混战。

警察被打死一名、受伤两名，其余都仓皇逃跑。

获胜的起义者继续努力，争取消防队员缴出武器。

这些温和手段没有成功。但是公民们无论如何不愿使用暴力去对付这支优秀的队伍。偷袭失败了。

谈判没有结果，于是起义者放弃了消防营，沿着环城大道向贝尔维尔进发。他们当时已经明白，他们的计划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居民对他们的突然行动感到惊异。

居民们被好奇心和恐惧心所吸引，依傍着街两边的房屋，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起义者走了过去，林荫道上依然空无一人。起义者向观望的人们高呼口号：“共和国万岁！消灭普鲁士人！拿起武器！”但是毫无反应。

他们的鼓动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寂静。

起义的领袖们原来设想，由于时局的紧张，前几天又发生了骚动，完全有把握争取到群众。

但是，前几天的骚动失败之后，人们有点泄气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另一些问题，开始怀疑并过份地担心普鲁士会派奸细活动。

警察局阴险地利用了这些无谓的恐惧心理，并取得了成功，使人民不再关心推翻帝国这件大事。结果，在贝尔维尔这个革命性十分强的街区，起义竟然没有一人响应。

起义队伍就这样在孤独和静寂之中，沿贝尔维尔林荫道走了二千多米。

布朗基、爱德、格郎热看到这次行动已经流产，把队伍停了下来，并对他们的同伴们说：

“事情完了。我们没有枪，而且你们也看到，没有一个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没有人民，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十分钟之内，我们这个小小的核心将会受到沙斯波式步枪的冲击，我们的手枪根本对付不了这种步枪。我们必须解散。现在道路还很畅通，没有人阻拦我们的退却。把你们的武器都藏起来，向附近各条街道散开。”

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夺来的三支枪扔掉了；手枪都藏进衣服里面，队伍便顺利地散开了。

我们没有人被打死或被捕，也没有人受重伤。

而且，没有任何人企图阻拦我们。周围的群众只是对我们的行动感到惊异。

但是，应该说，我们这支勇敢的队伍惊动的面是很大的。在通向林荫大道的各街口，可以看到聚着的人群长达好几百米，但他们不敢靠近我们。也可以看到警察远远地站着，保持相当的距离。

可是第二天的报纸却宣布逮捕了许多起义者。再没有任何谎

言比拉维叶脱事件的报道更加厚颜无耻了。警方的各种报纸争先恐后地这样报道：暴动者的攻击一开始，居民们就拳打脚踢，棍棒齐下，把暴动者抓了起来，气愤地把他们狠揍了一顿，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从愤怒的人群中救了出来。

纯属捏造。全体起义者一起离开了消防营，没有一个人落后，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敌对行为，行进了半小时以后才自动解散。

捕人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起义队伍离开以后，有些好奇的人按巴黎的常情围在消防营的门口探听消息。警察和密探突然拥到，拿这些喜欢凑热闹的傻瓜开刀，乱打乱捕了一阵。

这就是所谓群众出于义愤而进行的干预。实际完全相反，正是毫不相干的群众遭到了警察的毒手。

在军事法庭受审的第一批被告，如同土耳其大公一样，和事件毫无牵连。警察在消防营门口胡乱地逮捕他们，而那里的起义者在一个小时以前就无影无踪了。

审讯期间，消防队员和警察争先恐后地指认犯人，他们的全部证词都是虚构的。

第一批受审的被告，不论被判死刑或被判劳役，都是无辜者。证人们指认他们，完全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抓了起来，又招供不出未被逮捕的真正参与暴动的人。被警察抓去的人中，也许只有二、三名是真正的暴动者，他们的被捕只是由于疏忽而被人密告。

爱德和布里多落入波拿巴当局之手完全出于偶然。一个名叫莱勒的业余暗探看到爱德的外套里面藏有手枪，盯上了这两位朋友，然后叫警察把他们抓了起来。

警察局把八十名倒霉的人关进了监狱，听候军事法庭的不公正判决。证人们对带上法庭的全体被告一律指控为暴动分子。如果没有九月四日的革命及时予以制止，这场血腥屠杀无辜者的暴

行真不知会发展到何等地步。

爱德和布里多义正辞严的立场，扭转了一度为这些污蔑之词所蒙骗的舆论。但是，关于普鲁士奸细的神话虽然被戳穿了，波拿巴的狂怒却有增无减。接二连三地判处死刑，使最高法院欣喜若狂。最高法院简直等不及法律规定的合法期限满期，第二天就立即批准执行。

1870年9月17日

最高法院——专制君主的罪恶工具——就这样擅自恢复了政治犯的死刑。

世界上任何政治行动势必都要引起武装起义。

而武装起义又难免要死人。

妙极了！只要死了人，法官们就判决是预谋杀人；谁参加了起义，就当作杀人的主犯或从犯而被枪决。

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波拿巴还不敢重新树起被一八四八年共和国废除了的断头台来对付政治犯。不过，这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妨碍。他有最高法院为他效劳，而这个臭名昭著的最高法院惯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最高法院已经把克拉姆西、贝莱、贝齐埃尔等地的保卫共和国的战士们送上了断头台。就是当年的军事法庭也只是对那些亲自参与所谓谋杀的主犯才判处死刑。这次的所谓军事法庭审判和最高法院又前进了一步。只要军队死掉一个人，全体起义者均得被处死。

吃人的生番们狂怒地要为死去的那个警察报仇；起义者并没有袭击警察，是他自己向起义者冲去，他们在自卫过程中把他打死了。在消防营门口值班的岗哨只是受了轻伤。

而警方的各种报纸却掀起一片叫嚣："处死他们！不用审判！

立即处死全体被捕者！”

这些倒霉的人并没有参与暴动。可恶的报纸所要求的无非是大批杀戮无辜者。报纸污蔑他们是“普鲁士奸细”！这种可怕的污蔑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要把共和主义者淹没在血泊之中，并以恐怖手段打击民主分子。

那些在报纸上或在讲坛上指责拉维叶脱的起义者为“普鲁士奸细”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是在蓄意制造谎言，因为他们明知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中间有些人，消息很灵通，完全知道谁是起义的领袖。

八里桥①这个抢劫圆明园的强盗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是普鲁士人收买的奸细，我口袋里装有证据，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立法团里没有一个有羞耻之心的人出来对八里桥说：“拿给我们看看！”

这些可尊敬的立法议员们明明知道八里桥口袋里装的只是污蔑。

好在要枪决的只是些社会主义者，因此波旁宫②里也就没有人愿意阻拦这么一件好事。八里桥在听了法庭预审后，也知道了起义的性质完全是共和主义的。警察在各处追查布朗基和格郎热，他们显然不像是普鲁士人雇佣的奸细。

不过，为什么他们一定不是呢？有些富人也许下意识地以为，穷人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他们低声对一些容易轻信的人说：“这次闹事的主犯没有家产。只有普鲁士人才能拿出钱来为起义者买三百支手枪和四百把匕首。”

---

① 八里桥原名古赞一蒙多邦（1796—1878年），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时，率领法国侵略军攻打津京，自称在八里桥战胜清军，因此，拿破仑第三封他为八里桥伯爵。普法战争时任军事部长，9月4日革命后逃亡国外。——译者

② 立法议会所在地。——译者

不！巴齐尔①，出钱的不是普鲁士人，而是格郎热公民，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一万八千法郎分文不留地拿出来买了这些东西。

他一定很傻，宁肯牺牲微薄的遗产，自己睡草秸，却乐于去冒险“当奸细而被枪毙”。不过，但愿祖国多几位这种无私的傻子，而尽可能少几个只会污蔑人的贪婪畜牲。

现在时过境迁，这些无耻诽谤已被批驳干净。爱德在城郊的安都纳地区被选为国民自卫军的营长，而拉维叶脱事件正是他当选的唯一原因。布朗基在蒙马特尔也被推举担任同样的职务。

巴黎知道，这些人想在八月十四日做的事情，就是九月四日成功的事业。他们显然犯了错误，因为时机没有成熟。必须善于掌握时机，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发生估计错误是要负严重责任的。用“我以为”来开脱是永远站不住脚的。

在一场关系着整个民族生存自由的斗争中，如果由于某种错误而遭受失败，那末这样的错误往往是不可弥补的，是任何理由也不能宽恕的。幸而在动荡的时局中，这次错误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很快便消失了。

有一条理由可以使这些莽撞的人得到宽恕，那就是时间十分宝贵，迁延时日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实际上，由于耽误了时间，使国家的军事实力葬送在波拿巴的深渊之中，元气大伤。

假如共和国在八月十四日成立，即使巴赞颓势已成，难免被围，但是麦克马洪②的十五万人，以巴黎为依托，将成为一支战无

① 巴齐尔是法国十八世纪著名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年)的代表作《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后来成为愚蠢的污蔑者的代名词。——译者

② 麦克马洪(1808—1893年)，法国元帅，普法战争期间任莱茵第一军团司令，于1870年9月1日被围困在色当，后受伤被俘。梯也尔政府同俾斯麦议和后，麦克马洪获得释放，充当了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译者

不胜的军队。

如果这样，普鲁士人今天可能已被扫清。

人们恰恰可以责备拉维叶脱的起义者行动晚了八天。应该在使巴黎群情震惊的赖朔芬惨败后的第二天，即八月七日那个星期天，发动对帝国的冲击。

十四日那天既为时过晚又为时过早。可以申辩的唯一理由是：这次行动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听到关于在阿尔萨斯大败的惊人消息时措手不及，由于没有护照，只得在八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的夜里徒步越过国境。这种辩解也站不住脚。真正从事政治的人，不应该对时局的发展感到突然。

不过，由于不得已耽搁了时间而致使起义不合时机，总不能因此说是向普鲁士人卖身投靠。对这些不说空话而务实际的人们横加指责和肆意污蔑，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灾难，是预示着没落的一个令人可悲的征候。

最后一点。拉维叶脱事件表明了波拿巴的警察局既愚蠢又凶残。警察局凭空制造了一个虚构的阴谋，而对真正的密谋，例如运送枪支弹药这样容易发生危险的活动，却一无所知。比埃特里的警犬伸长了鼻子到处乱嗅，结果毫无发现，许多起义者都逃脱了密探们的搜查。

比埃特里曾经希望，在他制造的布卢瓦假阴谋案中，或许能顺带抓到几名拉维叶脱事件的参与者：一批一批的公民被送交高等法院审判，拉维叶脱事件的参与者却一个也没有，都是些无辜的老百姓。这又是一个说明警察局无能的更可耻的证据，因为警察局掌握了它所怀疑的那些人的情况，但结果完全抓错了人。

更糟糕的是，在拉维叶脱事件失败后，除了两人偶然被捕以外，警察局竟找不到事件的领导人，而是盲目地把无辜的公民送交军事法庭处以死刑。真是既愚蠢又残暴。

拉维叶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布朗基、爱德、格朗热、卡里雅、前议员皮尔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弗洛特。特里东因病没有去。

这些人竟成了普鲁士人的奸细，真是咄咄怪事！

巴齐尔记者

1870年9月18日

《世纪报》向耶稣会教士们宣战。为什么它不留下一点火药向它自己的某些编辑开火呢？这些编辑们比巴齐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说布朗基在散布怀疑和泄气情绪，说他竭力使敌人相信：我们的人民是一群懦夫，巴黎的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只是装装门面，巴黎把战争当成儿戏，巴黎被利己主义所腐蚀，等等，等等。《祖国在危急中报》的读者们，你们有谁能够相信呢？

《世纪报》从哪里见过这类说法呢？

公民布朗基说，在巴黎有两股潮流，一股是忠于祖国的潮流，另一股是利己主义的潮流；他十分担心后者战胜前者。

他这里只是高声地指出了两股潮流在斗争，读者们可以有目共睹。我们是否需要把问题彻底说清楚，使诽谤者们哑口无言呢？我们下面就来说清楚吧。

《祖国在危急中报》反对签订屈辱的和约，并且每天都在揭露各种极其明显的征兆。主张签订和约的代表人物是梯也尔以及派遣他向我们的天然敌人——各国的君主政府——乞求怜悯的那些人。他们历来是《世纪报》的好朋友；如果说他们对布朗基公民有一点亲切好意，那就是希望一有机会就把他送去枪决。八里桥派了十二个人设下埋伏，准备抓住布朗基；一旦布朗基被抓，他们有些人一定会欣然同意把他枪决。

谁敢担保巴黎没有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求得和平呢？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有钱有势，能量很大，何况政府又是他们的忠实仆从。

因此，我们不禁疑团丛生，怀疑是否上了一个弥天大谎的当。因此，我们还担心战争的儿戏将以签订屈辱的和约而告终。

要出卖别人，很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别人的话加以歪曲，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要污蔑别人，也很简单，只要把别人针对蒙骗巴黎的那些人的指责说成是针对巴黎本身的。

不过，诽谤者的胆量真大，他们竟敢歪曲这样的话："究竟谁战胜谁呢，是热情洋溢的群众还是老奸巨猾的少数人？"

其实，布朗基并非不知道《世纪报》攻击他的原因。《世纪报》把秩序卫道士们的怒火引向布朗基，这是因为他不愿意再默认一项他从来就看得很清楚的政策；因为大敌当前，他过去没有说话，而现在局势已十分严重，他再也不能问心无愧地保持表面的同意了。

是的，抵抗外敌只是表面的活动。这个表面就是大多数的人民，而在表面的背后潜藏着的，则是谈判可耻和约以及那些鼓动谈判的利己主义者。这一小撮人如果没有政府作靠山，本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政府听命于他们，他们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表面上的群众的英雄主义被表面背后的一小撮懦夫的叛卖行为败坏了。

这些懦夫并没有全都空室而逃。还有许多人留下来要把我们葬送掉。让他们一个不剩地走光吧，他们是瘟疫，他们留下的房产比他们更加有用。

巴黎真是心急如焚，但又毫无定见。代他作主的是政府。《世纪报》不要假装不知道这一点，不要伪善地说，这个英雄的城市要乞求调停。

假如我们的报纸落在普鲁士人手中，他们不能得到任何情报。他们完全知道首都有两派：一派主张抗战到底；一派主张屈膝投降。究竟《世纪报》属于什么派，《祖国在危急中报》属于什么派，群众看得一清二楚。群众尤其能分清谁是虚伪的，谁是真诚的。即使是巴齐尔这样的污蔑老手也左右不了他们。

既然《世纪报》认为它有必要公开承认错误，那我们就算它承认了吧。儒尔·法夫尔的名言是“决不会让出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堡垒上的一块石头”，而《世纪报》曾愿意再补充一句：“决不会缴纳一个金币的赔款”。

《世纪报》决定不接受有代价的和平，反对普鲁士人敲骨吸髓的榨取，这真是好极了！

我们对它的这个声明感到高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愿它坚持到底，切莫食言。坦率地说，我们对它能否始终如一，没有完全的信心。

对它来说，出尔反尔并不算一回事。开始它说，由于布朗基散布失望情绪，巴黎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狱。过不了几行字，《世纪报》却又原封不动地抄袭这个散布失望情绪的人的一篇文章，攻击卖假药的丑角们吹牛夸口。

公民布朗基对待这些吹牛大王并没有《世纪报》那么严厉，但这并不影响《世纪报》强烈地谴责布朗基自己悲观失望，还要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

这位被人们称为鄙视巴黎的人在蒙马特尔被一千五百名坚强的公民一致推举为营长。显然并不是因为他在他们的耳边敲响了祖国的丧钟，使他们吓得魂不附体，而是因为他们不像巴齐尔那样理解《祖国在危急中报》上的文章。

让我们再一次阐明我们的思想。巴黎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都要求抗战到底。他们怒火中烧，坚决反对屈辱投降的主张。不是

让普鲁士人撤出法兰西的领土，就是让他们留下，用他们的尸骨肥沃法兰西的土地。应该偿付赔款的是掠夺者，而不是被掠夺者。

骄奢淫逸的巴黎迫不及待地要恢复他们失去了的纸醉金迷的生活，那怕以荣誉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发言权太多了。到目前为止，始终是他们在发号施令。正是他们在人们英勇奋斗的时刻背地里干着屈膝投降的卑鄙勾当。

《世纪报》对他们应当有所了解，因为和《祖国在危急中报》的小百姓相比，它同他们的关系紧密得多。

反　动

1870年9月19日

九月四日，面对着国难的日益深重，共和主义者抛开了各种派别之争，一致同意给予临时政府以支持。

支持附有一项条件，即共同把反对外国入侵者的抗战进行到底。

没有一个共和主义者因此停止了思考和观察。所有的人都继续忧心忡忡地考虑着一个问题："祖国是否能够得到坚决的保卫？"

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他们痛心地看到，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人们力图把独立和自由分开，但这是徒劳的。在法国，二者只能成为一项事业。

皇帝出卖了祖国并垮了台，因为他企图一手同外敌作战，一手却对内镇压自由。他的左手使右手陷于瘫痪。他葬送了我们的军队，又使国家坠入了深渊。

可惜的是这个教训没有被吸取！

经过短暂的狂热和某些同心同德的假象以后，致命的对立又重新出现。这种对立正日益尖锐。我们又回到了八月份的局面。临时政府不过是帝国的拙劣的翻版。

临时政府害怕革命胜过害怕普鲁士，戒备巴黎胜过戒备威廉。它无时无事不对人民表示怀疑和敌对。

谁是这场决裂的罪魁祸首呢？是谁首先违背了合作的条件呢？合作的协议是在全民抗战的基础上达成的。首先违背全民抗战这一纲领的，难道不就是新政权吗？——新政权甚至一分钟也没有遵循过这个纲领。

可以肯定，在九月四日以后，帝国和普鲁士立即就同流合污了，威廉和波拿巴成了两位盟友。进一步说，在今天，所有的保皇派，不论是哪一派，都和外国入侵者结成了联盟来反对共和国，而共和国就是法兰西。

如果屈辱的和约使法国割地或赔款，那么，除了敌人以外，谁还能得到好处呢？那就是国王。法兰西的被宰割和被洗劫，将对国王有利。

如果说，把所有君主主义者都当作入侵者的积极帮凶看待，未免不太公正，那么，对于那些曾在所有的腐败政权下乞求过官职的帝国官吏，则肯定不必给予同样的宽容。

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对共和国发泄了他们的狂怒。他们公开投敌，他们为敌人鸣锣开道、招兵买马。这里，我们不必历数他们的种种卖国丑行。有关的报道在报刊上比比皆是。

要求撤销这些卖国贼的官职，难道这是破坏同心同德的协议吗？

维护他们的职权，难道这不是怂恿他们利用这种职权去干罪恶的勾当吗？

九月四日以来，共和主义者恳请政府罢免区长和民事法官，他们过去是专制制度的奴颜婢膝的工具，今天是阴谋和混乱的制造者。

政府对此置若罔闻。

巴黎对原来的警察部队的血腥镇压记忆犹新，不断要求遣散这支部队。——政府对此置若罔闻。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警察局长仅仅把市近卫队改称为共和近卫队，把挥舞大棒的巡警改称警察。从此以后，当局就完全可以依靠这两支人人痛恨的队伍了。

主意既定，当局对于任何抱怨、指责、请求、恳求，坚决地一概加以拒绝。他们的回答只是号召安静和服从。他们利用爱国者的忠诚和痛苦，真是不择手段。

“团结”一词已成为一切敌人反对自由的武器。我们要正告你们，共和主义者认为，同心同德不等于顺从反革命分子。共和主义者要求团结是为了拯救共和国，而决不是为了毁灭共和国。

普鲁士国王和临时政府

1870年9月20日

普鲁士国王不久前在兰斯城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拿破仑第三皇帝是法兰西唯一的合法君主，而现政府则是由巴黎的乱党搞出来的篡权政府。

威廉在这项声明中以上天的使者的名义，宣布他自己是法兰西的监护人和仲裁者，享有认可或取消该附属国政府的最高决定权；他向国防委员会下令召集议会，并责成议会把普鲁士国王的钦命固定为法律。

临时政府对这个无礼的举动俯首听命；它放弃了自己的权责，

卑躬屈膝地服从了普鲁士国王的命令。它承认普王有权随意废除或批准法国人民的决定，并赶紧宣布在十月二日召开制宪会议，以满足胜利者威廉的旨意。

制宪会议的选举将在临时政府留用的帝国时代的官吏的压力下进行。普鲁士人的恐怖暴行，波拿巴将坐着普鲁士的战车回到法国的前景，帝国死党们的肆意污蔑，农村受到蹂躏、城市被烧杀劫掠一空的情景，所有这一切都将使居民们在投票时心绪不宁。

由普鲁士和波拿巴合谋召开的制宪会议，将在法国人的尸体堆上和法国城镇的废墟上把威廉的听差重新扶上王位。

德意志的恶棍使我们不幸的国家蒙受了耻辱，把它推进了深渊，而国防政府却匍匐在这个恶棍的马鞭之下，并把国家出卖给他，这样的政府没有资格再叫国防政府。

这个政府的成立本来就很成问题，因为它依据的是已经失效的议员证书。

它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它的先天不足。

这个政府的成员驯服地听命于普鲁士国王，甘愿让民族遭受耻辱和破产，任何有一点爱国心的人对他们无不义愤填膺。九月十六日的政府命令，确定于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举行市政选举，于十月二日举行议会选举；这个命令实现之日，也就是法兰西亡国之时。

巴黎市议会一致奋起抗议，坚决反对这项不祥的措施。但这还不够。国防委员会已经背弃了它的全部义务，它并不保卫国家，而是把国家出卖给普鲁士。它的职权已经被撤销，它应该解散。

但是，有资格代表法兰西的也不是外省。外省或者处在普鲁士铁蹄的践踏之下，或者被恐怖和欺骗扼住了咽喉，它们身不由己，没有一点自由。要使外省恢复法兰西的素质，必须把德国鬼子逐出国土和惩办法奸的卖国罪行。

各地坚强勇敢的公民们都拥护抗战的主张。他们热情地支持并欢呼救亡措施。

因此，只有武装的法兰西才能站在入侵者的面前代表整个民族。这支强大的优秀队伍集中了国家的全部有生力量，她是祖国的形象，她是祖国的保卫者。她为祖国而战斗，因此也应该由她来治理国家。

四十万名巴黎人，十五万名来自各地的别动队，十万名正规军，这就是今天的法兰西——手持利剑抵抗野蛮人的法兰西！

应该由他们来选择法兰西的政府，应该由他们把权力授予那些在他们看来有资格、有能力领导他们走向解放的人们。谁敢争夺他们的这个权利呢？难道是那些由可耻的旧议会在垂死挣扎中产生的一伙庸才吗？

尽管全体共和主义者对临时政府十分反感，但他们仍然对它表示了忠诚和支持。可是临时政府却利用了他们的这种支持，把波拿巴在我们的脚下掘成的鸿沟挖得更深了。

我们忍受了一切，但现在事情已到了物极必反的程度。要我们在普鲁士的军事专制面前匍匐跪拜，要我们充当威廉的保镖和跟班，这实在太过份了。今天，集中在巴黎的六十万名手持刺刀的战士代表着全法国，只有他们才有权代表民族的意志。

让巴黎二十岁以上的全体居民，让别动队和正规军一起集合在战旗之下，以营为单位进行投票，选出九人组成的政府，实行战时独裁，负责把抗战进行到底，直到把日耳曼强盗消灭干净。

巴黎各区的区政府将负责组织选举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维持秩序和自由。

哪个叛逆分子胆敢反对这个神圣的行动呢？

我们要枪炮和子弹

1870年9月22日

局势再也支撑不下去了，随时都有发生灾难的危险。

国防政府不愿搞国防，法兰西怎么能够在这种致命的矛盾中生存下去呢？

国家对战争感到十分厌恶，简直到了绝望的地步。由于中了别人的奸计，法兰西才卷入了战争。但是，如果说在七月六日主张战争是犯罪，那么到了九月二十日，主张和平就是犯罪了。

市政厅① 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

现在不是追究罪责的时候。然而必须指出，在七月六日，共和派愤慨地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对法兰西和共和思想都是致命的打击。

相反，保守派主张战争，企图把战争当作反革命的工具。

今天，保守派和共和派的地位没有变化，但他们的主张却倒了过来。保守派正在阴谋策划罪恶的和平，他们为了推翻共和国，哪怕葬送法兰西也在所不惜。

革命派大声疾呼，要求抗战到底，认为这是挽救民族的唯一希望。

一旦保守派的阴谋得逞，法兰西民族将从此一蹶不振。割地和赔款也许只是最起码的不幸。

致命的打击是蒙受耻辱。

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民族被开除出人类社会的行列；它从此精神衰竭，一落千丈，跌进坟墓，再也不能复兴。

---

① 指国防政府，因其所在地设在巴黎市政厅而得名。——译者

我们已经到了波拿巴为我们掘好的坟墓的边缘。

反动派要把我们推进坟墓。他们曾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并利用胜利来葬送法兰西，但没有能够得逞。现在他们又想用战争的失败来实现他们的阴谋。

他们要把法兰西的尸体交给君主制。对君主制来说，它所得到的法兰西是活的还是死的，这并不重要。

我们要求把储藏在万森和蒙瓦勒里安军火库中的武器立即运送到巴黎，要求立即动员大批人员和车辆以最快的速度运输完毕。

昨天，人们已在担心蒙瓦勒里安和巴黎之间的交通可能被切断。敌人用大量兵力控制着城西部。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不能得到储藏在蒙瓦勒里安炮台的武器，而储藏在该炮台的武器，同万森一样，为数非常可观。

昨天战事的失利告诉我们，除了驻扎在各区的国民自卫军和别动队以外，首都很快将没有别的城防部队可依靠了。

别动队有沙斯波式步枪，国民自卫军还没有。原有的六十个营的武器是滑膛枪。新建立的营虽然兵员众多，士气高昂，却只有破旧不堪的前膛枪，依靠这样的武器，即使执行军事掩护的任务也是难于应付的。

由于连坏枪也不够分配，无数工人简直是赤手空拳。难道还能因为疏忽大意，而使他们不能得到两个炮台里的优良武器吗？

如果再不把万森和蒙瓦勒里安的全部武器立即运到巴黎，这将是一个真正的叛卖行为。

九月四日以来，所谓的国防政府只有和平这一个念头——不是胜利的和平，甚至也不是体面的和平，而是无条件的和平。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念念不忘的主张。

他们不相信能够抗战到底，他们相信普鲁士人必定胜利。这种前景时刻萦绕在他们的心头，这种信念在高级官方人士中也没

有任何人反对。

既然确信战争必定失败，人们还会准备去打仗吗？既然事先断定抗战没有什么好处，又不会有什么结果，人们又何必再去组织抗战呢？

这种致命的成见只能导致灾难。灰心丧气和敷衍了事是灾难的前奏。一旦灾难成为既成事实，罪魁祸首们就可以炫耀他们的预见，高喊道："我早就料到了！"

亡国就是这么亡的。

我们是否将跌进亡国的深渊呢？遭受了烧杀抢掠的法兰西是否另外还要为它的亡国和耻辱再给它的蹂躏者一笔几十亿法郎的小费呢？

巴黎虽然犯了许多军事错误，但巴黎始终屹立着。我们要把钱留着买子弹和枪炮。买一百万支沙斯波式步枪，只要花一亿法郎，等于普鲁士索取的赔款的五十分之一。

一个金币也不给普鲁士人！我们要枪炮和子弹。

被愚弄的巴黎

1870年9月26日

国民自卫军各营营长和人民代表于九月十九日要求推迟外省的市政选举以及议会选举。

政府的回答冠冕堂皇，但又含糊其词。不过，它放出风声说，选举不举行了。

人民相信了这些诺言。

但是确定于九月二十五日举行各省市政选举的九月十六日命令并没有撤销，继续有法律效力。

明天就是九月二十五日，这项命令将付诸实施。命令的实施

在城市将使共和派的力量有所壮大，但是在乡村，得势的将是帝制派，确切地说，是普鲁士国王。因为帝制派和侵略者已经结成了联盟。

某些报纸的虚伪言辞纯粹是为他们的阴谋在打掩护，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将几乎只能听任敌人的宰割。明天，在惊恐万状的乡村市镇，一切反革命势力将抬头，他们将毫无阻碍地获取选举的胜利。这次选举将成为灾难性的全民投票的翻版。这回的胜利者不是波拿巴，而是威廉，或者不如说是这两位好盟友一起在这次农民选举中得胜。

谁能说反革命派不会获得更加全面的胜利呢？推迟议会选举的命令今天早晨（九月二十四日）才在《政府公报》发表。而人民代表于十九日就已经提出了推迟议会选举的要求，当时巴黎和外地的交通还没有被隔断。

今天交通已经隔断了。命令不能通过敌人的包围线，外省也就无从得到消息。何况，贵族阶级并不会急于去执行使他们的希望破灭的命令。他们倒是乐于利用巴黎被围困的状况，放手搞他们的阴谋诡计，即使得到命令，他们也将照旧举行议会选举。

这个所谓的制宪会议，我们早就看透了。

这个会议的代表是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挑选来的，它将在外省的某个城市开会并宣布取消巴黎的首都地位。它将代表全民族命令巴黎放下武器，否则就以叛乱论处。

人们会说，这是幻想，制宪会议一定开不成，因为选举已经推迟。无论如何，选举都是无效的。

无效！我们等着瞧吧，看这个根据公认的现行法令并通过普选产生的会议是否会在没有委托书的政府面前甘拜下风，看这个空有其名的政府是否会随心所欲地取消根据民意产生的议会。

到那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报纸上登载的那些决心战死的漂亮

誓言有多大的价值。这种居心险恶的弥天大谎只有保皇党才懂得它的威力和奥妙。

他们今天向天真的人们叫嚷“战斗到死！”的口号，一旦普鲁士和波拿巴合谋召开的制宪会议喊出“跪下！”的命令，他们全都会跪在地下。

这样的先例人们不是不知道，可惜知道也没有用！活着的一代人永远也不会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八四八年的失败并不能使法兰西在一八七〇年免遭更惨重的失败。在一八四八年，失去的只是自由，而明天，将同自由一起失去的还有独立和祖国。根据“国民大会”的意愿，卖国贼将登上国王的宝座。

为什么想得这么阴暗呢？——《政府公报》不是宣布推迟选举了吗？就算是吧！但是九月十六日的命令并没有收回。一个命令在没有正式撤销以前总是个命令，它是经过法律手续通过的，不是随便一句话所能废除了的。

即使《政府公报》送到了外省贵族们的面前，他们对于这两行毫无价值的文字又能给予多少重视？何况是否真正能够送到，还是个疑问。

如果制宪会议得以召开，即使是不合法的，我们也还是要倒霉！我们的街垒、军队和刺刀都将自动摧毁，如同听到耶利哥的羊角声① 一样。农民将不费吹灰之力使巴黎跪倒在威廉国王的脚下。

但愿这些担心只不过是过份的猜疑！

---

① 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士兵用吹羊角的声音，使坚固的耶利哥城墙倒塌。(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六章第2—5、12—20节)。——译者

抗战的必需

1870年9月28日

局势越来越危急。现在是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自从被围困以来，巴黎如同失事者在大海中寻找避难的孤岛。社会事业再也不能依旧由个人经营，否则就会大难临头。

巴黎城有三个月的给养；然而，围困才五天，各种食品的价格却就已经迅速上涨了。

如果是由于食物稀少，那还可以理解。但食物很充足。因此，物价暴涨就毫无道理，不能原谅。只能用贪财二字来解释。

今天，全民武装的巴黎是民族的最后一个城堡。她是法兰西的保证。她不能再由利己主义支配了。每一个手持武器的人都是祖国的最重要的财富。他的生命完全属于抗战。无论是他或是他的家庭都不应该成为投机分子手中的玩物。

大家切莫搞错了，现在的局势很紧急，我们被扼住了喉咙，已经无力反抗。

有一种社会观，三十年来在报刊上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有些人对它嗤之以鼻，有些人则视为洪水猛兽；可是，这种社会观在我们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却突然被当作势在必行的需要提了出来，而不再被看作是空泛的论战题材，这真是一个奇迹！

财产公有的乌托邦思想，突然降临于刚从花天酒地的睡梦中惊醒的伟大文明之都。这并非如同乌托邦的弟子们所希望的那样，是由于人性趋向完美的自然结果，而是迅雷般的突然爆发。人们必须接受它，否则就是灭亡。

国民自卫军的军饷每天要花费六十万法郎。政府宣布八天之内国库将告枯竭。可是人们还有许许多多十分紧迫的开支。

显然，习惯的交换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生活。它的前提消失了。供求法则已不再存在，因为这个法则的基础——货物的流通自由——已完全消失了。

人和物全都受到了普鲁士人的封锁。被包围的人有二百万，食物只够三个月，再也不能得到补充。如果听任货币主宰一切，就一定会把五分之四的居民置于死地。首先死去的将是祖国最可靠的保卫者。

虽然金钱还可以支配大多数的交易，但是食物和燃料必须按人口分配，除了年龄差别外，每个人都应得到平等的份额。

至于衣服，全体居民也应当在必要的穿着方面享有同等权利。高级衣料可以依然是有钱人的特权。无产阶级对此并不坚持。

因此，必须立即对一切食物实行普遍的登记，根据平等的原则确定每天分配的份额。主持这件庞大工作的任务主要应由妇女担任。

营私舞弊者必须处以最严厉的惩罚。

从现在开始，全体公民都是抗战事业的一分子，应该根据他们的能力和职业分配一定的任务。从十八岁到六十岁的全体公民都必须服兵役和参加各项抗战勤务。

除以上规定的任务外，每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的事情。

作为公共事业，印刷厂应维持现状不变，但在听到拿起武器参加战斗的号召时，当作别论。

现有库存的食物数量每天由官方公布。

如果围困继续下去，定量还应当减少。

巴黎不应该投降，并且决不投降。

巴黎就像一艘风雨飘摇中的航船，每人都是船员，每人都有一份饭吃，都得干一份活。

否则，航船就要沉没。

生死存亡的问题

1870年10月3日

局面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流沙在慢慢地吞没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危局。

饥馑、敌人、叛卖咄咄逼人地围攻着祖国。它们像几把钳子紧紧夹在我们身上，正把我们撕成碎块。光明啊，不在这黑暗中找到光明，我们就在这黑暗中死去!!

首先，图尔发生了什么事情?

孤立无援的巴黎落在那伙梦寐以求想搞垮巴黎的人手里。他们本来是不敢同巴黎发生正面冲突的。现在巴黎成了普鲁士监狱中的囚犯，卖国贼们的胆子壮了起来，放肆地玩弄种种阴谋诡计。

据说，克莱米约①及其一伙不中用的随从们已被在这场风暴中沉渣泛起的正统派所淹没。又说，中央政府派出的这位大员只是为旧时代的复辟者充当有名无实的旗帜。

据说，富里雄——正统派的头目，屠杀共和党人的刽子手，卡宴②的非刑拷打者——在图尔发号施令，正为亨利第五③准备行宫。

是谁任命了这个混蛋的?是谁给了他这些权力来反对共和国的?有人说他是“久经沙场、战功卓著的老军人”，我们再也不能被

---

① 克莱米约（1796—1880年），国防政府的司法部长。这里指1870年9月中旬被派往图尔组织地方力量抵抗德军入侵并沟通对外关系的国防政府代表团。——译者。

② 卡宴为法属圭亚那首府，苦役和流放的所在。富利雄曾于1852年任圭亚那总督。——译者

③ 指尚博尔伯爵。他是波旁王朝长系中的王位僭望者。——译者

这些骗子手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了。

阴谋活动在外省搞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在巴黎，则搞得偷偷摸摸，耍尽种种奸诈和伪善的手法。

敌人就像在一八四八年那时一样，肆无忌惮地进行污蔑。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断头台的阶梯，流放的前奏。

那么，防务进行得如何呢？至今还在说假话和装门面。巴黎从没有组织过防务，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他们把普鲁士人养起来，准备有朝一日对付“蛊惑分子”。

你们可得知道，“蛊惑分子”将起而反抗，决不听任你们的宰割。他们在一八四八年过于优柔寡断了。他们孤立无援，只得引颈就戮。

在一八七〇年的今天，他们代表着祖国。他们将像猛虎一样，用利爪和牙齿来保卫祖国。反动派的叫嚣和猖狂使他们懂得局势的危险。卖国贼们必将被他们的锐利目光所揭穿，必将受到应得的报复。

喔，你们的命令，我们一看就明白，不费脑子就能猜到。

你们说：“新的营不再成立，因为没有武器可发。”

这就是说：“平民们响应民主的号召而自动组织的营太多了！不要这许多武装的蛊惑分子去保卫我们恨透了的共和国。不发武器，不准组织新的营！”

你们在说谎！枪并不缺少。打开军火库的大门，让大家去检查。你们的话，我们不相信了。武器是有的，你们应当把它们发给人民。人民要真抗战，不要假抗战。再说一遍，打开军火库，让我们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不让我们亲眼去看，我们就要说：“你们在说谎，你们是卖国贼！”

关于选举，我们也明白了。《政府公报》说了真心话：“政府的意图始终是在最短期间内进行各项选举。”

“各项选举”，这就包括“议会选举”。巴黎的市政选举只是借口和烟幕。他们提出巴黎市政选举，就是为了要召开制宪会议。召开制宪会议！这曾经是反动派在一八四八年的口号，也是他们在一八七〇年的口号。

卖国贼的绝招，就是求助于被二十年的压迫所麻木、被普鲁士人所吓慌、被反革命的污蔑引上歧途的乡村人民。至于通过辩论而心明眼亮的巴黎，却备受嫌疑和排斥，受到这些怒气冲冲的外省笨蛋们的责难。

他们所要的是议会选举，以便把我们出卖给敌人；他们不要的是巴黎的选举，因为巴黎的选举将会由成立共和国而拯救法兰西。

因为，同一八四八年那时一样，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的共和国。今天的共和国是戴在反革命脸上的一副假面具。反革命觉得这个面具是个负担，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抛掉。

我们也迫切地要把我们的对手的假面具揭掉，以暴露他们的真面目。这个伟大的日子必将来到。

军事独裁

1870年10月4日

特洛胥将军在公民的责任心方面名声不算太好：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激烈的共和派，也算不上是一个温和的共和派，甚至连最起码的共和派也算不上。

从来没有人把“共和派”这个不合适的称号安在他的头上。说他是“共和派”未免不公道，简直近乎污蔑。特洛胥将军先生是布列塔尼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君主制和教会的干将。他今天是共和国的独裁者，因为幽灵是不能当作活人看的。

国防政府是个外表，特洛胥先生却实际存在。一些惊慌失措

的律师，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凑巧碰到了一位将军，于是就把他抓住不放。

普鲁士人打过来了，必须遏制他们。这里现成有一位将军；且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也不问是谁让他当上了将军的，这一切都并不重要。他是在职的，正领导着军队和防务。他当政已有二十天了。

这是一个新的纪元，几乎可以说是一次改朝换代。但是，一天之内能不能够改朝换代呢？又由谁来代替旧王朝呢？

在和平时期，律师是风云人物。可是，一旦敌人逼境，他们的威望也就烟消云散了。现在轮到将军们吃香了。将军和将军也有不同。特洛胥先生是个现成的将军，因此他也就只会坐享现成：他很少打仗，却大搞政治。

要是他能打仗也还好呀！可惜，尽管他有沙斯波式步枪，仗却打得并不出色。人们原以为他是战场上的一只雄鹰，现在却发现这只鹰飞得竟是如此的低。伟大的事件造就大人物，同时也淘汰小人物。

人们毫不考虑特洛胥是否够格，就放手地让他搞军事独裁。于是，军事独裁就搞了起来。在政治方面，我们对军事独裁已有所了解；在军事方面，则了解得很少。发布命令比打胜仗来得容易。关于这一点，假如说我们过去一无所知，那么，两个月以来，我们也已经知道了，而今天则看得更清楚。

在某些时候，军事独裁决定着民族的命运。现在，国防政府已为军事独裁所取代，人们是否应该对此感到庆幸呢？

这个军事独裁在普鲁士人面前表现如何呢？它在夏蒂荣战役中打了败仗以后，不久前又在舍维依战役中打了败仗。

巴黎城内拥有六十万名武装士兵。敌人的兵力没有那么多。我们承认普鲁士人在武器、战术和纪律等方面占优势。这些都很

重要，但兵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求战心和士气更是如此。

为什么不尊重军事规律，不接受最近的教训，硬要去以少拚多呢？在拥有六十万城防部队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派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名士兵去冒险发动进攻呢？失败是肯定无疑的。难道建立军事独裁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好处吗？

我知道，人们将回答我说："这六十万人只不过空有其名。实际上，能派用场的不到十五万人。除去堡垒沿线和城墙沿线的驻军，再除掉无所事事的后备队，还能剩下多少呢？"

剩下的兵力确实很少了；凭这点兵力，我们就只能挨打，只能让人垂头丧气。可是，如果说可支配的兵力这么少，这是谁的过错呢？

为什么国民自卫军只有四十万人——真正讲起来，不如说只有二十五万人——，为什么这支军队只是个空架子呢？因为人们害怕它，不是依靠它，而是把它看作祸害；因为反动派害怕革命更甚于害怕威廉和俾斯麦。

现在的独裁是反革命的，任何人对此都不能怀疑了。如果法兰西不搞共和国，独裁者或许还情愿把法兰西从普鲁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可是，要搞共和国，他是感到深恶痛绝的。

市郊的二十五万国民自卫军，如果成为一支军队，将是革命的军队。所以人们不愿意使它成为一支军队。

请看人们发给他们的是什么武器，简直笑话！那是些木刀。可是，他们手里拿着这些木刀，也使人感到害怕。国民自卫军正在各地组织新的营队。现在营队已经相当多了！这么多的营队即使赤手空拳，也够吓人的了。

如果全副武装起来，他们足以对付敌人，不必再去恳求别人。可是，一旦消灭了普鲁士人，他们就会成立共和国。于是，反动派在心里高喊：那还不如让法兰西亡国！

国难日益深重

1870年10月5日

图尔和施特拉斯堡均告失守。普鲁士人又将得到八万名士兵和围城的炮队，他们的力量更加强了。外省的消息一点也没有。黑暗越来越浓厚地笼罩着我们。

为什么政府要制造黑暗？为什么它隐藏收到的电报？据消息灵通的《自由选民报》①说，市政厅收到了克莱米约公民的一份长篇报告，这份报告使市政厅在惊诧之余感到十分苦恼。

关于这份报告，《政府公报》一句话不说，甚至根本没有提到。

巴黎轻率地把法兰西的命运交给了政府，难道政府应该这样对待被围困的巴黎吗？

大家都感到焦虑不安，等着政府说一句话，看事情是否还有一线希望，而政府在这时候却沉默不言，把收到的严重消息隐藏起来，欺骗巴黎。

固然，关于施特拉斯堡和图尔的失守，它已经说了。但为什么它说了呢？因为这件战事并非取决于它，它只承担一小部分责任。

相反，图尔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政府的无能和偏私：从皮卡尔先生的像天书一样难懂的文章里，人们可以容易地猜到，克莱米约听任外省的局势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并且给祖国的命运带来了也许是不可弥补的损害。

这篇像天书一样的文章，通篇含糊不清，晦涩难懂，而又埋伏着危险。皮卡尔的报纸说："我们相信，富里雄海军上将定能忠于职守，并竭尽全力组织抗战。"

---

① 共和派右翼的机关刊物，该报主编为阿尔图尔·皮卡尔，是国防政府财政部长恩斯特·皮卡尔的弟弟。——译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相信的正是相反。报纸对于没有向外省派遣强有力的中央特派员表示遗憾，这就使这句话的意思更加清楚了。

作者激动地说："政府对于这种疏忽至今没有后悔之意"。他要求立即撤销图尔政府，由中央特派员乘坐气球去接替。

这番话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惊恐。皮卡尔先生并不是一个强烈的共和主义者，看到他突然要求采取革命措施，人们当然要感到惊异。

这篇阴暗和晦涩的文章表明，我们在图尔没有政府，没有军队，也没有政治活动。正统派报纸的大胆和吹嘘终于暴露了自己的秘密。保皇党控制着卢瓦尔河流域，他们不但不援救共和国和巴黎，而且梦寐以求地要消灭共和国和巴黎。

政府同波拿巴一样，处处提防巴黎人民；它的手法没有波拿巴那样粗暴，但它对巴黎人民的仇恨却同波拿巴一样强烈。它对反动报纸关怀备至。凯撒① 下台以后，那些原来为他服务的报纸都自告奋勇地，也许是免费地转而为市政厅效劳；但是，它们也同样忠心耿耿地支持现在的当权人物。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共和国。

为了利于它们将来的发展，所谓的自由派报纸也跟着反动报纸跑，不过有点扭捏而已。它们责备当局行动迟缓，犹豫不决，同时又把反对派——共和主义者——痛骂一通；如同在波拿巴统治期间一样，它们高唱团结和绝对支持这一套老调。

它们以抗战的名义要求人们作出自我牺牲；而抗战的最大障碍，恰恰就是政府本身。

① 凯撒（公元前 101—44 年），罗马时代的独裁者，这里指拿破仑第三。——译者

自从九月四日以来．政府不断通过政治的、行政的和军事的措施损害抗战事业。政府在出卖我们，而它们却叫嚷“保护政府”；政府把我们引向深渊，而它们却叫嚷“跟政府走”。

抗战的第一幕应该是清除那些使抗战无法进行的人。

卖国的准备

1870年10月6日

普鲁士人把巴黎囚进了牢笼，而我们的政府却对此保守绝对的机密。

这是为谁保密？狱吏总是根据上司的命令行事的。

九月四日以来，在我们的面前是一片沉默。九月十九日，我们又被关了禁闭。今天，巴黎被押到了黑牢的最底层。

政府对巴黎隐瞒外界的消息，隐瞒自己的行动，隐瞒自己的计划，使巴黎生活在黑暗之中。

据说，图尔和施特拉斯堡先后于九月十八日和二十一日投降。而公众直到十月三日由于有人走漏风声，才得知了这些失败的消息。

据说，卢瓦尔军团①已被围城的普军所派出的一支部队击败。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究竟有没有一个卢瓦尔军团？

对于这些可能决定法兰西命运的问题，市政厅咬紧牙关，只字不露。

据皮卡尔的报纸透露，克莱米约从图尔发来了一份情况不妙的电报。

市政厅保持着沉默。它不把电报公诸于众，甚至究竟有没有

---

① 卢瓦尔军团是国防政府于1870年10月开始组织成立的，该军团在奥尔良地区进行军事活动。——译者

这样一份电报，它也不置可否。

但是，沉默本身就是彻底暴露政府意图的一个公开声明。政府的一贯主张，政府不断使用种种可耻手段所追求的目标，无非是求得无条件的和平，即丧权辱国的和平。这是人所共知的。

儒尔·法夫尔厚着脸皮花了三天时间在普鲁士的兵营里乞求和平①。大家知道他带回了什么：一场使法兰西民族永远不会忘却的耻辱，一篇使所有的女人痛哭流涕的悲天悯人的演说。

受了这种侮辱，男子汉们竟不是个个义愤填膺，这是我们民族衰退的可悲征兆。他们听了儒尔·法夫尔的演说，只流了几滴感动的眼泪，真是些十足的拜占廷式的亡国奴。

人们没有看到，这种隐蔽的独断专行——一个人在半夜里偷偷摸摸地溜出城门，背着大家跑到俾斯麦的客厅里，自作主张地拿祖国的生死存亡问题去作交易——对国家是何等的可怕。

受了侮辱之后，狼狈不堪的求和者捶胸顿足，对天发誓，大声叫嚷要报仇雪耻。他们宣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要决一死战，不胜利毋宁死，说尽了一切比唱得还好听的虚夸言词。

这完全是演戏和说谎。他们在易于受骗的傻瓜面前向俾斯麦挥拳示威，在幕后却又继续叩头求和。他们从未停止过谈判，也就是说，一直在哭哭啼啼和苦苦哀求。

这些人心里想的从来就是求和。自从九月四日以来，他们不停地在乞求和平，至今还在向欧洲各国政府乞求，请他们调解和平。

---

① 国防政府代表法夫尔和俾斯麦于1870年9月19日和20日在上梅宗和费里埃尔举行谈判。俾斯麦提出下述要求作为停战条件：交出比奇、土尔和斯特拉斯堡，保持对巴黎的包围或者交出巴黎的一个堡垒，继续保持麦茨地区的行动。俾斯麦还要求把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三分之一地方割让给德国作为缔结和约的条件。在法夫尔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后，谈判即告破裂。——译者

他们将为和平付出什么代价，这一点已为人所共知了。他们准备交出国家的黄金，也许还要割让土地，但首先是要牺牲共和制。共和国将被我们的独裁者和威廉一起兴高采烈地扼杀，作为第一份祭品供上祭坛。普鲁士人将和保皇党在共和国的尸体上拥抱言欢。

开祭的时间快到了。随着镇压措施和专制措施的日益加强，人们预感到政变即将来到。

军事法庭的严峻法律，普选的被取消，国民自卫军实行了军队体制并被剥夺了选举自己长官的权利，以及禁止招收新兵扩充国民自卫军，这一切都是危机的前兆。

共和国的死刑已经宣判了。人们正准备着执行这一判决。

局　　势

1870年10月7日

市政厅就克莱米约电报一事进行辟谣。《政府公报》说："克莱米约电报纯属造谣分子的臆测。"

造谣分子就是皮卡尔先生，他是市政厅的十二名或十四名政府成员之一。

究竟是谁造谣，是政府机关报《政府公报》还是政府的十二名头目之一？

克莱米约的报告极其明显地暗示了人员的不足和无能以及正统派的猖獗，这使市政厅十分苦恼；人们难道能够相信，这份报告竟是一个人杜撰出来的吗？

不，造谣者决非《自由选民报》，而是辟谣者《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显得很尴尬，但却厚着脸皮吞吞吐吐地说了些否认的话，这样，它便可以理直气壮地继续玩弄它那套骗人的伎俩。

但是，谁也不会再上当了。卢瓦尔军团或者是一种虚构的神话，或者只是一伙残兵败将。或者它根本不存在，或者它现在不再存在了。二者必居其一。

人们曾指望得到外省的救援；而无论里昂或图尔，都派不出援军。里昂正在坚强地战斗，可是军方却加以镇压和控制；军方没有能力使人民就范，于是就阻碍它，嫉妒它，使它陷于瘫痪。

图尔和西部地区控制在反动派的手中，他们施展了种种阴谋，层层包围巴黎任命的影子政府。

共和国不可能从这方面得到任何救援，即使是英勇不屈的里昂，也不能够指望。从施特拉斯堡解脱出来的普军正向罗尼河进发，以便同俾斯麦的心腹之患里昂军队作战。

里昂不但救不了我们，也许反而需要我们的救援。

巴黎只能而且只应该依靠自己。

如果政府不是忙于向欧洲各国乞求和平，而是及早地组织抗战，普鲁士人决不会打到我们的城下。

共和主义者必须向市政厅指出两条极其严重的罪过：政府把海军大炮丢弃在西海岸的各个军港；让武器弹药闲置在各军火库中，而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大炮和武器弹药，我们就能防止普鲁士的大炮打到巴黎。

九月四日以来，政府没有让首都的工厂制造过野战炮。否则，我们今天就会有一千门这样的大炮。

政府没有向英国购买雷明顿步枪。否则，在九月二十日巴黎被围困之前，我们就能得到三十万支。

可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武器。用旧枪是无法同普鲁士人作战的。

我们今天所以处于这种可怕的局面，完全应该责怪市政厅的当权者。他们自称是国防政府，却又阻挠抗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从来只有一个目标：缔结和约，不惜一切代价。

市政选举

1870年10月8日

共和党人一致要求在短期内进行市政选举，或者最好立即就进行市政选举。

有些人曾经以谨慎为借口提出了相反的意见，现在这些意见愈来愈少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听不到了。

明显的道理压倒了一切。反动派的恼羞成怒反而驱使人们消除了最后的怀疑。反动派的狂怒和污蔑使人们认识到必须采取救亡措施。

保皇党的大小报纸无不大吵大闹，反对巴黎的选举。所有这些狡诈阴险的报刊都明白，人民的选票将使共和国获救，将使共和国摆脱卖国贼的魔爪。

同样，政府也十分激动和恐惧；不过，它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谨慎要求它不暴露自己。

政府假意在原则上同意选举，却用种种托词进行拖延。它的同意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一天一天拖下去，直到最后饥馑迫使人民停止抗战，并把共和国拱手交给普鲁士人和保皇党；这就是政府确定不移的目标。

它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着时间，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它感到如释重负。巴黎现有的两个阵营有着不同的想法。反动派盼望普鲁士人早日来解放他们，他们看到等待已久的那一天即将来到，已经在欢呼黎明的曙光。

革命派怒发冲冠，痛心疾首，再也控制不住他们的满腔悲愤。

如同过去一样，敌人利用革命派的爱国心和良心来欺侮他们。这是奸恶和忠诚进行的一场悲壮的斗争。

奸贼们能够像一八四八年一样取得胜利吗？他们肆无忌惮地玩弄花招，极端鄙视他们的忠厚老实的敌手。他们不择手段，而他们的敌手却束手无策。双方不是棋逢对手。

保守分子今天成了法奸的同义语。这并不是第一次；在一八四八年，《红色幽灵报》的罗米厄就曾狂叫："必须恢复社会秩序，那怕借助俄国的大炮！"

当时俄国的大炮离得很远，而今天普鲁士的大炮就在我们的门口轰响；保守分子听到这些宣告他们即将得救的炮声，心里高兴得不能平静。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他们情不自禁地脱口说出这些渎神的愿望。这些愿望逐渐成为街谈巷议，为人们所接受。它们将很快成为秩序的象征和法律的体现，反对者将被关进监狱。

目前，反对者蒙受着无耻的污蔑；当他们指责市政厅出卖抗战事业的时候，当他们揭露政府敷衍塞责和临阵脱逃的时候，他们竟被按普鲁士奸细论处。他们被当作普鲁士奸细，就是因为他们眼看法兰西被出卖给普鲁士人而感到悲痛欲绝！

看市政厅如何把它的两项罪责洗刷掉吧！它把堆满军火库的大批海军大炮丢弃在各军港；它在九月四日至二十日期间，不去购买雷明顿步枪和沙斯波式步枪，而它本来可以买进四十万支这样的枪支并把它们运进巴黎。

它根本没有制造野战炮，以补足在麦茨和色当的损失，致使我们现在大炮不足。造一些普鲁士人拥有的那种大炮，对它来说，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却一点也没有造。

可是，如果我们亡国，原因就在于缺少大炮和精良的枪支。武装的巴黎将能横扫普鲁士人，而赤手空拳的巴黎只能是身不由己的囚犯。

政府的全部措施都是导致亡国的有害措施。它至今没有更弦易辙，继续把法兰西推向深渊，而它的报纸却对着被这么多的卖国行为所惊愕的共和主义者狂叫：抓普鲁士奸细！

卖国贼们，你们放小心点！爱国者将由痛苦变为绝望，而他们将不再容忍你们的蛮横污蔑。

卖国贼们学着比埃特里的腔调，说什么“假如革命党人取胜，柏林将欣喜若狂。”

当年的波拿巴每天都翻来复去地宣传：“柏林对巴黎没有发生暴乱而感到懊丧！”

波拿巴的警察局曾编造过一封所谓普鲁士奸细写给俾斯麦的信，信里说：“勇敢些！勇敢些！共和主义者在巴黎起义了！”

共和国的成立使威廉恐慌万状，并改变了时局的面貌。革命的到来将是对敌军死刑的判决。

神　　权

1870年10月10日

神权依旧统治着法兰西，并且还将长期地统治下去。

神权建立了并且维护了君主制度。历次的革命都不是如同人们天真地所想像的那样推翻神权。相反，革命确定了神权，并使之永久化。

只要一个人不论以何种名义取得了一部分权力，他和他的永恒王朝也就得到了神权的加冕。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高高在上接受群众顶礼膜拜的特殊人物。

他从此成了合法的权威。与他的一切竞争都是暴乱，一切对抗都是犯罪。政权按法律规定归他所有。谁不低头称臣而试图和他平起平坐，谁就是卑劣的野心家。

政府可以更换，而特权人物和特权则依然不变。宗法制度已成为矗立在殿堂上或神龛中的偶像。谁敢碰它一碰和触犯它的神明，谁就是渎神。

这种拜物教对人民的危害极大。它是使人民的奴隶地位永久不变和使革命不断流产的根源。

在一八三〇年，由于人民的怨恨，波旁王朝的长系垮台了。缴纳了一千法郎竞选保证金的议员们虽然促使了王朝的垮台，但他们毕竟是王朝政府的一部分，他们理应同政府一起下台。新的局面，就得有新的人物。

结果并非如此！——国王被赶走了，他的议院却保留了下来，并且成了合法的政权。这个议院当然是反革命的，因为它已经过时，而且它转过头来打击那些摧毁了以议院为主要部件的国家机器的暴乱分子。

既然长系因积怨太深而被推翻，议院把次系扶上了王位①；于是，君主制的全部机器又照旧转动了十八年。同样的劣迹造成了同样的结果，革命②又一次暴发了。

人民是否从此不再喜爱宗法制了呢？人民是否要更换人事和改变策略呢？不，那岂不等于要推翻天上和人间的全部法规。为了更好地扫除君主制，人民选择了原君主政府的成员充当自己的主人；人民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选出了缴纳五百法郎竞选保证金的议员，而这些人昨天还是宣誓效忠于王室的保皇党人。

一八三〇年的历史又开始重演了。临时政府由于革命破除了它的特权而成了革命的天然敌人，它背叛并出卖了共和国，又把共和国淹没在人民的血泊之中③。

---

① 指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建立的七月王朝。——译者

② 指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译者

③ 指 1848 年 6 月 23 日至 26 日巴黎人民起义被镇压。——译者

波拿巴上了台，开始了他的亚洲式的专制统治。他要有自己的立法团。由谁参加这个立法团呢？就是那些以宣誓效忠为职业的人，无论对查理第十、对路易－菲力浦或是对拿破仑第三，他们都可以宣誓效忠。

真诚的共和主义者遭到排斥。历代的遗老们重新坐上了议席。他们重操旧业，继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这种状况维持了二十年。

罪孽深重的波拿巴终于垮了台。由谁来继承陷入泥坑的波拿巴政权呢？还是这一批曾经把共和国葬送掉的偶像们。立法团应该扔到塞纳河去。然而，像从前向查理第十和向路易－菲力浦宣誓效忠的那伙人一样，立法团也登上了崇高的宝座。立法团组织新政府的根据，就是它曾经宣誓效忠于皇帝，就是它曾经是帝国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份。

这些毫无信念和寡廉鲜耻的人们是当权者的走狗和奴才，他们从来不肯拔一毛或牺牲一分钟时间以利民主事业；他们在波拿巴统治期间领取一万二千法郎的年俸，他们今天却成了共和国的独裁者，而且是比一千五百年以来历代王朝的继承者更加残暴的独裁者。

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委托，只是根据自己的意愿，不顾人民的惊愕而自封为独裁者；任何人不能正面瞧他们一眼，否则就以公敌论处。

他们的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可以犯各种错误，或者说，犯各种罪行；他们可以和俾斯麦一起随意支配法兰西，可以全权谈判和平，可以背叛抗战事业，可以让巴黎得不到大炮和枪支，使抗战不能进行。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任何人都不许吭一声，否则就是叛逆。他们是不可侵犯的，是一贯正确的，是无可挑剔的。任何人都不得过

问他们的事。别人只有一项义务，即在他们的绝对权力面前俯首听命，拜倒在这些傲慢无知的蠢人的脚下。

如果巴黎的人民武装——国民自卫军表示不满，巴黎就是叛逆！

好啊！他们竟敢把叛逆一词加在惊恐不安和几乎绝望的巴黎头上。

啊！可怜的人民，你们不该到你们的死敌路易-菲力浦和波拿巴的铺子里去寻找自己的带路人！

任何革命，如果不彻底打碎已经垮台的专制制度，如果在它的首脑机关中还保留一名因参加压迫者的政府而闻名于世的显赫要人，那就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革命，就是为陷害革命者而设下的罗网。

有人会说这是不念旧日的功劳，是忘恩负义。说忘恩负义，意思就是要人们盲目服从。人民并不忘恩负义，他们既顺从又守旧，甚至有点自暴自弃。他们历来跪倒在偶像面前，即使偶像犯下罪孽，他们也崇敬不已。

然而，人民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任何恩惠。他们没有必要依附于任何人。他们只应该考虑自身的利益，而根本不必考虑是否触犯他们选出的代表的礼仪和自尊心。需要的时候，把他们留着，不合适的时候，就把他们抛开，这才是人民应有的唯一考虑。

今天效力的人，明天可能是障碍和危险。他如果被辞退，没有权利抱怨忘恩负义。得到国民信任的荣誉，哪怕只有一天，这样的公民就永远不再是一般的群众，直到他退职以后，也始终是一位政治家。

人民的委托书不应该成为一笔财产或一笔遗产。而在今天，情况偏偏就是这样。这为形成新生的贵族埋下了根子，这些新贵族的危害比老的贵族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带来不幸的国防政府就是一个明证，三十四天以来，它践踏了人民的委托，解除了巴黎的武装并愚弄了巴黎，它发号施令，出卖祖国，其威风胜过了高踞于臣民之上的莫卧儿皇帝①。

两次游行

1870 年 10 月 10 日

昨天，十月八日，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在市政厅广场举行了一次不带武器的和平游行。

游行队伍到达广场时，别动队如临大敌，已列队站在栅栏门口等着，国民自卫军第八十四营的队伍排列在别动队的前面，正对着游行群众。

群众高呼口号："公社万岁！"许多公民手里举着带有"公社！"字样的标语牌。

三位代表出示了证件，进入市政厅，要求临时政府予以接见。

儒尔·费里②先生宣布，政府不接见代表。代表们问他，广场上部署军队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是专为对付游行而采取的措施。

费里先生作了肯定的答复，并且明确地说，必要时将使用武力。

过后不久，来自有钱人居住区的好几个国民自卫军营队全副武装到达广场；他们推拥和平的群众，狂暴地威胁群众，并且摆出有钱人的身份破口大骂："强盗！抢劫犯！小偷！普鲁士奸细！"等等。在这片辱骂声中，还可以听到一些共和主义者的名字，他们因毕生贡献于共和事业而有了罪过。

---

① 莫卧儿是十六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 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了大莫卧儿帝国。——译者

② 儒尔·费里(1832—1893年)，法国律师，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市长。——译者

金融家、大商人以及其他最讲廉洁奉公的人们骂我们是“抢劫犯”和“小偷”，对此我们可以接受。至于“普鲁士奸细”的头衔，这些先生们还是留给自己为好。这个头衔合理合法地属于他们，因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将是善良的威廉国王把他们从共和国和共和党人那里解救出来的那一天。

全副武装的保皇党营队继续游行，并且在广场和附近街道聚集，气势汹汹地叫嚷要杀人。

政府打破了休战的局面并要诉诸内战；它向不要内战的人民挑战；人民只能痛心地被迫接受内战，因为人民明白，一旦内战发生，胜利者将是普鲁士人。政府方面则不然，他们让巴黎既无大炮又无枪支，他们为了不使威廉和俾斯麦生气，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的准备。

国防政府的最大希望①是感动普鲁士人，以便求得廉价的和平。如果国防政府再杀掉一批使显赫的容克地主头目感到讨厌的贱民，它同好心的普鲁士人就更容易达成一致的协议了。

反动派的论据

1870年10月11日

有那么一份报纸，从前还温和可掬，相当公正，今天却和反动派同流合污，竭尽说谎和污蔑之能事；它提出了一个定理，原话如下：

“代表巴黎大多数居民愿望的大多数报纸认为，在缔结和约前进行选举是不合时宜的。”

这就是说，在选举中肯定能够获得多数的一派，即有把握通过

① 原文为拉丁文。——译者

普选而取得政权的一派，坚决拒绝这个胜利；他们对于自己的胜利感到厌恶。

反动派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少有的大言不惭；这样的厚颜无耻，说明了他们的道德堕落到了何等地步。像《伪君子》第五场中的塔尔丢夫一样，他们狂妄地叫嚷："我们占绝对多数，但我们不愿依仗人多势众；我们完全可以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但我们宁可继续充当臣民。"

他们全都公开打出了说谎和奸诈的旗帜。可是，奸诈也还需要伪装，说谎也得要有假象。而他们却是在大白天硬说"天黑了"，谁敢说个不字，谁就是叛逆。别人没有讨论和说话的权利。任何分辩都被他们嗤之以鼻。

这些先生们取消普选，把民意问题简单化了。不用征询全国，就可以知道人民的愿望。只要统计报纸的数量就够了，这比计算选票更为简便。

"我们有八份报，你们只有两份；可见，我们占居民的四分之三。"

我们又回到了金钱统治的时代。一份报就是一笔资本。有钱人可以随意印报。穷人则维持不了办一份报纸的开支。

我们又再次受到竞选保证金的压迫。出版保证金虽然没有取消，但也不再要求缴纳。人们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想再把人们的嘴巴重新封住。暂时，税收制度还封不住小有产者的嘴巴。

其实，要不准工人以及他们的穷兄弟记者说话，不一定非靠税收制度不可。

富人的精神产品，尽管质量低劣，在国内市场上到处泛滥，而穷人却拿不出一分钱来把他们的思想印成书报。

金融家、地主和大商人可以负担四十份、一百份、以至二百份报纸的开支。对这些先生们来说，这太轻而易举了。

无产者勉强掏出几分钱，但很快就用光了。交易所的大亨们看他们费了半天劲才凑得这几分钱，报之以嘲笑。这些大亨们富胜王侯，可以任意挥霍，他们威胜君主，可以发号施令。

这些有着万贯家私的老爷们联合起来代表公众的舆论。他们大胆地说："我们代表所有人，我们印的报纸比你们多。"他们肆意谩骂、污蔑和说谎，互相比赛看谁干的坏事多。

先生们，即使把你们称之为公众舆论的《宪政报》、《辩论报》、《国家报》、《钟报》、《祖国报》、《时代报》都加在一起，那也只不过是一堆涂了油墨的废纸，只配送到杂货铺或厕所里去。

所谓的国防政府以这些先生们为依靠。它已代替了波拿巴，充当保守党的首领。而跟它走的就是旧时代的一帮遗老、可耻的主和派、保皇党和投降普鲁士的法奸。

特洛胥先生过去是八里桥的部下，现在是八里桥的继承人。他说的是八里桥的话，做的是八里桥的事，追求的是八里桥的目标。政府和报纸又恢复了八月时期的老样子。他们大骂发动了十二月二日政变的波拿巴，而在奸诈、专横和耍两面派方面却远远胜过了波拿巴。

其实，他们是同一支军队的将军。有其士兵，必有其长官。在新主子的卵翼下，旧时代的遗老们都挺起腰板来了。他们和共和党人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内部的普鲁士奸细和外部的普鲁士入侵者。

一次崇高的胜利

1870年10月12日

波拿巴主义正在胜利中。国防政府的先生们，拿破仑第三什么时候复辟？

普鲁士人什么时候进城？他们要进城，不必付出很大的代价：有几个人伤风感冒，有几个人闹关节炎，至多还有个别老头得肺炎。

此外，间或飞来一颗流弹，或落下一发炮弹，证明人们在打仗。善良的德国人在付出这样的代价的同时，将镇定地等着我们把牛肉和面包吃光。

然后，国防政府将大吹大擂地宣布，巴黎已经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现在该是考虑吃燉肉的时候了。

秩序党的营队将立即兴高采烈地宣告，吃燉肉的钟声敲响了，他们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现在应该填饱肚皮了。

事情的这个发展过程，从一开始就很容易看到。可是，谁在当时公开说出这个卑鄙的结局，谁就会被当作叛逆、普鲁士奸细、人民公敌！

反对这个卑鄙结局的人，竟成了人民公敌和卖国贼！不愿意为普鲁士人打开大门的人，竟成了普鲁士奸细！

今天，那些由于对抗战不力感到痛心因而要求成立公社的人，被加上了破坏抗战的罪名，在街头遭到人们的毒打。明天，人们将把坚决的抗战分子当作饥馑和无政府主义的制造者，在公共广场上撕成碎块。

威廉国王陛下将在那些善良的人们的卫护下，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他们手上拿的刺刀沾染着对普鲁士怀有恶意的叛逆分子的鲜血。

交易所的股票将上涨二十法郎，妓院和体面的住宅将张灯结彩。厨房和饭厅将热气腾腾。

过激分子的事情总是办不好的。同自己的肚皮过不去是不合

适的。

一八七〇年十月八日将记载在历史上。在这一天，资产者用刺刀写下了巴黎投降书的第一条。其余各条将随后自动写成。签字仪式将在钟声和军乐声中举行，而国防政府到那时也就结束了自己的光荣使命。

再谈反动派

1870年10月13日

我们看到，反动派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了。他们不浪费分秒时间，有力地向前冲击。像普鲁士人一样，他们不声不响地在暗地里预先建好了炮台，现在突然揭开伪装，一齐开起火来。

全副武装的营队在市政厅广场依次通过，高呼“打倒公社！”的口号。

这是一八四八年四月的情景的重演。

同时，这些成群结队的挑衅者分散在各条街道上，大肆辱骂和污蔑共和党人，让一些傻瓜笨蛋们听得津津有味。

显然，他们是在挑动内战。

共和党人将对此置之不理，那怕他们的耐心会使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

在敌对双方的中间，横着一道深渊，法兰西可能在斗争中掉进深渊。这对反动派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也许，他们正是要在深渊之中追逐他们的捕猎物。民主将因此而被葬入坟墓。

这场斗争就象两位母亲在所罗门① 面前发生的争执一样。假

① 所罗门（公元前970—931年），古以色列王国国王，大卫王之子，以智慧著称。——译者

的母亲愿意要孩子尸体的一半，真的母亲宁可自己死去。我们希望再次能得到所罗门的判决。

我们要维护政府

1870 年 10 月 14 日

我们要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政府。没有政府，巴黎将失去视觉。这样一个英明、积极和正直的政府，人们到哪里去找呢？

世界上有哪个聪明人，能够制定出下面这样一个绝妙的通令呢？

“鉴于巴黎已被包围，不能再运进食物，供食用的牲畜将一律由政府掌握，并按以下办法逐日分配：

每区每天分配二十三头大牲畜。”

由于各区居民的人数不等，少至五万五千人（十六区，帕西），多达十五万人（十一区，波潘库尔），因而十六区的居民所得的肉食将等于十一区的三倍。

不仅如此，一般牛的重量也不相等，可由四百斤至一千二百斤。

如果碰巧帕西所得的二十三头牛各重一千二百斤，而分给波潘库尔的牛重四百斤，那么十六区的居民每人将分得九斤肉，而十一区的居民只能得到一斤。

在平时，如果一个十五岁的学生做出这种算术题来，是要受到头上戴高帽子的处罚的。

可是，现在局势严重，要求采取非常措施。既然要拯救巴黎，拯救全法兰西，临时政府为了尊重平等原则，采取了激进手段，把每个区当作一个自然单位，使二十个区都得到平等的配给。

对于政府的果断和才干，人们只能表示钦佩，首都从此可以对

自己的前途放心了。

正是从政府采取这个值得纪念的行动的这一天起，人们热情地拥护政府并厌恶政府的敌人。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政府的天才。国民自卫军招收了三十万新兵，需要发放军服和军用品。怎么办呢？

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会这样想：巴黎是否有棉布、皮革等等必要的材料呢？如果没有，那就不必说了，也无须再去考虑了。

假如既有材料又有工人，那么随便叫哪个商人都能把事情办好。

应该找个内行的人来，对他说明需要做什么和有什么材料，由他负责在确定的时间内和合理的条件下，生产出军服和军用品。

接着，国家或国家的代理人立即下达定货，规定陆续交货的期限，定出样品，以备检查产品的规格和式样。这样把事情办起来。负责制造的工场便开始生产并陆续交货。

与此同时，国民自卫军各营实行整编。

一旦整编完毕，就有秩序地分发军服和军用品。必须严格禁止各营的军官干预这项发放工作。不得营私舞弊，不准讲交情开后门或者草率从事。一律按先后次序平等分发。

政府如果有一点起码常识，本来就应该这么搞。而我们的政府却另有其高深莫测的考虑。仅就其结果而言，这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秩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混乱，简直乱成一团糟。

一堆一堆的破烂货从四面八方送来，里面除了偶尔夹着几件象样的产品以外，全是些毫无用处、令人作呕的东西。

分配毫无秩序和规则。有的应分配的东西全分配到了，有的则一点也没有分到。士兵们叫苦连天，牢骚满腹，纷纷提出抗议。长官们赶紧去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了得到供给的物资，大家你争

我夺，互不相让。这样的竞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有的人仗着某个权势的支持，优先领得了物资。另有人由于不讨当权者喜欢，永远落在最后一个。

士兵们领到的军服，上衣是用粗布做成的，裤子薄得就像蛛网一样，军用品用不到二十四小时。偷工减料的商人们赚到了黄金。

若要搞垮一名指挥官，那就不要给他任何东西。特务们向自卫军战士们暗里煽动说，他们贫困的原因，就是指挥官不好。“他不管营里的事，他不会而且也不想搞到任何东西。”这可是一个致命的罪名。

我亲眼看到有人手里捧着刺刀刀鞘的碎片，这些刀鞘是由一层薄锌片外面糊上一张黑纸做成的，不经一碰就完全碎了。

这些老实人带着责备的神色让大家看刀鞘的碎片，似乎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他们倒霉的长官搞的鬼，并应由长官个人负责。他们想不到，真正有罪的是政府。应该把这些卑鄙的事彻底查清。可惜，那是永远办不到的。

干这些卑鄙事情的罪魁祸首是神圣的和无可指责的政府。攻击政府就是犯罪，就是渎神。警察局派人到处放风，说市政厅的那些蠢货们是清白无瑕的。一切责任都落在无辜者的头上，这些无辜者很快成了牺牲品。

奸商们盗窃国家财产，危害祖国的保卫者的生命，居然不受惩罚，这样的丑事令人十分愤慨！那些混账东西是有名有姓的，他们厚颜无耻地把硬纸板和破布当作皮革和呢料交给了国家；——但是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政府利用这些盗窃事件来攻击它的政敌。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合谋破坏反而成了它取得成功的手段。这样的腐化将导致什么结局，人们已经看得太清楚了。

再谈反动派

1870年10月15日

关于反动分子，我们已经谈过。我们刚看到，他们开始动手了。他们一直钻进了我们的内脏。我们必须到处防备他们。

在市郊的国民自卫军中，有人策划了一起反革命阴谋。这是一场在暗中策动的无声的战争，打击的目标是在共和国胜利成立初期由人民选出的各营营长，这场战争在静悄悄地酝酿着，等待爆发的时机。

群众为要求市政选举举行了游行，反动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他们从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向着民主猛扑过去。

谎言和污蔑大肆泛滥。阴谋分子满脸堆着笑容，向营长们友好地伸出手去，把他们拉到远离警卫的地方，然后毒打他们。

人民受了阴谋分子的蒙骗。由于过份的轻信，他们想不到敌人竟是如此狡诈，因而受了敌人的煽动。

对于保皇党头目们的无耻和受骗公民们的天真幼稚，我们感到震惊。

欺骗是长久不了的；卖国贼的意外成功将反过来使他们自己倒霉。他们的伪装将被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暂时胜利将变为惨败。

爱国者们，站岗去！敌人就在前面！

垂死挣扎

1870年10月16日

第一百四十六营营长萨皮阿同他的士兵们一起谈论公社和政

府，因意见不合，被士兵们抓了起来。

大家知道，在秩序符合他们口味的时候，秩序党人总是死死抓住秩序不肯放手，一旦秩序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就毫不客气地把秩序踩在脚下。

在他们看来，秩序就是他们的意志，就是他们的利益压倒一切。

当政府触犯他们的私利时，他们便一把揪住政府官员的领子，把他们押进监狱，说他们违背了天上和人间的法律。

这样的事件在一八四八年就曾经发生过。资产阶级的自卫军先生们在省政府逮捕省长或沿途追捕省长。共和国竟敢向他们派遣共和党的官吏，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愤慨。亚眠、特鲁瓦、佩里格、波尔多、鲁昂都发生过秩序党人反对现政府的暴乱。

六月事件以后，除了由于恐怖和仇恨而丧失理智的国民自卫军外，巴黎不再有其它的权力机关。

卡芬雅克[1]将军的独裁表面上似乎十分强大，其实不过是一棵被暴风雨压倒在地的无力的芦苇。他的命令顶不了自卫军的一个班长的命令。甚至当着卡芬雅克的面，资产者逮捕了他的秘书。卡芬雅克没有说一句话，听之任之。

现在，老谱又开始袭用。那些冒牌的共和党人正慢慢地揭开他们的假面具。他们同时高喊“共和国万岁！”和“打倒公社！”两个口号。这是他们在当前的妙计。

那些胆子最大的则走得更远，他们不怕露出保皇党的狐狸尾巴。

第一百四十六营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反对同外省闹对立，宣布凡不同外省唱一个调子的人都是共和国的敌人。

---

[1] 卡芬雅克（1802—1857年），1848年5月为法国陆军部长，残酷镇压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刽子手，曾为政府首脑。——译者

为什么他们这样地热衷于外省至上呢？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外界的消息。保皇党势力在巴黎以外的地区占了优势，并且正在策动推翻共和国。

他们的借口是现成的，说是要依靠外省的援助。要等待或假装在等待外省派一支援军来。因此，必须同外省说一样的话，使用一样的政治口号。人们不久将听到这样的叫嚷："我们不要让外省人生气，否则他们就会抛弃我们。为了拯救法兰西，让我们跟着他们去当保皇党吧"。

其它的借口还有很多。他们不久将借口驱逐普鲁士人，把我们交给威廉以及他所选定的法国王位继承人。威廉将选择哪一个呢，是拿破仑，巴黎伯爵①，还是亨利第五呢？——他将选择为王冠付出最高价格的人。

候选人们，提出你们的价格吧，投标开始了。

在法兰西的历届政府中，共和国总是最不受欢迎和最短命的，这真是咄咄怪事。成立得越轰轰烈烈，垮得也越快，真可谓："胜利的高山和失败的岩峰只有一步之差。"

更可悲的是，共和国的寿命同庆祝共和国胜利的热情成反比。在一七九二年，共和国在一片怨恨声中诞生，这个共和国却维持了七年，直到雾月政变。一八四八年共和国的遭遇略为好些，它的寿命没有超过四年。一八七〇年共和国是最受欢迎的，人们欢呼它的成立，把它看作自己的解放，可是它的寿命只能按月计算。

共和国刚诞生，卖国的蛀虫就已钻进心脏。蛀虫将使它在短期内夭折。特别令人伤心的是，在共和国灭亡的最后一刻，那些虚荣和自私的人们却要摆出一副英勇的姿态，在观众面前表演用马粪纸的匕首自杀。

① 巴黎伯爵是波旁家族次系（即奥尔良系）的王位僭望者。——译者

末日来临

1870年10月18日

《真理报》[1]念起"芝麻，开门！"的咒语[2]，四十大盗的洞窟的神秘的门便打开了。

我说四十大盗的洞窟，这是为了尊重《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不过，老实说，这里的大盗并没有四十个，而且我们更不能指望市政厅的山鲁佐德公主[3]能给我们讲一千夜的故事。

可惜呀！讲不满一千夜，而且差得远呢！

一千夜差不多等于三年，而我们在肉铺门口排队和领取配给食品的日子将不满三个月。

波塔利斯的报纸[4]喊道："芝麻，开门！"芝麻先把门打开，让念咒语的人进去。人进去以后，门又合上一半，门缝里露出洞窟里包藏的秘密。

洞窟里肯定没有四十大盗。至多不过有十二个大盗，而且他们并非那么天真地躲在四十个油篓里，听任机警的女仆[5]往里面灌注沸腾的油。

相反，却是他们在向我们泼冷水，他们用一瓢冷水，向我们当头泼来，以降低我们的达到沸点的热度。

---

① 《真理报》是1870年10月至1871年9月在巴黎出版的激进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报纸。——译者

②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强盗打开石窟大门时所念的咒语。——译者

③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的讲述者。——译者

④ 爱德华·波塔利斯(1845—1918年)，当时任《自由选民报》的总编辑。——译者

⑤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机警的女仆玛丽安娜，她用沸腾的油灌进油篓，杀死了躲在里面的强盗。——译者

啊，巴黎的傻瓜们，你们被围困在城内，已经感到厌倦了，你们希望听到城外的消息。那好吧，这里果真就有一大堆消息，你们注意听着！

你们知道巴赞吗？当然知道，是吗？巴赞被密不通风地困在麦茨，憋得喘不过气来，他不愿意像被遗弃的女孩子那样让炭酸气憋死。他像一阵风似地冲了出来，发疯地向前跑，结果又敲着军鼓缩回自杀的房间里去。他将憋死在那里，还是能重新呼吸新鲜空气呢？——这谁知道？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整个法兰西到处都在沸腾着。各党各派都或多或少地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正统派组织了布列塔尼军团，由卡特利诺和沙列脱指挥。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呢？暂时还是那面三色旗①，但是就要换成百合花旗②。

诺曼底传来了埃斯唐斯兰的秘密口号："让奥尔良出来救急吧！"

在东部，多次被打倒的里昂工人的旗帜始终在高高飘扬！工人们，向你们的旗帜致敬吧！你们的旗帜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正义和平等。这面旗帜激起了多少敌人的反对！你们要加强团结，保卫这面旗帜。国家的兴亡在此一举！

在图尔，克莱米约和格雷-比松这伙腐败无能的老家伙主持着一个缺胳膊断腿的政府。

在加里波的③的推动下，他们今天又活跃起来。伟大的跛腿加里波的是君主制忘恩负义的最崇高的牺牲者！加里波的让维克多-厄曼努尔当上了意大利国王，而维克多-厄曼努尔却把他囚禁

---

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共和主义的旗帜。——译者

② 波旁王朝的旗帜。——译者

③ 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曾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担任由国民自卫军、法国和外国志愿兵组成的佛日军团司令。——译者

在卡普烈拉小岛；现在这个小岛的岩石再也留不住他了。

加里波的刚刚脱身，就奔向法兰西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二百万大军的战斗将决定进步和停滞、人的尊严和人的屈辱、拉丁族和日耳曼族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

条顿人越过了莱茵河，又一次威胁着文明。凶残的部族从北方的森林里冲杀出来，要把地中海沿岸国家置于国王们和容克地主们的奴役之下；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南方的各民族大为震动。

意大利对条顿人的入侵记忆犹新，立即派来了它的最著名的代表。比利牛斯山另一侧的西班牙也动了起来。目睹这场狭隘的野蛮民族和人类的博爱思想的最后斗争，全世界都群情激愤。

这些在我们的肥沃土地上横行无忌的野蛮人自称是人类的精华，然而他们从来都只是人类的祸害，他们妄图把我们拉回到一千年前的波罗的海的浓雾之中。

啊！地中海的伟大的文明民族，你们是人类的理想，你们抚育了全部的伟大思想和宏大志愿，并使之发扬光大和取得胜利；——起来，去进行最后的战斗，起来，去消灭那些带来黑暗的畜牲，消灭那些必欲置人类于死地的吃人生番！

外省的消息

1870 年 10 月 20 日

《真理报》打破了政府对巴黎的新闻封锁，致使该报编辑被捕。在普鲁士封锁线的内侧，我们还有一道更加严密的政府封锁线。

必须取消禁令，向公众透露一点消息。尽管报纸具有极高的编排技巧，我们还是容易从字里行间看出，外省的情况是很糟糕的。

不仅图尔和里昂派不出军队来援救我们，而且围城的普军还

能派出相当的兵力入侵诺曼底，并把向巴黎方向移动的几支军队击退至都兰。

敌人似乎并不害怕集结在里昂的部队。他们放弃了向南部进军的计划，显然认为里昂的部队对他们并不危险，不值得他们大动干戈。

如果敌人真的担心外来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样安静地守着他们的防线；外部危险的逼近将迫使他们对巴黎发动断然的攻势。

他们不慌不忙的样子说明他们有充分的把握，可以坐等我们把食物吃光。他们打算依靠饥馑打开我们的城门。他们的这种打算是可靠的。

外省显然乱成一团。又是普鲁士人，又是党派纷争，简直混乱透顶。在这样的混乱下，怎么能产生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呢？

有良心的人并不缺少。他们在痛苦和愤怒的激励下，准备坦然献身。但是，由于没有真正的政府，没有领导，因而也没有信心，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不能有所作为。

国防政府对祖国的毁灭要负完全的责任。它派了几个可笑的老家伙去图尔，把旧制度原封不动地维持下来，使权力落在共和国敌人的手里。总之，它使外省处于瓦解状态。

人们容易看到，各地的保皇党正在抬头并开始恢复元气。他们现在还不到公开暴动的时候，名义上还尊重政府，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政府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这个政府不值得他们去反对，他们只是准备接受它的遗产。

甘必大公民挽救不了残局。这位加斯科尼人① 的夸口，同律师们的空谈一样，无非是充了气的气球，刺一针就会瘪掉的。

他身兼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独揽了军事和民政大权，但这也

---

① 甘必大为加斯科尼人。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加斯科尼人喜爱夸夸其谈。——译者

是枉然。他从巴黎带走了临时政府的致命弊病，他犹豫不决，害怕人民，谄媚于反动派。他干不了而且也不会干任何事情。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他缺少生命的气息。

加里波的暂时还能鼓起共和党人的劲头。但他体弱多病，老态龙钟，既不熟悉法兰西，又不了解它的风俗习惯。教会将同他拚命作对，反动派仇恨他，并将捆住他的手脚。他将徒具虚名，只能充当一名在祭台上供奉的英雄。

无论在外省或在巴黎，一切都从根基上开始出了毛病。革命派被排除在政府之外，被当作嫌疑分子和敌人看待。人们恨他们甚于恨普鲁士人。反动派对德国人并不在意；他们只有一个忧虑——民主。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噩梦。

他们放声狂叫："共和国万岁！"，在内心却同时说："让共和国死于瘟疫！"这可怜的共和国一旦在万岁声中死去，他们就将在它的尸体上诅咒痛骂，以补偿自己喊了违心的口号。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能比看到这样惊人的虚伪更加使人痛苦。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二十二年里要经受两次这样的痛苦，这实在太过分了，但是刽子手们并不因此而愿意在他们的日程表上改动一个字。

确实，人类的愚笨是永远没有底的。

巴黎陷于孤立

1870年10月21日

援军肯定不能来了。根据最近的消息，外省的救援没有一点希望，尽管这些消息经过种种的粉饰，总是把失败说成胜利。

巴黎从此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打破包围她的铁网。她本来是肯定能够打破铁网的。她现在是否还能够打破呢？全部问题就

在这里。

问题完全取决于政府。为了进行有害的谈判，政府浪费了最初的十五天时间；在这宝贵的十五天里，本来可以把大量的大炮和优良的枪支运进巴黎。

接着，由于优柔寡断，政府又浪费了十五天时间，下不了决心去进行真正的抗敌准备。后来，政府干脆带头搞起反动来了。它煽动了并且一天比一天更猖狂地煽动反动分子向共和党进攻。政府企图扼杀并消灭共和党，这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大家看到，像莫蒂公民这样一位区长，历来被认为是最温和的共和主义者，政府却不顾四万人的签名抗议，不顾全体国民自卫军的呼吁，总之，不顾全区居民的一致反对，竟然把莫蒂区长及其区政府的全体成员一律撤职；既然如此，这个骑在巴黎头上的独裁政府还有什么暴力行为干不出来呢？

这个独裁政府是支持教会的。莫蒂之所以被撤职，就是因为他根据十一区的愿望，决定在区政府管辖的区立中学里实行世俗教育。莫蒂以及该区的副区长和区政府的其他成员都受了处分，因为他们拒绝把这些学校的校舍交给无知兄弟会①。

由此可见，市政厅推行的政策是压制共和主义思想，镇压民主，为反动思想张目。共和党人是这项政策的障碍。现在障碍又一次被排除了。因此，首都将由耶稣会教士的大军来保卫。普鲁士人，你们可得小心点，你们的对手将是圣母玛丽亚。

有了天神的帮助，首都可以不用别人来救援。外省不派援军来巴黎，但圣母将派来既不用大炮又不用沙斯波式步枪的天兵天将。特洛胥将军所能给天神们的物质支持也完全是多余的。巴黎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取得天神支持的无知兄弟会列成的方阵。

① 无知兄弟会是1680年产生于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绰号，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中，学生主要受宗教教育，得不到什么别的知识。——译者

巴黎人，你们要信任这些战无不胜的保护者；至于俾斯麦、威廉以及地球上所有的德国人，你们则不必介意。圣母玛丽亚的将军，赫赫有名的特洛胥将在某个晚上领着无知兄弟会出击普鲁士人；与此同时，死神将手执利剑，杀尽在你们城下安营扎寨的辛那赫里布[①]的军队。

除此以外，你们只需对胜利的圣母感恩戴德，取消世俗教育，把你们的子女重新交给耶稣会教士，由这些尊敬的教士把他们培养成虔诚的教徒。

假如碰巧天神没有功夫，来不了巴黎，特洛胥将军先生只得单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国民自卫军的四万名突击营战士。

我热烈地希望，在别动队和正规军的支援下，这些突击营部队不要付出了牺牲二、三千人的代价，却只限于打侦察战。我希望它们以足够的兵力发动一次进攻，击溃普鲁士人并使首都解围。总之，我希望巴黎的军队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不过，对这样的希望，我毫无信心。我认为，把希望寄托在突击营身上，纯粹是幻想，人们也许将为此而付出重大代价。

啊！假如政府调动了一支五十万人的装备优良的大军，配以强大的炮队，那么，我们本来是可以相信，甚至可以期望出击成功的。不幸的是，市政厅忙于为和平而奔走，根本想不到抗战。无论枪支或是大炮，都没有运来。政府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预见。直到儒尔·法夫尔在俾斯麦客厅里受到了侮辱，政府才如梦初醒，摆脱了麻木状态。

可是已经太晚了。自从被封锁以来，武器问题变得很困难，而政府的积极性却没有丝毫增加。它对共和党人深恶痛绝，对反革命派却温情脉脉。

---

① 亚述国的国王，曾于公元前689年围攻巴比伦城。——译者

政府的心里只有这两种情感。在它的眼里，其余一切似乎都无足轻重。由于镇压民主，政府破坏了坚决抗战的唯一支柱。它使巴黎失去了活力、灵魂和生命。

一旦我们的主子们功成业就，我们将看到他们在包围我们的普鲁士军队面前会采取什么态度。早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波拿巴的独裁就轻而易举地扼杀了国内的反对派。大家知道，他今天在普鲁士人手中究竟有多少骨气。亲教会的独裁政府也将战胜忠诚的共和党人。大家在不久将看到这个政府在敌人面前的表现。

但愿它不要满足于充当为普鲁士国王开门的门房角色！

再谈防务问题

1870年10月22日

《祖国在危急中报》在评论巴黎防务的最初几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巴黎防务的关键不在城墙，也不在堡垒，而在连接各堡垒之间的土质工事，特别是堡垒前沿的土质工事。

政府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当然没有加以重视，因为不穿军装的人不可能对军事艺术的奥秘有深入的了解。

政府把锹镐这些真正的防守武器都闲置在仓库里不用，一味高唱我们的石砌工事固若金汤的滥调。

然而，抗战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报刊提高了嗓门，大声疾呼地要求修建土质工事，政府只好向舆论屈服。

何况，修建土质工事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敌人在各处挖工事，并且占了上风。因而我们也不得不拿起劳动工具去同他们斗争。

可是，我们挖得太慢，工事也建得太少！我们有几十万劳力，而参加修工事的只有几千人。

九月四日以来，市政厅政府从来没有能够掩盖住它对保卫巴

黎的勉强态度。它始终只是在群众呼声的催逼之下才采取行动。报纸不得不对政府施加压力。

那么，工事的进展如何呢？谁也不知道。诚然，人们挖了土，修了壕。可是，这些工事修得怎样呢？能不能同敌人的工事相抗衡呢？如果敌人开始向堡垒进攻，堡垒能否得到两侧多面堡的支持，而不致被敌人的密集炮火摧毁呢？堡垒如果只以本身的炮火为依靠，那末，它的大炮和垒墙均将被轰塌。

不仅如此，有常识的人都懂得，再不能指望援军了。尽管惯于夸口的反革命报纸吹得天花乱坠，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但是诚实的报纸已使人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巴黎从此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等待外来的援兵。

然而，巴黎有多少力量呢？

就大炮而言，人们老是在说要制造大炮，而可用的大炮实际上却是很少，虽然不是完全没有。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库存至今还是少得可怜。库存会很快增加吗？谁要是对此抱有希望，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因为人们在不断地拖延，从而使现状永远维持下去。

人们为国民自卫军配备了十个炮队；而十个炮队，只有六十门炮！这是天大的笑话！至少也应该有二百个炮队，一千二百门炮，其中大口径炮和野战炮各占一半。

当然，为四万人配备一千二百门炮，这是外行出的主意，换句话说，是蠢人的主意。

因为，特洛胥将军只要求国民自卫军至多用四万名士兵，去同普鲁士人摆开阵势作战。要他们以一百五十人去对付一千五百人，以一当十。我们认为国民自卫军有四十万人，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大了。

可是，赫赫有名的将军，四万名士兵只够勉强用来补充你的作战部队在每天的侦察战中所受的损失；你的这些侦察战东撞西碰，

毫无目的，只能让傻瓜们精神紧张，使他们相信巴黎保卫战还在进行。

你可以把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食物吃光，兽肉吃光，人肉也吃光为止。

特洛胥将军先生有他自己的计划，他发誓要保守计划的秘密并宣布对计划完全负责。

他负责或不负责，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假如他的计划恰好使法兰西跌进深渊，他的负责能使法兰西获救或得到起码的安慰吗？

我们这位独裁者的作风有点古怪！波拿巴即使在他气焰最嚣张的时候，也从没有过这种古怪的作风。当他考虑要把我们推向这场罪恶的战争的时候，他至少表面上还要求立法团附和他的主张。他征得了立法团的支持，而且可以肯定当时的局面同今天大不一样。当时我们的半个身子还没有掉进悬崖。不但如此，人们还普遍对战争的胜利抱有幻想。

而现在，我们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巴黎被二十五万德国人团团包围，同外界隔绝，不久即将陷于饥馑，而有人却对我们说："我有个计划，这个计划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准备把这个计划贯彻到底。大家都要服从我，都别说话！一切由我负责！"

"一切由我负责"——这是波拿巴的老话。波拿巴在色当投降了。他负了什么责？正当法兰西处于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在普鲁士的宫殿里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

特洛胥先生的计划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秘密。尽管他点滴不露，人们却不难从他发布的命令中猜出来。

他挑选了这四万人，究竟是什么目的？是为了继续推行目前的战略，进行损失惨重而又徒劳无益的出击。仅此而已。至于向普鲁士的防线发动进攻，打败普鲁士军队并迫使他们放弃包

围，——这是永远不可能的！特洛胥宁可把他的部队带上月球也决不会这样干。

大家清楚地看到，这项美妙的计划的后果将是什么。那就是：巴黎迫于饥馑而投降，巴黎的全部工事被扫平，威廉占领全国，亚尔萨斯和洛林被割让，亨利第五上台当国王，中世纪得以复辟。

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把特洛胥先生绞死二十次，那对我们不幸的国家又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特洛胥先生不会被绞死，他将当上法兰西的统帅。这就是他的责任所在。

1870年10月23日

对于所谓的抗战事业，人们开始看清楚了。人们看到那些假装准备抗战而实际上不愿抗战的人的真面目，发出了惊恐的叫声。

有一份算不上革命的报纸写道："……当政府在全体报界的多次强烈要求下，决定要办某件事时，往往又很快来一道相反的命令，使得要办的事情就搁置起来了。例如，关于订购后膛装弹大炮的事就反复了多次，确定了又延期，因而一直拖延不决。又如，关于制造一批二十四厘米口径大炮一事，原则上已经批准，并且已开始动工，最近又突然停了下来……"

直截了当地说，政府从来没有干过任何事情，因为政府不愿意干，而政府所以不愿意干，是由于它是共和国的死敌。共和国落到他们的手掌之中，就一定要灭亡。

末日快要来临了，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读一读反动派的报纸就能够明白。反动派如此大胆地敲起丧钟，这足以说明他们有强有力的后台。在法兰西的生命中，现在的一分钟等于一年。

巴黎象一个没有水源的蓄水池。水龙头大开着。威廉和反革命安静地在一旁等着，手里拿着武器，随时准备砍断企图关上水龙

头的手。

如果卖国贼没有在城里安下他们的大本营，敌人在城外的包围圈决不能维持那么久。为了扫荡敌人，我们究竟需要什么？那就是人、坚强的决心和武器。

人，已经被欺骗和被麻醉；坚强的决心，已经被压制；武器，则还没有运来，并且也运不来了，而这些武器本来是唾手可得的。

在九月四日至二十日期间，本来可以使巴黎装满枪支和大炮。结果却没有运进一枪一炮。从巴黎被围的那天开始，要制造几千门火力和射程同普鲁士的大炮相当的大炮，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是人们不这么干。定了货又取消，翻来复去，结果等于零。我们现在几乎没有炮队。

枪支的情况也是如此。正规军、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营有沙斯波式步枪，其总数不超过十五万支。滑膛枪有没有五万支，还不一定。此外就是杀伤力不强的燧发枪。

目前，我们每天改装八百支枪。而我们生存的时间，估计只有几个星期了。枪支还没改装好，我们就该当上亡国奴了。

昨天有人想了一个办法，想用一种在后膛装药而性能超过滑膛枪的武器代替前膛枪。由于各个零件均由车床加工，因此能在二十四小时内改装两万支枪。这个前景固然美妙，但也将同其它事情一样不了了之。因为那些早有既定计划的人不喜欢这样做。

总而言之，情况如何呢？兵力方面，国民自卫军至多有四十万人(其中包括没有任何武器的)，别动队有八万人，正规军有四万人；总计五十万人，其中十六万人武装比较齐全，其余的战斗力不强。因此，这支步兵是不能同围城的敌军摆开阵势作战的。

在炮火方面，我们处于更大的劣势。整个国民自卫军只有六十门野战炮。

这是最大的讽刺！我们至少应该有一千二百门炮，平均每千人有三门炮。普鲁士人每千人有五至七门炮。

即使在巴黎被围困以后，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数目。从现在起三个星期以内，拼命努力一下，也许还能达到这个数目。

国民自卫军必须有三万名炮兵。现在着手组织和训练还有时间。瞄准手也许能找到现成的。弹药手临时学还容易。至于大炮的操作，干得差一点，问题也不大，因为战斗将是短促的，并且战场是在狭窄、多树的丘陵地区，而不在一望无际的平原。

在三星期之内，人们或许能制造出必要的枪支。每天造一万支，就是二十万支，加上现有的十六万支，我们将有三十六万至四十万支枪。

那时候，有了一千二百门炮，巴黎就可以出击并打退德军。

但是，这一切都是做不到的。我们的命运已经确定了。特洛胥将军的通令已经预先规定好了我们葬仪的程序。

特洛胥将军将从国民自卫军中挑出四万人左右，他们将进行定期的出击，以便使我们慢慢地拖到食物吃完、战士死光和抗战完结的那一天。

普鲁士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可能性不大。既然没有必要炮轰，何必落下炮轰巴黎的恶名呢？可是如果出现使他们害怕的援军或者共和党人在巴黎掌权，那么，炮弹很快就会像倾盆大雨似地落下来了。

可是，巴黎和外省都是反动分子在掌权。普鲁士人可以耐心地等待戏剧收场。这已经是毫无问题的事了，而且也是符合两个同盟者的希望的。

已经联合起来的保皇党的三派并非不想摆脱威廉，也并非不想不要外国的援助而自己把事情办成。亨利第五、巴黎伯爵和波

拿巴当然更愿意保住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不愿意把它们作为礼物赠送给俾斯麦。但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是俾斯麦用武力把法兰西从共和国手里夺来送给他们的，至少他也应该作为小费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

当然，保皇党的三派也可以回答俾斯麦："如果没有我们，没有我们的共谋，今天留在法兰西土地上的将是你们的尸骨。你们不要这样骄傲。"

但是，俾斯麦只要一反驳，他们就无话可说了："没有普鲁士军队，共和国将把你们三派全部彻底地埋葬。你们要相信我，让我们一起来友好地分配，让我们把巴黎的城墙扫平，使巴黎不能东山再起。你们只是靠着普鲁士才恢复了王位和祭台。我的主人威廉在复活神权，收下分给你们的一份吧。这在过去对你们几乎是非份之想，你们要向德意志皇帝恭敬地施礼，他为你们复辟了中世纪。"

在这以后，回到罗马城的教皇将为罗马和罗马帝国祝福，而欧洲则将恢复黑暗的和平。

1870年10月25日

又一次有害无益的出击，这样的出击正在零敲碎打地把军队断送，使士兵灰心失望。

士气良好，——**目的达到**，**大有进展**，——**有力而镇静**，等等——所有这些乏味的老调再也不能使人受骗了。尽管反动报刊大吹大擂，把失败说成胜利，公众再也不会相信了，因为他们上当的次数太多了。

以自欺欺人的形式出现的沙文主义更加令人作呕，这种溃疡是一个民族衰老的症候，而且是民族衰败的最可悲的症候。我们从亚洲的帝王们那里学到了这种可耻的作风。在反对英国人的战争中，缅甸军队的每一次挫折，在缅甸将军们的笔下，都被写成是

野蛮人奉献于国王陛下脚下的一份降书。

难道人们以为我们的士兵都受骗了吗？士兵们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些打不完的侦察战——开始先轰一阵大炮，接着以散兵队形向前冲锋，然后是几个前哨部队后撤，最后是普鲁士人蜂拥而来，弹如雨下，而我们则仓皇撤退，死伤被俘以及其它等等——，始终是这样一个毫无变化的过程。

据说昨天我们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胜利，缴获了敌人的四门大炮。为了这件事，报纸连续三天大登特登种种写得维妙维肖、煞有介事的客观报导。经过查证，结果是敌人缴获了我们的两门大炮。

人们曾经把我们的不幸归罪于帝制时代的无聊文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一度有所收敛以后，无聊文人们又胆大妄为起来，重操起引人堕落的旧业。他们把祖国遭受的灾难编成小说。被围困的巴黎的惨痛场景，大批儿童不幸夭折，全都成了他们胡说八道的题材。

他们争先恐后地以战争恐怖为主题，编写一些光怪陆离的小故事。小说家们的胡思乱想压倒了简单而严谨的真理。一八七〇年的历史将是在下流报刊上开放的一朵小说之花。

但是，现实并不因此丧失自己的权利。如果下流文人们在写一些无聊的故事愚弄人，那么，真正的演员却只受剧情发展的影响。由于指挥的腐败无能而不断减员的部队的士兵们，他们不相信报刊的废话，他们只是从战场上得出自己的印象和判断。

战场上每天都在重演着同一出悲剧，士兵们熟知每一幕的情节。到头来，总是他们在付出代价，因而他们感到厌倦。人们不能蒙住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八里长的距离内，进行六小时炮火连天的战斗。

现在是结束这些无损于敌人的侦察战的时候了。如果要了解敌人的现状和计划，就干脆在敌人的肚子上戳一刀，看看里面包藏

着什么神秘的祸心。

这样做既节省兵力，又节省弹药，而且想干或许就真能干成功。

指望政府实行共和政策是再也不可能了。政府屈从于极端的反动分子，因而距离同敌人勾结只有一步之差。普鲁士人坚信，秩序党将为他们打开巴黎的大门。这种自信心是有历史根据的，类似的叛逆行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十四世纪的艾蒂安·马塞尔时代，温和派把巴黎交到反革命的封建王朝手中。几年以后，到了一三八〇年，在罗斯贝克战役① 以后，又发生了同样的背叛。

在同德意志长期作战中屡战屡胜的胡斯党人被贵族出卖给外国敌人。在安娜王太后摄政期间，市民党把投石党和人民出卖给马扎里尼②。

在一八一四年，资产阶级急忙和胜利的联军谈判。在一八一五年，它又镇压了人民的抵抗，为普英联军打开巴黎的大门。

这种大叛卖为什么在今天就不能重演呢？当然，这样做，对现政府的大多数成员来说，那简直是自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成员都是如此。共和国应当在目前统治着巴黎的教会政府的面前战栗。

我们不要忘记，十万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在卡特利诺和沙列脱的率领下，集中在南特。我想这支军队对巴黎和共和主义思想决不会怀有好意。

十分明显的是，集中在南特、图尔或里昂的大军都不象要来援救首都。这是因为力量不足、无政府主义呢，还是根本不愿意呢？

---

① 罗斯贝克系今比利时的小城镇。——译者

② 马扎里尼(1602—1661 年)，红衣主教，1643 年起任首席大臣，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实际上是法国的统治者；执行巩固法国专制制度的政策。——译者

大概是这三种原因兼而有之吧。

甘必大先生发来的电报如此之少而又如此之奇特，使人可想而知，外省的局面十分混乱。正象在巴黎一样，革命在外省也受到镇压和取缔；革命的失败势必使普鲁士人取得胜利，使法兰西垮台。贵族阶级认为，为了恢复他们的统治，付出这点代价不算太高。

无论过去和现在，共和党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呢？他们要大炮，枪支，认真地改组国民自卫军；实现了这三件事情，他们就足以扫清敌人。他们至今一无所得，而不用太久，就将为时太晚了。

局势的危险

1870年10月24日

局势的危险在于政府同共和国在闹离婚。人们援引九月四日的婚约，那也是枉然，谁也不上这个当了。性格不合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

特洛胥将军同波拿巴一样厌恶并害怕共和党人。他把共和党人当作敌人看待。市政厅的十二位政府成员以及立法团，在他们的新主子面前，并不比他们的前任享有更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他们也许心里不很满意，但对他们新主子的命令却很驯服。他们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配角。

他们根据教会的强制性命令处分了莫蒂公民；对此，他们有些人感到不舒服，至少罗什弗尔先生是如此。采取这种毫无道理的暴力行动，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故意挑衅吗？完全不是。假期结束后，学校要开课。自由主义思想的各个派别提出政教分离的纲领已有二十年了，民主派不能放弃这个纲领。难道还有什么问题能比政教分离得到更完

满更普遍的解决吗？政教分离早已成为一项政治教条了。

巴黎人民要求实行世俗教育。十一区的区政府把被教士们侵占的校舍还给了教师们。这是它的权利，又是它的义务。无知兄弟会如果愿意开办学校，可以自己去办，这是他们的自由。但区立中学的校舍属于区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事情使许多人睁开了眼睛。他们看到，巴黎是在耶稣会教士的统治之下。耶稣会教士们硬是要公开地在信仰方面侵犯巴黎；他们依靠军队的帮助，要在巴黎强制推行为巴黎所深恶痛绝的精神统治。目前，在十一区的区政府里，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修女和教士，他们肆意对抗民意，也许准备挑起六月事件。

但是，他们决不能够得逞！

民主派了解敌人的险恶计划。他们知道敌人急于要利用普鲁士人在巴黎这个机会。消灭巴黎和现代思想，把现代思想淹没在巴黎的血泊之中，这就是敌人的迫切愿望和最强烈的希望。这种异端的愿望决不会如愿以偿。

但是，危险很大。特洛胥先生完全是波拿巴的替身。他们对巴黎人民的态度是相同的，他们是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一家人。

共和党人感觉到，他们被人仇视、监视和威胁。他们应该小心翼翼，随时防备。然而，共和党人是抗战的唯一支柱，是侵略者的唯一真正对手。除了他们，别人都是软弱、自私和懦怯的。

政府和首都之间的这种对抗会不会成为抗战的致命弱点呢？在九月四日以前，这种对抗曾经致命地损害了抗战，而今天的情况，越来越接近于九月四日以前的局势。人民的积极性遭到挫折，热情被扑灭。

军事专制以为用恫吓手段可以压倒和控制一切；他以为可以使巴黎像军队一样对他服服帖帖。但是，即使在实行军事体制的情况下，巴黎仍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这不是军纪所能压服的，因

为思想和意志不同于军纪，而且高于军纪。

巴黎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进步事业。如果把进步事业从巴黎的怀抱中夺走，而代之以黑暗，这对巴黎就象击中了她的心脏一样痛苦。巴黎只想着打退入侵的敌人。现在，政府却打击为巴黎所最珍贵的科学和光明。政府说，巴黎应该等待坎佩尔①给它带来文明。这就是说，要巴黎作出巨大的牺牲去求得不可靠的援军。

名不符实的国防政府最好多铸几门大炮，多造一些枪支，而不要去侵犯区政府的权利，直接插手学校的问题。在信仰问题上，是不能实行独裁的；国防政府没有权力践踏十五万人在道德和教育问题上所表达的意志。

这些专制行为，使抗战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察觉政府的秘密意图以后，人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也许来自国内的危险要比来自国外的危险更严重，也许现代思想的成果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所受的威胁要比民族独立所受的威胁更大。

独裁者不愿接受监督，即使一个普通的区政府的监督也不接受，其原因难道就在于此吗？

威廉当记者

1870年10月26日

为了消遣，俾斯麦出版了一份法文报纸。虽然俾斯麦的主人现在还不是法兰西的国王，普鲁士内阁却可以像路易十四的内阁一样，称作凡尔赛内阁。

何况，只要住在法国的大城市里，人们就得有自己的政治色彩，并选择自己的旗帜。威廉国王表示，他支持特洛胥将军及其十

① 坎佩尔系布列塔尼的一个城市，当时是保皇党的大本营。——译者

二人政府，反对贝尔维尔的贱民。

这位国王和他的宰相对贝尔维尔恨得要死，把它称作恐怖党的大本营。他们同《费加罗报》、《高卢人报》以及市政厅的支持者完全是一鼻孔出气的。例如，下面这段话简直就象巴黎的半官方报纸所说的一样：

“恐怖党越大胆，政府就越软弱。如果政府不马上采取有力措施，不用很久，政府就会控制不了这些凶残的狂徒，而且会被他们吞没！……”

“如果特洛胥将军不迅速采取严厉的行动，恐怖党将迅速在巴黎站稳脚跟。”

俾斯麦在向我们的独裁者建议消灭共和党人，这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早在波拿巴垮台以前，俾斯麦就曾经建议这样做。柏林的报刊当时对巴黎的贱民无休止地咒骂，对帝国则关怀备至，不断为它出谋划策。

虽然威廉同波拿巴在打仗，但他心里明白，可怕的敌人不是波拿巴。这已为事实所证明。俾斯麦事先知道，在同波拿巴的搏斗中，他可以稳操胜券。但是，他发现在这个不中用的对手背后，站着一个较难对付的斗士。因此，他放声大叫：“不要作弊，不要在搏斗过程中掉换我的对手！”

对手的确是换过了，但代替了波拿巴的市政厅的独裁者继续博得普鲁士的青睐。对这些伟大的胜利者来说，巴黎的贱民更加是他们的美杜莎① 的脑袋，他们宁肯牺牲掉一半军队，也要压倒恐怖党。

搅乱威廉国王的美梦，在他的胜利桂冠上投上阴影，恐怖党真是卑鄙无耻！

---

①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头女妖之一，谁见了她一面，就变为石头。转意为可怕的怪物 。——译者

这位可爱的俾斯麦曾指望巴黎发生内战。他甚至以为可以在四郊的高地上坐山观虎斗，看着城里面进行巷战。他的报纸还说：

"……这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戏快要结束了，再过几天，德国军队将应上等阶级的召唤，几乎不经战斗而进入法兰西的首都！！！"

原来如此！上等阶级，体面人阶级，贱民大众的敌人，他们在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开门揖盗，他们今天将继承过去的传统，随时准备召唤德国军队来恢复秩序和复辟君主制，根除共和制、自由和思想！

我们愿意相信，这是对上等阶级的污蔑，尽管他们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但愿他们这次不会像神权的旗手所希望的那样去召唤德国兵。

究竟在暗处搞了什么名堂，我们谁都不得而知。应该允许民主派抱有怀疑，根据历史经验，民主派甚至应该抱有怀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出现有召唤德国兵的任何预兆，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在让法兰西向普鲁士人屈膝投降以前，也还要三思而行。

在黑暗中摸索

1870年10月28日

夏托登的失守，向我们揭开了卢瓦尔军团的谜。被五千名普鲁士人围攻的夏托登城，离卢瓦尔河不过十至二十里远，卢瓦尔军团尚且解救不了，它怎么能来解救被三十万人围困的巴黎呢？

明白人从来没有被从卢瓦尔河两岸发来的说谎电报所欺骗。这条正直的河大概和加隆河交换了位置①。

① 加隆河流经法国加斯科尼地区，那里的人一般被认为喜欢吹牛，好说大话。——译者

我们的政府是长着两个脑袋的皮蒂娅[1]，一个脑袋在巴黎，另一个在图尔，同时在宣示着神谕。它们争着对乐于受骗的傻瓜们灌输各种最荒唐的神话。九月四日的革命创立了以欺骗为生的独裁政府。

人民出于忍让而承认了独裁制度，但忍让却是个坏预兆。在这生死关头，人民竟如此坦然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昏庸暴戾的政府，盲目地接受这个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编造荒唐故事的政府，这样的人民是生存不下去的，它事先已经确定了自杀的日期。

那时候，邮检所的所长刚被撤职。报界逢场作戏地乘机把波拿巴痛骂了一通。今天，波拿巴是特洛胥苏丹的御用文人们的嘲弄对象。他们对这条落水狗挥拳痛打，博得了吓人的声望；然后，他们教训天真的共和党人："混蛋，你们不拥护特洛胥吗？那你们准是拥护波拿巴。"

挨训的可怜虫或许会反驳说："老滑头呀，波拿巴在台上的时候，你吻他的脚；现在他被打倒在地了，你踩他的肚皮。你又去吻特洛胥苏丹的脚，以便有权折断我的腰。"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在波拿巴总统向制宪会议宣誓效忠于共和国的第二天，我们这些为共和国奋斗了十八年之久的老战士正关在万森监狱，守卫监狱的宪兵队长满面春风地对我说："我们不再是卡芬雅克的宪兵，我们是波拿巴的宪兵了。"

这位老实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带一点俏皮的意思，他觉得这是最自然最合理的事情，并且为他能说这句风趣的话而感到骄傲。我不愿把这位无害的潘多拉[2]和记者们混为一谈；记者们都是老滑头，他们总是向当权者烧香叩头，昧着良心干事。而潘多拉毕竟

---

① 在希腊神话里，皮蒂娅是代替阿波罗宣示神谕的预言者。——译者

② 在希腊神话里，据说潘多拉由于好奇，把装着各种灾难、祸害的盒子打开了，使这些灾难、祸害散布到了人间。——译者

明确地说过，革命已经破产了。

年轻的一代正看着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帝国时代，通信秘密被横遭破坏。现在，特洛胥将军禁止通信。这有多么可恶！可这又多么好啊！特洛胥将军不必为邮检所操心了。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自己的力量信不过，因而不愿受人诱惑。

既然是基督徒，他就使用基督的办法："取消"。这种简单的办法真妙极了，它能永远阻止别人的抱怨。没有通信，也就没有抱怨。

因此，特洛胥将军决定："任何气球不经允许不得离开巴黎。不得总督的批准，任何人不许登上获准离开巴黎的气球。"

命令简短而又全面。禁闭室关得密不通风。为了隔断巴黎和外省之间的消息来往，普鲁士人的防线还不够。特洛胥把空间的大门也关住。巴黎被三重锁关了起来。

当然，这是为了预防奸细。每个人都知道，巴黎的城门只是为那些出城散步找点蔬菜的人开的，不可能通过城门同敌人通消息。必须坐上气球，在空中飞上三十至四十里路，才能见到一个德国人的影子。这可不行，事关抗战，不准！

市政厅愿意为法兰西和她的首都之间充当传递消息的唯一渠道。它把巴黎的行动和意图告诉外省，又把外省的事情告诉巴黎。这个巧妙的办法使它免得自相矛盾。

于是，市政厅既可以让保皇党在法国随意搞阴谋，又可以使巴黎相信，为了拯救共和国，全国正在一致奋起。

然而，我们应该感到自慰，这种痛苦的隔绝状态快要结束了。市政厅答应我们，禁令即将取消。火车站接到了准备好车厢的命令。售票处即将重新开门，巴黎人又可以到郊野踏青去了。全靠普鲁士人和独裁者的批准，这美好的一天将要来到了。

在这黎明的前夕，我们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对城里城外的事情

一无所知。种种推测到处流传，有的说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有的说法国人占领了柏林，真是应有尽有。政府为我们指出的这两种前景，都是可信的。

政府的演说、刊物、通令，以及政府成员本身，都是一路货色。他们玩弄的花样层出不穷，归根结底都是骗人，而受骗者居然镇定自若，不动声色。再没有比被围困更能陶冶人的性格了。只要封锁再持续下去，巴黎人将成为模范的人民，即使最挑剔的君主也将羡慕特洛胥苏丹了。

我们的耻辱

1870年10月29日

梯也尔先生刚从欧洲行乞回来。这是五十天以来，他第二次出门行乞了。和第一次一样，他是两手空空回来的。他到处受到相同的接待，得到相同的答复："上帝保佑你们！"

梯也尔先生虽然年事已高，写有巨著，但他却忘记了一国人民要求得施舍，只能像《吉尔·布拉斯》[1]中的乞丐那样，手里拿着火铳。可是，政府在伸手乞讨时，却特意表示，他手里没拿火铳。于是，人们都轻蔑地转过头去。

的确，国防政府非常害怕欧洲把它的名称认真看待。它想方设法要使人们解除对它的怀疑，它说："我们才不会闹别扭呢！我们怎么会荒谬地准备抵抗，从而使普鲁士人生气！我的天呀，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人看了？简直把我们当作革命党了！"

于是，梯也尔先生在欧洲的大路上风尘仆仆，到处恳求和平。

① 法国十八世纪著名小说家勒萨日的作品。——译者

政府伸出一双白手给大使们看，要使他们相信，这双白手没有在巴黎碰过枪炮，也没有为了制造枪炮的罪恶目的而动过钢铁。

为了让威廉称心如意，市政厅没有运进巴黎一枪一炮。它听任阵地炮堆积在海军的军火库里。它拒绝接受英国提供的沙斯波式步枪。它在堡垒的垒墙、前沿和周围没有挖过一锹土。直到儒尔·法夫尔在俾斯麦的客厅里受到侮辱以前，抵抗的准备连影子也没有。

在色当一战中，我们的军官丧失殆尽。有五、六千名波兰军官挺身而出，要为我们训练新兵，这是多么宝贵的意外财富！政府为了求得威廉的欢心，拒绝了他们的帮助。

可是，政府的调门越低，俾斯麦的调门就越高。市政厅在压制抗战事业，而普鲁士人却狂妄地指责市政厅，说它的演说和措施在鼓动抗战。他们以法兰西的主人自居，命令召集乡绅议会，要全国在恐惧的健康环境下发表意见。

政府开始服从了，后来由于害怕巴黎，又缩了回去。附庸们居然造起反来了，这激起了俾斯麦的狂怒。他怒气冲冲地训斥他们，说他们是革命党，简直是造反。他差一点要把他们送军事法庭审判，以叛国罪论处。这一切真是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

儒尔·法夫尔在费里埃尔受了侮辱后，发了几句怨言，这更使普鲁士人怒火冲天。即使是抗命的奴仆，也没有象儒尔·法夫尔那样受到如此粗暴的惩罚。什么！挨一顿鞭子就抱怨，到巴黎人面前去痛哭，好让他们由于同情你而发怒！这岂不是奸诈透顶了吗？俾斯麦请各国的君主都为这项叛逆罪作证。

法兰西已经堕落到如此的地步，居然甘心让她的所谓代表挨

别人的鞭打，假如人们对此不是怒从心起，那位容克地主一定会被人取笑的。

谁交给了儒尔·法夫尔先生这个耻辱的使命呢？他是以律师的身份自告奋勇地去承担这个使命的。

威廉反复说过，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算是他碰巧说对了。至少这对普鲁士是适用的。国王和民族真是配对成双的了。

我们忍气吞声地蒙受的耻辱，难道不是我们自找的吗？听了法夫尔律师要求法官们从宽发落法国人民的那篇演说词，人们只掉了几滴眼泪，却毫不义愤填膺。人们的双手被普鲁士人的戒尺打得通红，却还在发誓说要战斗到底。唉呀，我们惯于挨打，表皮都被打起老茧了。

1792—1870年

1870年10月30日

在这两个日期之间，相隔不过八十年！相当于一位老人的一生。不过，在这从摇篮到坟墓的八十年里，装得下普通的十个世纪的时间。一切都变了样。世代相传的精神消失了。人们在血统上属于同一种族，而在意识和性格方面却迥然不同。传统没有留下痕迹。在这个阶段的两端，竖着两面旗帜：1792——激情；1870——投机。

从四面八方，都听得到这样的倾诉：我们的先辈在一七九二年并没有今天这样多的人力、财力和知识。他们英勇奋战，拯救了祖国，粉碎了各君主国的联军。今天，我们拥有他们所没有的资源，难道我们却要在发出轻蔑的耻笑的欧洲面前，亡于普鲁士的铁蹄

之下？

一个更加悲壮的呼声回响着："九二年啊！我们一定要做九二年的男子汉！否则法兰西将沦亡。"接着的和声却很不合拍："让我们团结在国防政府的周围。"

我们九二年的先辈们团结在一个革命政府的周围，这个政府把国内敌人——保皇党人踩在脚下，又把剑锋直指保皇党人的同伙——外国入侵者。

而你们，你们所依附的却是一个镇压共和党人、追随保皇党人并唯入侵者之命是从的反革命政权。

你们中间最坚定的分子或许会说："应该推动政府前进，对它的软弱和迟缓给予帮助，但还是要维护它。"

啊！就像在旅途中需要带行李一样，你们把政府当作背着前进的包袱吗？

那末！现在正是行李拖住了旅行者的脚步，使他前进不得。

人民是由他们的政府左右的。他们的生存和灭亡都取决于政府。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奇怪的是，经过二十年的波拿巴统治以后，人们这么快就把这个道理给忘记了。

九二年的共和国无情地镇压君主制的走狗，取缔其全套军政班子，废除其法律、风俗、宗教、思想、直至服装。共和国屹立在君主制的废墟上，带领着群情激愤的法兰西投入战斗，如果普鲁士入侵者敢于在祖国的土地上多跨一步，共和国就毫不犹豫地来一个十一月二日事件，拿普鲁士内奸开刀。

一八七〇年的共和国只把共和党人当作敌人，拜倒在贵族和

教士们的脚下。它给予那些曾在我国烧杀抢掠的坏种们的有着百万家私的遗孀支付二万法郎的年金。它把儿童交给耶稣会教士，把公民交给军国主义者。它牺牲未来，恢复过去，杀害民主派，扶植反动派；它把我们的手臂捆起来，而对入侵者只作虚假的抵抗，并乞求他们的宽恕和欢心。它把外国入侵者的盟友——保皇党人当作自己的靠山，并以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来威胁革命党人。

当人们在高喊“救救国防政府！”的时候，怎么能同我们谈九二年呢？这二者有着天渊之别。九二年挽救了革命和建立了共和国；而市政厅却正在毁灭革命和共和国。

所有保皇分子都是市政厅的帮凶，他们二十年来一直在扼杀和谋害共和国。他们现在高喊：“共和国万岁”，正是准备更加疯狂地扼杀和谋害共和国。

市政厅是卖国贼的旗帜，是那些变色龙和两栖动物的旗帜，他们脚踏两条船，写文章支持各种派别，投靠每一个主子。形形色色的出卖灵魂的人都集结在市政厅的麾下，寻求它的庇护，并为市政厅的种种骗局吹喇叭，抬轿子。

市政厅就是反革命，它正在为法兰西挖掘坟墓。

炮　轰

1870年11月1日

敌人已经准备就绪。现在将轮到敌人的大炮发言了。至今一直是我们的大炮在发言，而人们已经渐渐地听惯了这种轻易取胜

① 指1572年8月23日到24日夜间，即圣巴托罗缪节日前夕，天主教徒在巴黎大规模惨杀胡格诺教徒的事件。——译者

的独白。对话将比独白激烈些。只要我方有大量的大炮发言，一切都将顺利。但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在布雷斯特和瑟堡的军火库里，大炮堆积如山。由于大炮很野蛮，人们宁可放着不用，而更喜欢律师和外交官们的甜言蜜语。人们怎能不对此感到悔恨！

一般的要塞保卫战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一切主动权掌握在防守者手中，而在第二阶段，主动权则转到了进攻者手中。

首先，经过长期准备的防守者从武装齐全的炮台上开火。进攻者处于挨打而无法回击的地位，只能用锹镐挖掘工事，准备报复。

当工事已经完成，大炮已经进入阵地，情况就改变了。

炮群的强大火力以密集射击压倒防守者。命中的炮弹和四面乱飞的弹片把炮台、大炮和炮手统统扫平。

必须赶忙远离棱堡之间的障壁和棱堡的侧面，挖掘工事保护棱堡的咽喉，以侧翼的炮火争夺堑壕的通道，然后守住缺口，守住退路，最后只得投降；否则敌人攻占了城市，按照所谓的战争法规，就有权将城市抢掠一空。

在防守者的兵力和士气处于中等程度的情况下，一场要塞保卫战的时间，根据要塞的位置，以及工事的数量和威力，事先几乎就能确定下来。防守部队抵抗不力或英勇奋战当然会改变时间的条件，但这只是个例外。规律依然存在。抵抗的时间已经确定了。

巴黎由于城市的规模巨大，不受这条规律的约束。防守者的战线同进攻者的战线相同，炮火无法密集射击。

然而，沿着这宽阔的圆周，有两处突出的部位，一处在东北方，

位于乌尔克运河和圣德尼运河出口的中间，另一处在西南方，位于普安-迪-儒尔门。第一处包括二十六号、二十七号、二十八号和二十九号棱堡，第二处包括六十四号、六十五号、六十六号、六十七号和六十八号棱堡。

城墙的这两处突出部位可能受到敌方的呈半圆形的攻击，这时敌方将具有密集炮火的有利条件。尤其是西南方的普安-迪-儒尔门的突出部位，是敌人配置在默东斜坡上的炮队的有利目标。大炮将以密集的炮火攻击六十四号、六十五号、六十六号、六十七号和六十八号棱堡，并对六十五号到五十三号棱堡的整个炮台实行纵射。这是城墙的最薄弱的部位，我们早在九月八日就已经指出，几乎可以肯定敌人将选择这里作为他的攻击点；这是容易预见到的，现在果真成为事实了。

普鲁士的大炮确实准备轰击位于塞纳河和布伦之间的狭窄地段。

所谓的国防政府甚至没有想到修筑多面堡以据守险要的默东高地。德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在那里安顿了下来，四面就是房屋、河谷和树林。市政厅所关心的只是低三下四地恳求俾斯麦息怒，用笨伯雅克①的金币去购买和平。

可是，我们将有重炮来回敬克虏伯大炮吗？

要塞保卫战的第二阶段即将开始，在一般情况下，防守者所扮演的角色将由铁锤而变为铁砧。

假如巴黎具有和敌人同等数量的炮火，她将能免遭这种恶运。

---

① 法国贵族给农民取的轻蔑绰号。——译者

但是这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巴黎有足够的地方设置炮位,并同敌人的炮火对抗。巴黎将以堡垒对堡垒,大炮对大炮,在战斗中保持平等地位。假如她掌握的大炮比普鲁士人更多,她就能以优势的炮火压倒敌人。

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德国的大炮将很快获得优势,我们将眼看着我们的堡垒被炸塌,大炮被击毁,全部防御工事成为一片废墟。

再加上弹片四飞和一片火海,那些怕得发抖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话柄。惧怕能够鼓起勇气。

直到目前,普鲁士人的大炮保持着沉默,而我们的大炮却在大声发言,于是惯于吹牛的报纸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并使群众继续怀有幻想。

罪恶的谎言是动摇和堕落的前奏。

由于当局的腐败无能,白白地浪费了六星期时间,使要塞得不到武装,造成了枪炮的致命的不足,从而将导致我们的灭亡;想到这里,人们不禁感到心酸。

外省的情况如何呢?卢瓦尔军团在什么地方?政府对于这些萦绕在人们心头的问题不作任何回答。市政厅顽固地保持沉默,使我们越来越迟钝。据说,由于普军的入侵,城外的政府代表团被迫放弃了图尔,撤到了里摩日,也有人说是撤到了克莱蒙费朗。究竟是真是假,谁能猜得到?我们的独裁者们像哑吧一样。他们让居民陷于担忧之中。心绪不宁会使身体强壮的人也衰弱下去。

可是,只要最危险的时刻一到,巴黎所有的男子汉们都会奋起的。

政府的信义

1870年11月3日

抗而不战的国防政府最近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地暴露出了它的信义的价值。

昨天，政府主动地通知各区区长，同意举行市政选举；当晚，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以后，又答应了于十一月一日星期二改选政府成员。

在经过双方郑重讨论并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根据人民的委派而进驻市政厅的公民们答应从市政厅大厦撤出共和主义的营队。

老实说，对于我们的对手的信义，我们并不寄于太大的希望；他们过去曾多次地背信弃义。第二天，他们果然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他们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完全用信义玩弄花招。

他们不举行选举，却反而问道：你们究竟愿意不愿意选举？公民投票随着独裁者的刚愎自用也被复活了起来！这是过去他们同波拿巴唯一的不相似之处，现在他们也不再想保留这一点差别了。

反动报纸疯狂地唆使政府更加无耻地践踏自己的诺言。好极了，——对于圣日耳曼区的国民自卫军的三个耶稣会教徒的营队，即第十五营、十七营和一百零六营，政府只能言听计从，因为这三个营以及布列塔尼别动队是政府的唯一支柱。

天主教徒的军队依靠设置的陷阱，赢得了市政厅战斗的胜利。

愿世界获得光明吧！

十月三十一日事件的真相

1870年11月4日

对于十月三十一日夜晚的事件，反动派的报纸作了谎话连篇的报导。

造谣中伤是它们的习惯，而习惯是不能改变的。

不过，由于公众不加鉴别地轻信他们听到的各种消息，布朗基公民认为必须讲讲他参与十月三十一日事件的经过。

自从不再担任第一百六十九营营长以来，布朗基公民已经没有营队归他指挥；他根本没有去冲击市政厅。

在五点半钟前后，他接到通知说，他的名字已被列入市政厅通过的新政府名单中。

六点钟，他应人民意志的召唤，动身去就职，费了好大的劲，终于进入了市政厅大厦。

在一间大厅里，公民们围着一张堆满了文件的桌子，以极其满意的心情欢迎他的到来。

他们当即请他就任新政府成员的职务。他问弗路朗斯在什么地方，人们回答说，弗路朗斯正在看管旧政府的成员，不能离开他的职守。

布朗基公民试图到他的同僚那里去，以便一起会商。由于守卫门口的第一百零六营国民自卫军坚决阻拦他通行，他没有去成。

考虑到局势十分危险，他又回到原来那间大厅，专心致意地关注保障市政厅和工事的安全问题。

他起草了并单独签署了以下的命令：

命令封闭一切关口，阻止一切使敌人可能获悉巴黎城内发生冲突的消息泄露出去。

命令各堡垒的指挥官密切注视并坚决击退普鲁士人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

命令二十来名营长集合士兵，立即把部队带到市政厅。

命令已经在市政厅广场集合的各营国民自卫军立即进入市政厅，把守各道门户并保护市政厅内部的安全。

命令这些部队把由圣日耳曼区的由正统派和教士们组成的第一百零六营从市政厅赶走。

命令当时驻扎在市政厅广场的一营国民自卫军占领警察局。

命令几位公民进驻几个区政府，代替现任区长。

这几个区的名称不必一一列举了，总共就是三、四个。

这些命令一部分得到了执行，其余的没有能够执行。

获悉一些敌对的国民自卫军营在市政厅内部以暴力行动反对人民政权，布朗基公民再次决定同弗路朗斯会面，他对于两人被分隔感到不快。

他去到弗路朗斯那里，并在弗路朗斯的陪同下，向原来的大厅走去；他们要穿过刚被第十七营侵占的一间屋子，第十七营也是属于圣日耳曼区的国民自卫军。第十七营同护卫弗路朗斯的公民们冲突了起来。

公民布朗基被他们认出以后，立即成了他们攻击的专门目标。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争斗以布朗基被他们绑架而告结束。布朗基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奄奄一息，被扔到一条过道里，那里有第十七营的其他国民自卫军看守。

这批国民自卫军比较人道一些，他们把布朗基安置在一条长凳上，使他得以喘过气来。在他的身旁，躺着蒂鲍尔蒂①，他同样也遭到了逮捕和殴打。他的头发和络腮胡子也给人揪掉了。

布朗基恢复知觉以后，对他较为人道的那批十七营自卫军押着他沿着一条卵石路面的过道，一直把他带到一扇关着的大门跟前，沿途由两行十七营和十五营的士兵簇拥着。

门口站着的七、八名武装公民向十七营询问他们押送的囚犯是谁。这个营的一名膀大腰圆、膂力过人的士兵立即向提问的人扑去，扼住他的喉咙，用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按在门上。就在这时候，冲突的人群中响起了一声枪响。

十七营的国民自卫军举着枪托仓惶地向通往过道的楼梯撤退，而布朗基公民一个人留在大厅里，夹在敌对双方之间。

布朗基讲了几句关于避免流血的话以后，回到解救他的人中间，他们是弗路朗斯的狙击兵。亏得他们，布朗基才获得了自由，甚至可以说，他们救了他的命。因为，十七营的这些士兵，甚至在他们看到自己已被人民武装包围并受到压迫的情况下，尚且疯狂地顽抗，那么可以料到，假如他们毫无危险地控制着布朗基的话，一定会把他碎尸万段以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布朗基在他们的手中当了二十分钟的阶下囚。

回到会议大厅后，他看到他的同僚们——弗路朗斯公民、德勒克吕兹公民、米利叶公民、兰维埃公民——团团围坐在一张桌子边。莫蒂公民没有就座。他和德勒克吕兹公民都没有签字同意就职。

---

① 保陆·蒂鲍尔蒂(1825—1901年)，意大利人，早年曾同加里波的一起战斗，后迁居法国，曾参加巴黎公社。——译者

从六点钟起直到撤出市政厅为止，临时委员会的任何其他成员都没有来过大厅，也都没有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在特洛胥将军的部队完全包围了市政厅以后，讨论的问题就是决定对策。

德勒克吕兹公民建议发表下列声明：

“我们，签署本宣言的公民们，由市政厅会议指定负责主持巴黎公社的选举和处理当前的日常事务；

“根据多里安公民的声明：公社选举的预备程序业已完成；公社的选举将于明天星期二在他本人和舍勒公民的主持下举行；临时政府的选举将于第二天进行；

“为了危急中的祖国的利益，为了避免可能使新生共和国的洗礼蒙受冲突的血污；

“我们宣布：只要人民的权利得到尊重，我们将等待定于明天举行的选举的结果。”

接着，布朗基公民宣读了下面的公告：

“巴黎的公民们：

“麦茨惨败的消息传来，把法兰西出卖给普鲁士人的停战协议正在蕴酿，巴黎的居民认为必须撤换这个严重地损害了共和国的政府。

“巴黎居民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采取初步的安全措施，并召集巴黎的选民，以任命新的市政当局。

“临时委员会吁请全体公民支持这些法令并安静地等待选举揭晓。

“临时委员会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障堡垒的安全，并防止堡垒和城墙遭受敌人的攻击。

"选举揭晓后，临时委员会将立即移交权力。"

这份致巴黎人的公告没有被通过，布朗基只得赞成德勒克吕兹的提议。

于是，临时委员会的六名成员来到多里安先生的办公室。

多里安公民原是国防政府的成员，这次又为群众推选为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他没有离开市政厅，只是不参加临时委员会的一切讨论。

他和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达成了下列协议：

1．十一月一日星期二举行公社选举或市政选举；

2．十一月二日星期三改选临时政府；

3．设立在市政厅的两个政权互相谅解，彼此分手，既往不咎，不得进行报复和追查。

于是，被扣押在市政厅里的国防政府成员，共和党人及其武装力量一起离开市政厅，穿过集聚在广场的部队，彼此就分开了。

这项协议取得了当时在市政厅的儒尔·法夫尔先生、加尔涅-泊热斯先生、儒尔·西蒙先生和塔米西京先生的同意，也得到了当时正带领一营别动队试图打开市政厅大门的儒尔·费里先生的同意，而协议的执行却经过数小时的辩论后才得到实现。

第一次尝试，由于别动队持反对态度，架起了刺刀，因而失败了；共和党人表示，如果有人企图破坏协议，他们准备在市政厅里坚持下去。

应该指出，在这动乱之夜，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无法安静地商讨他们共同面临的局势。喧嚣愤怒的人群淹没了他们，任何协调的行动都不能进行。

弗路朗斯始终不知道广场、市政厅内以及市政厅门口有好几个共和主义的营队，这些营队是由布朗基召来的，当时他和弗路朗斯不在一起，他单独一个人在一个会议厅里发出了许多命令，这些命令在市政厅被包围前已经送了出去。

布朗基也不知道弗路朗斯的狙击兵就在楼下，直到这些狙击兵把他从反革命部队手里解放出来时才知道。

反动报纸的报导纯属造谣污蔑。他们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这里先举一份报纸为例，这份报纸居然说：

“冲进市政厅的人们首先让人摆上一桌晚宴，他们在席间派出两名代表拿着布朗基签字的收据去财政部提款。那是张一千五百万法郎的收据！”

这份报纸接着说，“人们把一位上尉领到财政部秘书长跟前，这位上尉出示由布朗基签署的一张取款收据，命令总出纳处交给取款人一千五百万法郎。”

布朗基公民在市政厅没有吃过一块面包，没有喝过一杯水，只是在挨打后，由于十七营的一名国民自卫军士兵的坚持，才喝了两口水。

十七营的其他战士们不要过分地抱怨他们这位伙伴采取了人道行动；这并不影响他执行看守囚犯的任务。

布朗基公民既没有派任何人到财政部，也没有派人去其他的部。提取一千五百万法郎一事无非是反动派惯于编造的可悲的神话故事。

反动派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武器。

停战和投降

1870年11月5日

十一月二日的《时报》①，登着这么一段话：

“巴黎已经全民武装，法兰西正在进军，外省正拿起武器，……人们已经觉醒，法兰西今天又重新获得了欧洲和世界的尊敬。”

“……列强们已经明白了。首先，俄国已认识到，如果再不采取行动，那将是犯罪行为……一项协议达成了，该协议导致以下的结果：任何绥靖尝试都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在法国建立一个合法政府，而合法政府的建立则有待于达成停战；因此现在就应当建议停战……”

真是欲盖弥彰。帝国军队的迅速溃败，普鲁士人的胜利进军，已经使欧洲确信我们的腐败无能。

听到我们的失败，国王们一片欢呼。

当国防政府向他们恳求怜悯的时候，他们冷冰冰地回答说：“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于是他们就袖手旁观，坐等我们末日的到来。

可是，就在市政厅到处乞求怜悯和援助的时候，巴黎义愤填膺地站了起来。尽管我们的所谓政府把海岸炮弃置在布雷斯特，尽管政府不接受英国和别的国家提供的枪支，尽管政府不作任何准备，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这一切都阻止不了巴黎一天比一天更富有威胁性。政府不得不向巴黎发放武器，装出一副和巴黎从感情到语言全都一致的样子，并戴上坚决抗战的假面具，否则政府就会受到谴责和被抛弃。

① 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61年至1943年在巴黎出版。——译者

敌人原以为可以顺利地进入一个害怕得发抖的城市，想不到碰到的是刺刀林立的堡垒。时间过去了，他们的企图不但不能得逞，而且在战斗中付出了血的代价。无论首脑们如何腐败无能、消极怠工，老百姓的坚强决心还是占了优势。

两个月以来，普鲁士人在巴黎城下旷日劳师。听到巴黎奋起的消息，欧洲大惊失色，帝王们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本来一直保持着轻蔑的沉默，期待伟大的革命的法兰西走向灭亡。

但是，伟大的革命的法兰西决不会灭亡。它举起五十万把刺刀，无所畏惧地面对俾斯麦、饥馑和炮轰。它今天抗击着敌人，明天将转入反攻。它对政府的软弱无能和无所作为表示愤慨，大声疾呼地要求得到枪支和大炮。

国王们发抖了，他们内心惶恐却假装同情。当法兰西在浪潮的冲击下陷于没顶的时候，他们曾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而现在，当浪潮使法兰西有可能得到拯救和胜利的时候，他们改变了主意。

请看，他们是满怀人道和善意的。他们为流血而痛心。必须结束这些可怕的事情。万一巴黎在巴黎城下击败威廉，同外省会师，把德国鬼子埋葬在我们的田野里，然后率领共和主义的法兰西向君主制的欧洲猛扑过去，这对于统治者的世界，将是多大的灾难呀！那时候，国王、贵族、迷信统统将被送进坟墓，而脱离了黑暗和贫困的人民将站立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沐浴着科学和平等之光明！啊，不幸呀！不幸！快去救救黑夜和屠刀吧！

赶快促成停战，好让普鲁士集结军队，围住顽固的叛逆者，用武力迫使其就范。赶快签订和约，趁俾斯麦现在还能够利用胜利和既成事实发号施令。

十月三十一日夜晚的事件将使专制君主们重新看到希望而气焰嚣张。这些使他们充满了恐惧的巴黎人失败了，巴黎人的失败

并非败在敌人手里，而是败在卖国贼的手里。他们曾想粉碎外国入侵者的帮凶和同谋暗中策划的阴谋。他们由于憎恶内战而遭到了失败。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愿使同胞流血——而他们的可恶的敌手则从来不怕让同胞流血。

依靠反动派的刺刀而取胜的普鲁士人将恢复他们的昂昂气势，又将像费里埃尔那时一样色厉声严。革命曾经把他们的气焰压了下去，但是现在革命被解除了武装，俾斯麦松了一口气。他曾对各君主制盟国指出，如果巴黎贱民取胜，那将是他们共同的灭亡；而现在，使他感到十分恐惧的巴黎贱民已经从舞台上消失了。

忠诚被打垮了，自私胜利了，英勇的巴黎消失了，只剩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巴黎了。

现在和将来的敌人都不会再在巴黎面前害怕得发抖了。今天，巴黎在害怕，巴黎成了胆小鬼。巴黎要的是歌舞升平、骄奢淫逸的生活。

什么祖国，什么独立，都去它的吧！让我们吃呀！喝呀！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见鬼去吧！停战万岁！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

威廉现在不怕了。他说话的调门也高了。以后，他所要对付的是一些不愿意斗争的懦夫，这些懦夫尤其不愿意为建立他们深恶痛绝的共和国而斗争。对他们来说，出卖阿尔萨斯以换取君主制，这是反输为赢的一本万利的好交易。

割让一点领土对他们有什么要紧。很快就可以拍板成交。为了停战，为了解除包围，为了法兰西的耻辱和亡国，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

蛊惑分子被解除了武装。交易所和教会主宰了一切。我们且拭目以待，看他们如何行动。除非局势逆转，使国家摆脱这两种瘟疫，否则国家肯定完结了。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三日共和国被判处死刑

1870年11月7日

完了，巴黎的自杀业已完成。巴黎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破落的巴比伦，而这个巴比伦在毁灭的时候，甚至没有能够保住以往荣华时代的门面。

我们的当权者们本来可以让巴黎免受这样的耻辱。这样的耻辱对于当权者们取得他们暂时的胜利并非必不可少。只要他们还有一点羞耻之心，有一点感恩之情，他们就会顾惜这个古老的城市，不把巴黎的见不得人的丑事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尽管这件丑事为他们夺得了胜利。

他们却更愿意用巴黎的堕落来遮掩他们的怯懦，从而使巴黎在欧洲面前公开出丑。

为此，他们只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主义的禽兽本能就够了。他们毫不迟疑地这么干，于是，二十八万票赞成，五万二千票反对，决定出卖祖国，以换取几斤肉吃。他们将交出共和国，把它作为拍板成交的押金。

但是，人们且不要弄错了。反对这种卑鄙勾当的不仅是这五万二千张反对票。选民中有一半没有参加巴黎市内的投票。在反动派集聚了全部力量的情况下，弃权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就算在这弃权票中有五分之一属于左右两可或者甚至是保皇

派，如果把其余的五分之四和五万二千张反对票加在一起，就可以占整个选民的一半。

此外，假如再把那些十八岁至二十一岁的青年人算上，他们虽然不是选民，却并非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意愿，他们没有受到利己主义的沾染，他们的选票，在这场对垒中，将使心地正直、头脑清楚的人们以多数压倒那些酒囊饭桶。

尽管如此，在世界上，人们依然把这次投票看作是巴黎的耻辱。人们只会看到表面的票数，决不会想到弃权者的无声的反对。六个星期的抗战曾经博得人们的钦佩。而仅仅一天时间却立刻使我们到处受到蔑视。

人们在胆怯之余，却要自吹，人们明明去投降，却要打着英勇抗战的金字招牌，这是多么令人作呕！俾斯麦从此可以有恃无恐，毫无顾忌。九月四日的政府为他把唯一的真正的敌人——革命——解决掉了。普鲁士人的大功已经告成。他们现在只要下令打开城门和割让来因河流域的两个省。他们的命令一定会得到服从。

结局已经为期不远。备战和抗战的喜剧从此是多余的了。市政厅将迫使法兰西接受停战以及停战的保证条件，然后迫使法兰西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

至于共和国，她即将停止呼吸。保皇派的报刊今天就宣判它的死刑。

我们不久前曾说过，一八四八年共和国的寿命是按月计算的，而一八七〇年共和国的寿命至多只能以星期来计算。得出这一预言，并不需要绞尽脑汁。从今天开始，保皇派居然以共和国的名义取缔了共和党。

明天，该轮到共和国自己被取缔了。

一个民族的灭亡

1870年11月8日

“共和国已经灭亡！”所有的报刊都这样叫喊着。但是各个党派由于色彩不同，叫的声调也不一样。

真诚的共和主义者的叫喊含着痛苦，几乎有点绝望，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责备自己，因而也没有任何东西可加以掩饰。

别的共和主义者在痛心之余，带有一点后悔。他们不能问心无愧，他们没有沿着直路走。开辟未来的先驱，命定要走弯路。

那些勉强可算是共和党人，但又对共和事业毫不热心的骑墙人物，惊恐地感到自己被一股逆流卷回到无所作为的老地方去了，这使他们感到恼火：他们过去不肯向前奔跑，现在也不愿大步后退。他们竭力要做到更弦易辙而又不引起风波，从而保存他们的中间路线，保持他们在政治上的平衡。这是多么困难的平衡。

拥护君主制的反动派宣布，共和制已经灭亡。禅位已经开始。他们要求政府取缔共和党人，作为恢复君主制的准备。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把身不由己的政府牵着鼻子走。

政府在昨天还是反革命的首脑，而今天却只是反革命的臂膀。从前是主子和指挥，现在变成了奴仆和工具。政府依靠反革命取得了胜利，胜利使政府成为反革命的奴隶。

人民被烦恼和无知压得抬不起头来。

人民从根本上信任了共和政府，以为共和政府就是共和国，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这个政府竟然是君主制的复辟者。

政府已经把人民引向深渊，为了不落入深渊，人民紧紧地靠着政府。险恶的领路人将猛然一下挣脱人民对他的依靠，他将看着他的牺牲品滚进无底深渊，发出靡菲斯特①的奸笑。

然后，当政府回来领取卖国奖时，按照常理，它所领到的将是轻蔑的唾弃。

他们并不因为遭到唾弃而死去。遭到唾弃的人们可以在唾液中找到一种专门能适应他们机体的空气。他们大口地吸进这种空气，焕发起青春，甚至重获贞操。

当有利时机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将戴着新娘的桂冠，兴高采烈地出现在容易受骗的人民面前，再次引诱人民上当，把人民领向漆黑的深渊并把人民推落下去。——他们是中世纪神话传说中的恶鬼妖精。

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人们虽然勇敢地同这些鹗鹰搏斗，而不明事理的群众却硬是跟着它们走，这有什么办法！

可是，今天的问题不仅是不明事理，其中还掺杂着利己主义。

巴黎在垮下去：它对于不能正常生活、被迫削减食物和丧失种种娱乐感到难以忍受。它过不了像施特拉斯堡那样被围困的生活，它不愿意把阴沟里的耗子当饭吃。它已经过了四十天的斋戒节。现在让我们过狂欢节吧！

西伯里②的子民们，你们投票吧，你们投**国防政府**的票吧。国防政府将把城市交给普鲁士人，把肉送到你们的锅里，让外国的顾客光顾你们的商店和妓院。

国防政府没有制造枪炮，枪炮是制造不和的危险东西。

相反，国防政府准备了将能带来和平的停战。和平万岁！吃

① 歌德作品《浮士德》中的魔鬼。——译者

② 意大利的一古城名。那里的人以贪图享乐而著称。——译者

喝玩乐万岁！让我们把共和国、阿尔萨斯、洛林都扔掉。我们将做普鲁士人，但是我们将不用在肉铺门口排队，牛奶将送上门来。

啊，上帝！牛奶！——为了一杯牛奶，还要什么祖国，什么宇宙！请你们把那些从我们嘴边夺走牛奶的强盗们枪毙。打开吧！请把通向富裕之门打开。那怕耻辱也跟着进来，那有什么要紧。

诗人说，人以羞耻为生，不因羞耻而死。

诗人说得很对。

垂死的征兆

1870年11月9日

选举一片冷清。五分之四的选民弃权。当选的区长得票少得可怜。巴黎变得死气沉沉。

政府拒绝了停战。这是真的吗？也许是的。普鲁士人不许向巴黎提供给养。如果他们同意了这一点，在所有其它问题上，政府是会向他们作出让步的。他们并不着急。十月三十一日以来，他们有把握把肥肉捞到手，他们要的是整块，那怕一小片也不肯放过。

人们难道以为普鲁士人是那么笨，会把这项停战要求的意思也搞错吗？政府喊道，“我们没有要求停战，这是列强提出的建议。”耍这种可悲的小聪明，不但迷惑不了别人，反而会更加突出地暴露自己的虚弱。

政府本来能够以战争取胜，可是它从未打算打仗，而是不论何时何地一味追求和平。政府曾先后派了儒尔·法夫尔先生和梯也尔先生去费里埃尔和凡尔赛求和。

虽然不断碰壁，政府对普鲁士的盛气凌人却毫无反应。从九

月四日至二十日，当时道路畅通，政府完全可以用足够的枪支大炮来武装巴黎并重操胜券，可是政府没有作过一点准备工作。

法夫尔先生九月的使命以耻辱而告终，政府依然不作准备。这次要求停战又被一记耳光打了回来，政府仍将不作准备。

政府让投降逐步升级，它不打算超越阶段，那样做是笨拙的，甚至是鲁莽的。尽管它很想早日实现，但是不能急于求成。

昨天它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其实，各步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上一步是在十月三十一日走的，相隔不过八天。一个星期之内，已经走完了多远的路程！

这是可以理解的。巨大的障碍已经被扫清。革命已经被征服。只有革命一直高举着荣誉和民族的旗帜。这面旗帜在三十一日夜晚被打落了。从此没有了障碍，一切都朝着灭亡的路上奔去！

发出战争的号召吗？今天有谁会响应呢？是劳动人民吗？两个月来，劳动人民被谎言所欺骗和愚弄，被虚假的军事行动和装模作样的假抗战搞得莫衷一是，无所适从。难道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一直在拥护战争的伪装下反对战争，资产阶级政府的全部行动无非是代表了并贯彻了这个阶级的秘密愿望。

如果胜利的代价是成立共和国，资产阶级甚至宁肯不要胜利。资产阶级所以放弃斗争，所以坚持要无条件的和平，正是因为它不要共和国。假如民族的伟大要打破它的特权而为平等打开大门，它决不要这样的民族伟大。

它宁肯要外国人！宁可让法兰西从欧洲的地图上被划掉，宁可使法国人民从世界各民族的行列中消失！它不接受新思想。让科学、正义、进步统统灭亡，只要资本的绝对统治！

因为这场对外战争，实质上主要是一场国内战争。是国内决定着国外。资本家们宁要普鲁士国王，而不要共和国。有了普鲁士国王，他们即使没有政治权力，至少也有社会权力。

他们希望威廉将以得到两个省为满足，而把剩下的各省移交给一个依靠刺刀和愚昧支持的君主。

依靠奴役群众而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这就是统治阶级的理想。

法兰西将因喜爱这个理想而亡国。

毁　灭

1870 年 11 月 10 日

谁都知道，我们正沿着斜坡向下滚去，眼看就要滚到底了。就在这个时候，御用报纸却剑拔弩张，讨伐起普鲁士人来了。它们准备在它们的地窖里迎接敌人的炮轰，把马肉当牛肉吃，最后，到了没有别的东西可吃的时候，就吞食自己的皮靴。

这些装腔作势的吹嘘还能骗得了谁呢？居民已经甘心于失去羞耻，他们将把这杯苦汁喝干。硬充好汉已经毫无用处。人们早就看到了结局将是什么。

寡廉鲜耻的《费加罗报》建议用最简单的办法，即普选这个绝妙的万应灵药来解决时局问题。普选干的漂亮事情已经不少，现在人们把这台压轴戏让它来唱，由它来决定接受或是拒绝俾斯麦的最后通牒。

有人厚颜无耻地说："即使是那些坚决的主战派，在投了票以后也将会顺从地跟着走，值得自慰的是，我们将能知道，主战的人

数毕竟寥寥无几。”

这份诚实的报纸就是这样来结束战争的，而它在挑起战争的初期却大喊大叫要“打到柏林去！”，并把主张和平的共和党人作为普鲁士奸细和卖国贼看待；那时，它为大资产者出谋划策，用大棒威吓无政府主义者。

今天，它主张匍匐投降，却依然气焰嚣张，备受上层阶级的宠爱。人们且不要责备这份报纸及其体面的订户们出尔反尔。相反，他们从未改变立场。他们当初要通过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来维护专制制度，他们希望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取胜。现在他们要通过即使是屈辱的和平来维护专制制度。对他们来说，采取什么手段并不重要。他们不就是社会的独裁者吗？他们的意志就是唯一的法律，而且这种法律无论如何都是神圣的和不可亵渎的。

谁妨碍他们或反对他们，就是犯罪。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只要他们愿意，把法兰西出卖给威廉，那也是秩序和法律。反对这种符合他们心愿的出卖，那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造反。

在国内问题上，人们已经看到了资本统治的业绩。现在就要领教它在对外问题上的手段了。明天我们将知道它怎样对外维护民族独立，对内维护自由了。让不满的人们倒霉去吧！军事法庭将依法惩办他们。

公众再也不相信一个听命于教会和交易所的政府的装腔作势的战争叫喊了。围绕着费里埃尔一事而进行的欺骗已使公众领教够了；政府当时在祖国的神位面前赌咒发誓，而在幕后却又磕头求饶，背弃了誓言。

如果你们说要停战、投降、割地、拆除工事、赔款、普鲁士人武

装占领，等等，那完全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尽管众说纷纭，你们的要求还是说得过去的；可是你们不要再提别的要求！尤其你们不要用把战争进行到底这样的话来嘲弄我们。在我们受到羞辱之后还要听你们说大话，把我们全副武装起来后却要带我们去跪倒在俾斯麦的膝下，这太过份了。

战鼓声和马赛曲歌声已经成为不堪入耳的噪音。你们不妨到歌剧院里去演奏这些，让我们的老爷先生们赏心悦目，使他们在谈情说爱之余增添一点战斗的豪情。但是，不要在街头和那些关着爱国者的监狱门口演奏，因为那些由于试图阻止卖国而被当作卖国贼囚禁起来的爱国者正在呻吟，他们听到这些演奏实在太痛苦了。

不到三个月以前，波拿巴把他们作为普鲁士奸细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十五天以后，波拿巴在色当把军队交给了普鲁士。市政厅准备以同样的罪名向军事法庭控告他们。

国防政府把民族出卖给普鲁士，难道还要用十五天时间吗？

其实，巴黎已经以二十八万张赞成票同意了国防政府。有人说，赞成票达五十万张。撒这个谎又何必呢？这二十八万张票不是已经足以使古老的首都永远蒙受耻辱并使祖国永世不得翻身了吗？这些添加的票不能算数，这些所谓的选票是政府强加于军队和别动队的，而且这个数字既没有经过检查，也没有得到核实。

众所周知，这次军队中的投票比拿破仑的全民投票更加不自由。市政厅在专制、独裁和欺骗这些方面，就连波拿巴也望尘莫及。

巴黎现有七十万名选民。除去五万张反对票以及弃权票外，有二十八万张选票赞成这一可悲的决定，这是足以说明问题的。至于来自农村的不幸的难民，他们的意志在天平上又有多大的份量呢？他们背井离乡、倾家荡产、流落外地，为了恢复家园，他们宁肯

抛弃法兰西；既然他们陷于无知和自私之中而无人过问，人们难道可以责怪他们吗？

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奄奄一息的法兰西民族作最后的挣扎了。交易所将以每张股票价格上涨十五法郎来迎接它的末日到来。因为民族虽然死去，交易所却并不因此罢休。交易所还将长时间地吮吸尸体的血液。

最后的喜剧

1870年11月11日

反动派的残酷的滑稽戏究竟还要演多久呢？

政府的报纸装模作样地充好汉，一手放在背后，一手捻着八字须。它们耀武扬威地摆开阵势，吹起冲锋号角。在波拿巴的统治下，谁主张共和国，谁就是俾斯麦的帮凶；而在今天的共和国时代，谁搞民变，谁就是俾斯麦的帮凶。这次民变的命运不如上次：上次民变在九月四日取得了成功，这次却在十月三十一日遭到了失败。民变的参与者成了阶下囚。

扫除了这个障碍以后，市政厅将向着普鲁士军队猛扑过去，并把他们统统消灭。十月三十一日民变的失败和十一月三日选举的胜利使巴黎欣喜若狂，大家众志成城，热烈要求英勇的政府率领他们去战斗。不要再派法夫尔和梯也尔去谈判了！不要停战了！要打仗！要决一死战！

但是，反动派已经听厌了这套老生常谈，他们冷冰冰地对我们

的英雄们说："对不起，要搞和平，就是要干脆利落地搞和平。你们的雄辩词令不再行时了。在需要用雄辩词令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用过。此一时彼一时，我请诸位还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吧。你们的气势汹汹的最后通牒过去就不太严肃，现在就更不严肃了。打了败仗还以胜利者自居，这太不像话。应该由普鲁士人来发号施令，而我们只有俯首听命。够了，不要再大吹大擂了。过去，我们比谁都吹得厉害，那些不像我们那样吹嘘的人，理所当然是普鲁士的奸细。我们甚至差一点以这个罪名把他们统统枪毙。"

"今天，谁不跪倒在威廉的面前，谁对停火表示气愤，大喊反对屈服，谁就是普鲁士的奸细。证据就是你们已经根据俾斯麦的预告和宣布，把他们当作普鲁士的帮凶关了起来，并且你们将把这次同敌人串通一气的民变提交军事法庭审判。"

"你们自己也要小心一点，不要继续散布这些捣乱分子的话和采取他们的态度，不要为了同样的原因而被送去受审判。人们对你们不会比对他们更优待些，明白吗？秩序党所以至今称赞和支持你们，这是因为你们是秩序的工具；你们知道，在需要的时候，秩序党可以改换工具。"

"在当前，秩序就是要结束被围状态，就是无条件求得和平。让儒尔·法夫尔先生把他的堂皇口号：'不让出我们的一寸土地，不交出我们堡垒上的一块石头！'放回他的公文包里去吧。国家不惜代价要求得安定。让我们把威廉以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为满足看作幸事，因为如果他要求得更多，我们也只得满足他的要求。"

"特洛胥将军在十月八日为祖国立了功劳，因为祖国就是资本。不过，他可不要让他的刺刀脱离我们的控制。他已经同群众搞坏了关系，只剩下国民自卫军还支持他，这里指的是老国民自卫军，即圣苏比斯区、圣托玛-达干区、圣克罗提区、特立尼丹区、圣奥古斯丹区、洛雷特圣母区、马德伦区、圣罗什区、圣日耳曼-洛克

赛区、圣日耳曼-台普来区的服从于我们的自卫军，一句话，就是以资本、刺刀和教会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自卫军。”

“这些自卫军要求结束废话和噪音，恢复沉默和安静。已故的罗米厄在一八四八年说过：‘我们必须恢复秩序，哪怕借助俄国的大炮。’这句话代表了自卫军的要求。我们现在要说：同普鲁士达成和平！让普鲁士给予我们君主制，让它取走阿尔萨斯和洛林。谁反对我们的决定，就把谁送交军事法庭！”

以上是反动派的真心话。不要有多大的学问就可以从字里行间认清他们的真意。即使今天不能，明天一定能够认识清楚。因为堤岸已经在十月三十一日决口，结局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很快地到来。共和国和法兰西民族已在那不祥的一天里被淹没。

在我们丧失独立的最后时刻，各种道德堕落应运而生。战争的儿戏和和平的悲剧手拉着手并肩前进。在《政府公报》的同一栏里，刊登着战争命令和关于停战和谈的消息。但是，人们对这些命令和消息的关心程度有着多大的不同！对于动员十万名国民自卫军、围城战报、武器的制造这类消息，究竟有多少人瞥上一眼呢？有些天真的小市民和善良的老百姓，他们总是被别人玩的把戏所欺骗。

而交易所、商界、厂主、律师、教士、自由职业者，他们急切关心的是哪一版呢？是外交版还是战争版呢？在当前，战争早已过时了，搞外交才是紧迫的现实问题。在普鲁士国王面前，仅仅是下跪还是再要磕头呢？这就是法兰西民族面临的问题。

市政厅没有一分钟相信过抗战能够获胜，它花了二个月时间

打这场可怕的毫无希望的战争，仅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威，为了继续作为政府存在下去！

预先就对失败确信无疑，这正是失败的唯一原因。如果及时地认真准备，我们肯定能够得胜。但是人们无所事事，确信即使准备也没有用处。由于少数几个人的愚蠢、自私和野心，祖国正在堕入深渊，人们怎能不痛苦万分和义愤填膺呢？

政府的业绩

1870年11月13日

九月四日的政府结束了法兰西的生命。

就是这些人，过去曾扼杀了一八四八年共和国。

在一八四八年，灭亡的只是共和制，而祖国幸存下来了。

在一八七〇年，这些恶棍却把共和制和民族一起都毁掉。

九月四日以来，巴黎在他们的手掌里徒劳地挣扎着。可怜的城市将逃脱不了羞辱和死亡的命运。

为了求得幸免，巴黎在十月三十一日作了拚死的反抗。一切恶势力急忙援助刽子手们，使巴黎重新落入他们的魔爪。从那天起，巴黎开始走向灭亡。

得了重病的病人，有时由于不堪病痛的折磨，自己要求快死，以期早日结束痛苦。

巴黎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十月三十一日是她争取生存的最后一次努力。她又无力地倒了下去，一蹶不振了。从此，她等着被送进坟墓。她向掘墓人请求让她安息，而且越快越好。她不愿意

这样度日如年地拖着，只要再拖一会儿，她就会去自杀。

假设十月三十一日的危机得到另一种结局，那么巴黎今天将是昂首挺胸，威风凛凛，令人生畏，她的喊杀声将成为获得解放的欢呼声。可是现在，在她临终的病床周围，听到的只是一片大吹大擂；到她寿终正寝的时候，也将是同样的大吹大擂。这样的送葬真是绝大的讽刺。

请你们读一读停战被拒绝以后的半官方报纸吧。他们简直成了雷神般的猛将！他们愤怒地吹着冲锋号。不是冲锋，而是仓惶逃命。发布动员十万国民自卫军的命令，那是可笑的儿戏！根本实行不了。那纯粹是为了争取两三天时间而装腔作势。不等两三天时间过去，这些只顾逃命的懦夫将不再要求停战，而是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甚至投降。

赛跑开始了。懦夫们争先恐后地提出结束战争的药方。他们在报纸上互相竞争，看谁第一个跪倒在威廉面前。有一份报纸提出召开制宪议会，实行停战和补充给养。这个最大胆的建议被一致否决。俾斯麦不愿意让巴黎补充给养。

另一家报纸取消掉关于补充食物和以二十五天为限期的要求，它提出立即召集全国的代表开会，讨论和或战的问题。这种讨论结果如何，人们可想而知，那就是服从普鲁士国王陛下的旨意。——尽管如此，这家报纸的建议还是过于大胆，特别是提得太晚了。

最后，另一家报纸更加直截了当。不用选举，不用召开“国民大会”。一百多位贵族老爷，无须等待平民百姓的委任，以国家代言人的资格自己决定开会，行使最高权力，决定民族的命运。对于

他们的裁决，法兰西只应该报以热烈的欢呼。

这些贵族老爷把国家出卖给普鲁士，或许会觉得有点羞耻，而这种近于后悔的内疚或许会使他们感到犹豫。这大可不必。立即和平，不用废话。应该向全民族提出下面的问题，进行全民投票："你们要战争，还是不要战争？"这将是公民投票的杰作，而且肯定是空前绝后的杰作。

农民们难道会愿意受普鲁士人的烧杀抢掠而兴致勃勃地去投票拥护战争吗？啊，这可难说。那些没有同普鲁士人打过交道并且知道他们离得还远的人，不太相信普鲁士人会来登门拜访。也许一时爱国心冲动，他们不等尚属渺茫的危险到来，就让法国军队从洛林和阿尔萨斯打过去了。法国人有多一半还没有见过德国人。这对和平毕竟是个极大的危险。别搞这玩意了吧！

说得有理，另一家报纸接着献策说："何况，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全在巴黎。和或战的问题只取决于巴黎。法兰西不能反对巴黎的意见，更谈不上同她分庭抗礼，法兰西只能从巴黎的手里得到决定未来的解决办法。既然仗要巴黎来打，首先就得问巴黎，她是否愿意打仗。因为让巴黎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打仗，要比没有征得巴黎的同意而让她投降，危险大得多。如果人们认为巴黎要和平，却又偏要巴黎去打仗，这岂不是最可悲的逻辑混乱。"

"如果巴黎决定要和平，那么政府只要附和这个愿望，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了。相反，如果巴黎投票赞成战争，那时候，**确确实实有着我们明确的意志为后盾，政府怎么会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呢？**"

人们真的以为，由于巴黎丧失了信心，政府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这是政府的如意算盘，大概也是它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可是，

假如共和党人这么便宜就发给政府一张赦免证，那才怪呢。我们不知道首都现时是否愿意作战。可以肯定的是，从九月四日至十月三十一日那段时间，首都强烈地、简直是疯狂地要求打仗。首都委托政府，或者不如说政府自动地担负起了国防的责任。政府以国防命名，就是为了满足公众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想法，正是这个为它所窃取的骗人的称号，才保证了政府的有力地位。

正是在国防外衣的掩盖下，政府才能强制推行其独裁，把政敌镇压下去，制止革命并保存了波拿巴的制度和人员。正是在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幌子下，政府才能推行彻底的和平政策，让巴黎处于没有枪炮、没有军事组织和不作任何抗战准备的状态。

盲目而天真的巴黎相信了政府的许愿、保证和诺言；而它的许愿不过是谎言，它的保证不过是欺骗，它的诺言不过是背信弃义。两个月来，政府蒙骗了巴黎人民，使他们空自等待而感到厌倦，使他们由于莫名其妙地吃了败仗和无益地消耗了储备而灰心。从此，怀疑代替了信心，焦虑代替了希望，冷漠代替了热情，消沉代替了兴奋。政府使勇敢的战士变成了胆怯的懦夫，使英勇的巴黎成为自私的巴黎。政府以妇人之见代替了男子汉的决断。因此不再号召保卫祖国，而是规劝人们顾全家庭。它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把一支军队改造成了羊群。

当政府自觉自愿地亲手把交托给它的武装力量摧毁以后，当它使得战士们心灰意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不成其为战士的时候，人们却来对政府说："你们要通过无记名投票，征询战士们的意见，看他们是否愿意打仗。如果他们说不愿意，你们就可以摆脱一切责任，把自己的手洗得像雪一样清白。"

在关于求和还是抗战这个问题上，应该通过记名投票，让巴黎居民明确而高声地作出回答，大家将看到投降派是否能取得多数。可是，政府才不会这么干，因为政府要的是投降，两个月来的鬼蜮伎俩就是为投降作准备。

如果以为在主战的民意支持下，市政厅将能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决心，这就未免低估了两个月来的鬼域伎俩了。假如巴黎人宣布他们决心战斗，国防政府仍会同过去一样置之不理，甚至更加不予考虑，因为随着普鲁士增援部队的到达，我们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而我们在军事上和组织上又没有丝毫加强。

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政府决不愿意认真抗战。它对巴黎和巴黎的热情嗤之以鼻。它过去和现在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乞求和平，而得到的始终是被侮辱。它决心要接受敌人的法律，因为法律的第一条是取消共和制，恢复君主制。

无论如何，反动派决不容忍共和国得到巩固，而市政厅只不过是反动派的十分驯服的仆从。市政厅所以是反动派的仆从，这是因为它同反动派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目标。

政府和反动派现在快要达到这个目标了。他们踢开了共和党人，迷惑和欺骗了人民，到处散布了怀疑、不信任、疑虑和失望情绪。通过这项瓦解工作，法兰西已经人心涣散。法兰西已不复存在，巴黎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群惊恐四散的羔羊，牧羊人正在驱赶着它们，把它们送到六十万至八十万只德国狼的嘴里。

人民无权决定

1870年11月14日

只要侵略者践踏着法兰西的一寸土地，任何人都无权召集制宪会议，无论是巴黎政府，普鲁士国王——巴黎政府的引路人，或图尔政府——联邦主义贵族的仆从和代言人；即使法兰西也没有这个权利。由于敌人的存在，法兰西被剥夺了公民权，正如被囚禁的勒古罗斯①谈到自己时所说的，丧失了公民权。

在德国的刺刀压迫下，法兰西民族已经不能由自己作主。

然而，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前程，法兰西应当是自由的。

法兰西失去了自由，因此她也就失去了这个权利。

看到阿尔萨斯、洛林、香比尼，在普鲁士的刺刀搁在脖子上的情况下，决定它们属于哪个国家，看到巴黎以软弱无力的手，签字同意割让祖国的土地，人们怎能不气得发抖呢？

只有抗敌者才是合法政府。在今天，只有弹夹才是选票。只要外国侵略者没有撤出国土，任何其它选票均属无效。已被敌人占领或即将被敌人占领的省份，一概失去政治能力。它们没有资格决定国家的命运。被包围的城市，只要它继续战斗，它就代表着整个民族，而且比任何人代表得更好。一旦投降，它就撕碎了它的委托书。

假如外省退让，而巴黎进行抵抗，那么巴黎就是法兰西。假如

---

① 勒古罗斯于公元前256年曾任罗马执政，以忠诚著称。据传说，他曾率军远征迦太基，并在一次战斗中被俘。迦太基人派勒古罗斯回罗马商谈缔结和约和交换战俘。勒古罗斯拒绝进入罗马城，并说他的被俘使他“丧失了公民权”。——译者

巴黎垮了，而某一个省在抵御敌人，那么这个省也就成为整个民族。哪里为独立而战斗，共和国就在那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政府就在那里。一个议会，如果同占领着我国国土的入侵者谈判，它在最后一个坚持武装斗争的村镇面前，就始终处于叛逆者的地位。

人们声称，外省正在进行制宪会议的选举。如果这次选举的当选者拥护共和国反抗侵略者的事业，任何人当然不会否认他们的职权，因为他们将保卫构成祖国的两件不可分割的东西——自由和独立。如果他们同敌人合伙分割国土并恢复君主制，那么他们就是叛逆者和卖国贼。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首都。它如果能同普鲁士鬼子斗争到底，它就能赢得光荣和权威的称号。如果它投降敌人，割让国土并使共和国灭亡，它就将声誉扫地，从此垮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论在城市或在乡村，每个人都肩负着责任。对于政府的种种重大叛国行为，如果不加惩罚，人民将自取其祸！惩罚将落到人民自己的头上。不用太久，人民将会灭亡，从而证实这样一句古话："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为什么人民忍受了叛国行为？为什么他们许可了，有时甚至赞成了卖国贼？他们既然把卖国贼送上执政的宝座并维护其地位，他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些事后的怨言只能引起人们的鄙视，而不是同情。人们更容易原谅背誓者，而不能原谅受骗者。看到背誓者们分到了赃物，在被害者的尸骨堆上炫耀他们的胜利时，人们只能对贻祸于子孙后代的笨得出奇的废物感到厌恶。

在我们经历了那些可悲的日子以后，将迎来怎样的明天呢？啊！对于注定要衰亡的腐败堕落的民族来说，它的明天将始终同

昨天差不多，在明天还是虚荣、自满和夸口。人们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自封为英雄。腐朽制度的辩护人将使那些可悲的失败者相信，他们赶上并超过了最伟大的胜利者，他们从此永远是世界的光明。

巴黎一度曾达到了道德荣誉的顶峰。她当时能够在其城下消灭野蛮的德国鬼子，为各国人民争得自由和平等，建立世界共和国。只要稍有一点理智、远见和勇气，胜利本是肯定无疑的。她却甚至没有打算去夺取胜利。她的表现要比那些最鄙视她的人所能想像的还要糟糕。她愚蠢地死在一个耶稣会教士的手里，在场的并参与了谋杀的还有这样一些神父，他们在向自己的教徒讲道时已经多次宣布要消灭当代的巴比仑，现在终于能够让教徒们看到当代巴比仑的陷落，并且使他们像驴子一样，趁人之危，对这个可恶的仇敌踢上一脚了。

瓦　　解

1870年11月15日

巴黎在责备外省。巴黎错了。她应该责备自己。谁当领导，谁就要负责任。享了荣誉，就要接受困难。如果巴黎没有得到帮助，错误也完全在她自己。她同时使自己和外省的精力陷于瘫痪，这样的愚蠢使她加倍地垮台了。

处于最可怕的危机中，巴黎违背了一切常理，选择并维持了一个如果不算是卖国的，至少也是低能的政府。要获得解救，就得积极行动。这个政府却始终消极被动。好容易振作了起来，它又匍匐在地。它先验地认为抗战是抗不了的，它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恳求和屈服。然而，它完全靠了主战的诺言才取得了人民的信任，

它扮演的是两面派和说谎者的角色，它理所应当受到一切的指责。

为了扫除普鲁士入侵者，伟大的首都只需要大炮、枪支和人，这三个条件是容易满足的。人们可以在法国和外国搞到四、五十万支新式枪支，迅速地把三十万别动队和二十五岁至三十岁的复员军人调进巴黎。军港本来可以提供数以千计的海岸重炮，以武装堡垒、炮台和多面堡。私营工业可以负责制造远射程的野战炮，普鲁士人正是靠了这样的野战炮取得了胜利。

在九月二十日巴黎被包围那天以前，巴黎本来可以在城内集中武装精良的八十万军队，其中包括国民自卫军。临时赶装起来的野战炮，在四、五个星期内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这段时间也足以训练炮手并使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如果做到了这一切，巴黎的军队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就能够歼灭德国鬼子。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在这五个星期中，所谓的国防政府，却忙于乞求和平，没有把一枪一炮运进巴黎。它在城市的四周没有掘过一锹土。它仅仅调进十万别动队，但这些别动队并非用于阻止敌人进城，而是用于压制巴黎人的愤慨情绪。我们的野战炮在麦茨和色当已丧失殆尽，政府对此毫不关心，它根本没有考虑要补充战争物资。一切有关战争的事都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显然，新政权根本没有想过要作什么抵抗。而且，它在私下也不加掩饰。

然而，它毕竟要作一点准备抗战的姿态，以欺骗热烈求战的居民。

从此，市政厅开始玩弄了一整套的欺骗手法和狡诈伎俩，这就是它的全部政策。他们以空洞的废话蒙骗公众，以荒唐的口号满足公众的狂热。

其中最漂亮的一手就是编制国民自卫军。在帝国时代，军团的建制被撤销了，因为帝国把国民自卫军的军团看作是一股危险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五十二个每营五百人的营队。在二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五百人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这独立的五十二个单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而没有团结的威力。在八月份最初的失利以后，内阁在舆论的压力下勉强地同意增加几个新的营队。九月四日的政府，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也同样不关心武装居民，不关心唤起居民抗战的勇气。它只想着取得和平。在它看来，巴黎积极的抗战要求只是障碍和危险。

政府发布了一个决定建立六十个每营一千五百人的营队的命令。如果人们的头脑还清醒，对于政府的背信弃义和险恶用心还有一点怀疑，这项命令足以揭穿政府的面目。一个一千五百人的营队，也就是说，一大群行动不便，调动不灵的乌合之众，怎么能去同敌人作战！很明显，政府不想使用国民自卫军。

在部队以三行排列的时候，就算是一个营只有七百五十人，这样排面就长达一百六十六米，要能听到站在排面正中的指挥官的声音，这个距离已经是极限了。自从采取两行排列以来，每营的人数只得缩减三分之一，即缩减到每营五百人，这确实是使部队的排面长度便于调动的合理数字。对于训练不足的新兵，这项缩减更是必不可少的。

特洛胥将军别出心裁地想出搞一千五百人一营，这显然是有用心的，这样的军队，排面长达五百米，简直是一架可笑、荒谬和不实用的机器。而这正是特洛胥的目的。一旦打起仗来，又得回到五百人一营的正规数字，把现有的营队拆散，这才合乎常理。

大家知道由此而发生的种种滑稽可笑的奇遇。这在居民中引起了普遍的愤怒。但是，请大家放心，问题并不太大。这种动员，

像其他的事情一样，无非是一场喜剧，一场欺骗，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引起普遍的厌倦情绪，并以此结束战争。

《祖国在危急中报》早在九月八日就曾经建议恢复军团建制，下设类似一般军队的营、团、旅、师、军各级；这样，每个区都有一个随时能够打仗的军团。此外，国民自卫军要按年龄分类编队，以便根据需要并公平合理地使用公民。

所有这一切都不符合政府的观点，政府所追求的双重目的是无条件求得和平和实行反革命。它把一切作战准备置诸脑后，只顾制造种种混乱，这是迫使法兰西自趋灭亡的可靠手段。

又及：显然，我们已为反动派的无耻阴谋所左右。反动派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求和平，他们制造一连串的谎言，以便使公众丧失耐心，从而把他们拉进泥坑。

政府殷勤地助公众一臂之力，同时每天早晨把昨天的卑鄙龌龊用冷水从手上洗去。政府一无所知。像所有人一样，政府也听到一点风声。但它并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多。

总之，政府已经不再是政府。它没有任何意见、观点和计划。特洛胥计划就是没有任何计划和跟着保皇派和普鲁士人随波逐流。是时候了，不要再对苦难的人民幸灾乐祸，不要再嘲弄人民的悲伤，请告诉人民，你们究竟要把人民引向何处。

一篇情文并茂的杰作

1870年11月16日

今天上午，我们在特洛胥宣言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现在，人所共知，普鲁士已经接受了国防政府对于各中立国

建议的停战所提出的条件，由于发生了十月三十一日的不幸事件，使光荣和体面的局面横遭破坏，从而使普鲁士的政策又恢复了希望和要求。”

读了他的奇文，人们不能不认为，特洛胥先生是个白痴。过去人们以为特洛胥是个卖国贼。如果说他现在仍然是个卖国贼，那么这决不是由于他不择手段，而是由于他低能愚蠢。对于他两个半月以来所干下的堆积如山的蠢事，这就不足为怪了。在宣言中写出这种货色的人，对他能抱什么希望呢？

法兰西难道还能继续听命于这样一个笨蛋吗？我们被一个十足的蠢货所领导，他直接把我们引向深渊。现在该是决定何去何从的时候了。不过，说实在的，假如特洛胥先生绞尽脑汁想出的这类蠢话不致引起令人可怕的后果，那倒会成为很好的笑柄。他在低劣的谎言中间夹着一件真事，然后把真事加以歪曲，以污蔑别人。

说普鲁士在十月三十一日前已经根据临时政府的条件接受了停战，这是假的。临时政府自己就说过与此相反的话。据它说，十月三十一日才刚刚得知关于停战的建议。停战的条件根本没有讨论过。普鲁士是在十一月五日或六日拒绝停战的。假如普鲁士在十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同意了停战，它怎么能够在一个星期以后改变立场，而不引起天下大哗呢？事实是，谁都没有吭过一声。

十月三十一日的不幸事件，正如蠢人特洛胥所说，**使普鲁士的政策恢复了希望和要求**，这是千真万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自己也曾经说过，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怪人也来重复我们的结论。

确实，由于革命的失败和懦夫、卖国贼一伙的胜利，普鲁士人更加盛气凌人，要价也更高了。他们从来只害怕共和党人。由于共和党人的地位日益提高，由于人民的态度，普鲁士人一度暗自担

心，嘱咐自己要谨慎。

普鲁士难道能够相信，巴黎的抗战竟是费里埃尔的那些求和者所干的吗？这些吓得发抖的蠢货认定抗战毫无用处，因而没有作过一点抗战的准备。普鲁士人被意想不到的力量阻挡在巴黎城下，难道他们能够把这归功于这些寡廉鲜耻的胆小鬼吗？普鲁士人明白，这些胆小鬼的懦怯本性是不会受到巴黎的刚强表现所感化的。普鲁士人明白，这些胆小鬼即使在费里埃尔受了侮辱，即使发过誓要英勇抗战，还是没有能够甘心接受抗战的前景，也明白他们在巴黎城内扮演着一出冒充好汉的可憎喜剧，而在欧洲各皇宫的门口充当他们天生的乞丐角色。

但是，如果说这些人只能引起俾斯麦的鄙视，而人民却使俾斯麦十分恐慌。俾斯麦并非不知道首都的内部局势，并非不知道共和党和保皇党的对立、共和党和群众的同盟、保皇党和贵族的同盟。他了解各个党派的力量和各自的倾向。在一方面是爱国、勇敢、忠诚、决心战争，而在另一方面则是自私、胆怯、怀疑、淫邪、下流，以及其它种种可耻的情感。

保皇主义者需要结束同普鲁士人的不愉快的战争，从而推翻共和制度，因此他们是普鲁士的人，而所谓的国防政府则是他们的领头人。俾斯麦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要求政府投降，不惜一切代价去求得和平。政府料到，在这伙懦夫和主张民族独立的人们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德国军队的命运取决于这场冲突的结果。

德国军队在十月三十一日夜晚获得了胜利。它的胜利，正如特洛胥天真地所说的那样，使它恢复了希望和要求。那些在费里

埃尔哭哭啼啼求和的人，那些在皇帝和国王的客厅里下跪乞求的人现在是巴黎的主人。他们把共和主义者投进监狱。反革命肆无忌惮地解除人民的武装，大声要求和平。俾斯麦回答说："这没有关系，只要你们愿意，马上就干。你们知道我要的价钱。——啊，不过，稍为贵了一点。——很抱歉，先生们，这是我的最后要价，接受不接受由你们。"

于是，特洛胥就抱怨起来，并把他的一股怨气化作污蔑。法夫尔已经说过"普鲁士的帮凶们在有利于普鲁士谈判者的时候发动了早已约定的暴乱，可是，这场暴动使巴黎人民以庄严的选票赋予国防政府合法地位，从此，国防政府在欧洲的眼中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好吧！万事大吉了。暴乱受到了惩办。帮凶已关入牢笼。不过，把人关押起来，破坏了军事法规，这件事干得不很漂亮；可是，对这些高贵的人来说，多一件或少一件丑事，那算不了什么。他们已经战胜了暴乱者。剩下的只是战胜德国人了。既然暴乱者这个大障碍已经除掉，那么战胜德国人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普鲁士现在在巴黎已经没有帮凶了，即使有，力量也很薄弱。那么，十月三十一日的不幸事件怎么能够使它恢复希望和要求呢？这真叫人莫名其妙。普鲁士人在国防政府面前应该像绵羊那样温和，因为这个政府，在欧洲的眼中，刚刚在十一月三日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法律的认可，真好！俾斯麦应该为之动心而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为什么他反而变得更加高傲和蛮横了呢？难道是他对革命者的尊敬偶然地超过了对秩序卫道士们的尊敬吗？更尊敬革命者，也就是说，更害怕革命者！说真的，任何人都对此不会怀疑，而两

个月以来，法兰西所遭受的最惨痛的失败，就是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三日事件。

因为，法兰西在这两次失败中被击中了心脏。

而其他各次失败，只是触及了皮肉。

特洛胥宣言

1870年11月18日

正如市政厅的律师们一样，特洛胥也认为巴黎的抗战根本不能胜利！既然他认为抗战不可能胜利，他又为什么要把领导抗战的大权抓在手里呢？我们怎能想像天下竟有这样的人，他们所以自称国防政府，却是因为他们决心要使一切国防陷于瘫痪，或者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决心用讨饶乞怜来代替抵抗敌人？

有谁强迫他们去负责抗战这件在他们看来是荒唐的事情呢？他们感到和公众的感情格格不入，于是他们就施展狡猾的伎俩，僭取了掌握政权的权利，然后又用谎言和暴力来维持他们的权利。这个如此无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独裁政权，人民居然接受和容忍了它，这说明人民已经堕落到了何等的地步！

波拿巴部下的一位将军，向波拿巴宣誓效忠的几名官吏，凭着他们在帝国时代任过的官职，就骑在共和国的头上作威作福，自封为君权神授的王子，谁敢反对他们就犯了欺君之罪。

他们既然是天神授权的统治者，自然也就以压制人民的愿望为他们的合法使命了。只要人民的愿望不合他们的意，他们就要压制；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使这种愿望落空。

特洛胥先生的贯彻始终的秘密计划从此公开了。这就是用抗战的假象愚弄巴黎，并通过一连串的欺骗，直到饥饿迫使巴黎举手

投降为止。

为了使这项计划不为大家察觉，特洛胥已经使多少人流血牺牲？损失惨重的出击，每天进行的数以千计的无目的无结果的战斗，这一切无非都是为了争取时间和维持幻想。

无数房屋变成一片废墟，无数财富化为一片灰烬，桥梁中断，隧道塌毁，村镇夷为平地，大规模的烧杀抢掠，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掩盖早已签字的无条件投降的战争面具！

既然早已下了决心，为什么不马上说出真话？多少不幸将因此而避免！事情当然如此，可是人民决不会答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得下台。与其放过吃到嘴里的肥肉，不如听任流血和破坏！

即使在历史上，也必须回溯到很久以前，才能找到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责的事例。

但是，难道能追究强权者们的罪责吗？——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手中有权力。他们的最大罪恶不仅算不了错误，甚至连过失也不是。假如他们不犯罪，他们将受人鄙视。他们的罪恶越大，群众越尊敬他们。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苏拉①。

为了保持他的独裁政权，特洛胥将军果断地开始了他的常败将军的生涯。他勇往直前地去迎接他明知要失败的战斗。虽然他深信必败无疑，但却丝毫不想避免失败，不想作任何准备，以求得胜利的一线希望。命该如此，作准备又有什么用处！

爱国者们激于亡国之痛，力图结束这些野蛮的殉葬，力图以战斗代替无谓的牺牲，而独裁者们却对他们以叛逆罪论处，加以监禁；接着群众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指责，对出卖炮灰的投机者却阿谀

---

① 苏拉（公元前138—78年），罗马时代的将军和政治家，以独裁闻名于世。——译者

奉承。

特洛胥先生在受骗群众的欢呼声中，更加坚定地推行他的以饥饿和流血换得和平的计划，他半露真面，终于图穷而匕首见了。他直截了当地对成群的战士们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像开肉铺那样把你们零块出售。现在，我要把你们统统带到屠宰场去。"

特洛胥急于要打上一仗，好早点收场，少挨饿几个星期。交易所的大亨们对他的善良行动感恩戴德。反正他们从来只赴宴席，不上前线。于是，国民自卫军各营接到紧急号召，征集城里劫后余生的青年准备作出牺牲。虔诚的政府装出一副内心十分痛苦的样子，向他们作了最后的叮嘱，临别赠言。

这是托钵僧①的鼓动："弟兄们，你们要受苦和战斗，直到不能受苦和不能战斗为止。"换句话说，就是："弟兄们，你们要去送死。"

从来没有一个军事将领能够作出这样符合基督教义的演说。巴黎人将如何看待这篇悼词呢？这位预言家在要求他们付出生命的同时，给他们以最大的安慰：普鲁士人一旦占领巴黎，将进退两难；他们将因自己的胜利而垮台。这个苦差使，俾斯麦会乐于接受的。

特洛胥将军已经显出了原形。他的无能胜过他的野心；为了他的野心，他毫不犹豫、毫不动情、毫不后悔地葬送了一切：巨大的财富，无数人的生命，军队，国民自卫军，巴黎，整个法兰西。这是什么野心？是要当独裁者，然后当共和国总统……即便不是要当

① 主张苦行主义的一种教派。——译者

奥尔良王朝的蒙克①。

决不要议会

1870年11月19日

国民议会于一七八九年开始风行。

就时间而言，这是了不起的一年，然而风行一时的国民议会却很平庸。

即使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时髦也并不怎样成功。三级会议在七月十四日以前还能镇定自若。巴士底狱的陷落使它突然感到害怕。利己主义的资产者惊慌地看到，人民走上了舞台；从那时起，他们打着种种卑鄙的小算盘，这就是法兰西八十年来一切议会的始终不变的场景。

制宪议会经过两年时间的既反对宫廷又反对群众的双重斗争以后，在退位的时候，它已经只是一个反革命的工具了。

立法议会所经历的遭遇也是如此。它开始的时候生气勃勃，结束的时候萎靡不振；拯救了国家的八月十日事件②，正是违背了立法议会的意见，甚至可以说是针对立法议会而发生的。

声名赫赫的国民公会同它的两位大姐很少差别。它不能指导和控制局势的发展，而是受局势的支配。在五月三十一日人民起

---

① 蒙克（1608—1670年），英国将军，王党分子，1660年2月率领军队进入伦敦，并于5月宣布查理二世为国王，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复辟时期。——译注

② 1792年7月，面对国王路易十六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猖狂反革命活动，巴黎各区向立法议会呈递了请愿书，要求废黜路易十六。可是，立法议会置之不理。于是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公社便号召人民举行起义。1792年8月10日，巴黎发生了人民起义，攻占了土伊勒里宫，并迫使立法议会废黜了路易十六，解散了议会，宣布按照普选原则进行国民公会的选举。——译者

义① 的压迫下，国民公会中的资产者多数派在十四个月里只是一群听任宰杀的静默而战栗的绵羊。通过热月政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反动派血腥屠杀的中坚。受压迫也好，自由了也好，他们始终不过是一伙碌碌无能的庸人，才能之辈简直寥寥可数。

元老院和五百人院是什么东西？他们是雾月十八日政变的同谋人或受骗者，是一伙愚昧无知的乌合之众或志大才疏的野心家。而第一帝国时代的默不作声的立法团或参议院，无非是一堆臭气熏天的垃圾。

十九世纪展现在历史眼前的一连串议会，都只是拜倒在强权者脚下的贪得无厌、卑鄙下流和奴性十足的庸人们的麇集之地。

他们间或有人同当局发生认真的冲突，但在对抗过程中，很快就暴露出在壮烈的外表下掩盖着的平庸。直到七月二十八日前夕始终是如此慷慨激昂的二百二十一人院，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陷于可笑而又无聊的恐慌之中。他们被胜利吓破了胆，昏倒在地，如同冲刺过猛的骑士，必定从马背上摔下来一样。

路易-菲力浦的灰暗的议院是利己主义和腐化的典型，随后的两届遗臭万年的议会应该使我们永远厌恶那议会的瘟疫。法兰西为普选所产生的这些宝贝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二十二年以来，法兰西身受着这些立法者的卑鄙、无耻和罪恶之害，它怎能甘心再次落入他们的魔掌？

难道法兰西还没有足够地了解到，在危急的时刻，最糟糕的危险就是召开议会？如同一八四八年那样，反动派正向这些罪恶的

① 这里指的是巴黎人民在愤激派的提议下，举行了反对吉伦特派的人民起义。——译者

帮凶们呼救，难道法兰西至今还认识不清吗？反动派要他们帮忙，仍然是要扼杀共和国，不过这一次还要加上祖国的肢解和毁灭。

所有搞阴谋的报纸全都翻来复去地说："必须征询法兰西的意见，必须让法兰西通过它的代表之口表达自己的意志。在法兰西没有以专门的委托书赋予他使命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代替法兰西，无权以法兰西的名义发言或行事。只有实行普选才能拯救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这就是他们在一八四八年所使用的口号。正当国家处于动乱之中，他们求助于国民代表这个法宝，似乎有了这个法宝，就能魔术般地平定一切动乱。秩序、和平、劳动、繁荣将根据法宝的命令重新出现。而其结果，大家都知道，那是内战、屠杀、流放、二十年的耻辱和奴役、普鲁士的入侵和法兰西濒于亡国的边缘。

而人们却偏要用选举的办法来挽救法兰西的灭亡！选举相反只会加快灭亡。要使法兰西亡国，再没有比选举更可靠的办法了。假如法兰西现在落入议会的手掌，她肯定要灭亡。只要不落入议会的手掌，她就能够幸免于一切灾难。

归根结底，议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汇集了那些品德高尚、才能卓著、忠心耿耿、足智多谋的人物，汇集了人类的精华和国家的栋梁吗？可惜，我能作证，在将近一百年里，有十五至二十名议员，他们使国家感到厌倦和失望，或使国家走上了歧路；他们是一伙无所作为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中间有几个巧于辞令或者会玩些蹩脚花招的人，很快就成为羊群的头羊和所有人的主人。一朝大权在握，为了保持他们的这种权力，他们必须做的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这一权力来满足他们主子的贪欲和虚荣。

所有这些自封的国民代表只关心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友。假

如一名议员的委托书不能成为他自己以及其全体亲友的前程的基础，那这位议员就是相当笨拙的了。在平时，这类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人民还能忍受，还能活下去。

但是，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当祖国的根基发生动摇的时候，所有这些低能儿的利己主义都成了祸害。那时候，他们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害怕，其次是考虑利害的得失。逃脱灭顶之灾，同时尽可能地捞回被大水冲走的财物，这就是他们在急风暴雨中所干的唯一事情。我说的并不是指混杂在这帮利己主义者中间的少数几个高尚人物，但他们只好无能为力地观看这场令人作呕的表演。

这样的描绘是对他们的污蔑吗？大家可以回顾七十五年以来的往事，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七〇年的参议院和立法团的历史，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众议院的历史，第二共和国期间的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历史。这每一页和每一行的历史，难道不都是写着无耻的巧取豪夺，懦怯，背叛，出卖吗？

召集国民议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保皇派说："是为了解脱政府所负的惊人的责任，为了建立唯一有能力重建法兰西并且唯一可能被大家接受的政权。"

俾斯麦说的也是同样的话。

《泰晤士报》说："俾斯麦先生强烈地希望法国建立一个合法的政府。也许他已经说服国王暂且不谈割让土地，以便使国民议会得以召集。"

俾斯麦先生在给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柏恩斯托夫伯爵的一封电报中说："今天的当务之急是要让法国人民举行选举，以便任命一个全国性的代议机构。

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这就是法兰西的这位好朋友的固定不

变的想法！只要在他心爱的国家里还没有成立起合法的政府，他总感到心神不宁。早在九月底，他已经为我们呼吁要办这件好事，市政厅急忙表示赞成这个无私的愿望，决定在十月十六日召集“国民大会”。可是普鲁士宰相反对把期限拖得太长，于是顺从的我国政府人士们为他提倡议会的热情所感动，决定把日期提前到十月二日。

幸而，无政府主义者从中作梗，而国防政府又不敢同他们硬顶。我们总算避开了陷阱。但是，威廉咬住不放。他非要搞一个国民议会不可。这正中形形色色的保皇分子以及大小反动分子的下怀！交易所是极端的普鲁士派，而各省议会则与俾斯麦一唱一和。

人们的意见尽管不同，还是可以开诚布公。但是，既然法兰西的最危险的敌人，几十年来梦寐以求地要灭亡法兰西的那个人，对于这么一个重大的措施表现了那么大的热情，那么就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这项措施对我们是致命的，只有卖国贼才会支持它。这是检验卖国贼的何等可靠的试金石！

至于市政厅，如果他们以为只要迟早发一个普选的号召就可以解脱责任，那才是咄咄怪事。不，办不到！那些除了愚蠢以外没有任何人格的野心家们，他们在人民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夺取了领导权，并把人民推进无底深渊，只要人民还在往下滚，就不能容许他们向人民这样叫喊：“你还没有死，你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吧，可别指望我们了。我们辞职了。”

这些可怜的人就这样被抛弃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有什么可依靠呢？政府对他们说：“你们现在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你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命运。选择你们的代表吧，他们将根

据你们的希望作出决定。"

人民在烧杀抢掠的威胁下吓得六神无主，他们要求和平，无条件的和平，以抢救他们的田地、房屋和子女的生命。即使法兰西为此需要割让两三个省和赔款四、五十亿法郎作为代价，那也活该。不能要求这些可怜的人为法兰西国家的完整牺牲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考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何况，老板们、贵族老爷们、官吏们和僧侣们并没有为他们作出忠诚和自我牺牲的榜样，因此他们不这样做也不会感到痛切的内疚。相反，他们觉得，一切从利己主义出发，他们正好跟上了他们的上司的脚步；出于谦虚，他们不好意思去教训那些总是教训他们的人。

总之，无论在外省或在巴黎，都决不能通过召开议会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和重建法兰西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并没有遭到破坏，甚至没有受到损害。大家知道，保皇派所说的恢复团结，意思是说：干脆恢复君主制，据说君主制是团结的最完美的中心。

在当前危急关头召开的议会，将是普选制有史以来最糟的产品。不为法兰西而战的人没有权利决定法兰西的命运，只有手持武器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只要还有一百名士兵能够作战，就决不能把和平问题提付表决。

巴黎正举行着有五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他们用大炮和子弹发言。让外省也召集这一类虽然不能达到同等规模但却具有同等性质的大会吧。至于这些为数众多的国民代表的领导人，那将由最果断、最坚定和最勇敢的人来担任，他们较少官僚习气，决不会比原来的领导差。

无论如何，这样的领导决不会比巴黎现领导更坏，虽然巴黎至今没有因现领导而灭亡。

在目前的法兰西，只有在兵营里才有公民权。在别的地方，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

1870年11月20日

共和国一生下来就掌握在敌人的手中；但是敌人没有能够在共和国呱呱落地的时候把它闷死，因而不能说它生下来就断了气。

然而，共和国始终是它的敌人的囚犯，它将遭到爱德华①的孩子们的命运。敌人奸诈地对它崇敬备至，同时却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将它掐死。

共和国怎样才能摆脱那些为了得到它的遗产而谋害它的生命的野心家们呢？野心家们拥抱它，为的是扼杀它。如同在一八四八年一样，共和国的这些保护人急于要把共和国的忠实朋友们全部放逐，使共和国失去一切支持；一旦时机来到，以国民议会命名的集体刽子手，将负责把它处死。

保皇分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向这个行刑的工具发出召唤，并且对于狱卒们迟迟不把犯人交出执行表示愤慨。他们指责狱卒们把根本上属于临时性质的一种职务和一点利益永久化了，他们的抱怨声近乎威胁的口吻。

实行普选制的理想在未来将是美好的，而在现在却是致命的；二十二年以前，共和党人由于过早地推行这个理想，曾经付出了重

① 这里指的是英国国王爱德华第四（1442—1483年），他死后，继位的爱德华第五才十二岁。后来，爱德华第四的兄弟理查五世把他的侄子统统杀掉，登上王位。——译者

大的代价，而今天所要付的代价，恐怕更要高得多。对一国的人民来说，它的现在是它过去所受的教育的产物，而拖欠的旧债只能用流通着的货币来偿还。

人民受到荒唐的教育，它就只能做出荒唐的事；对它提出别的要求，那就等于要毒果树上结桃子。我们所犯的错误，可以用另一个错误作辩护，虽然其严重性也许不如原来的那么大，但它毕竟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的目光短浅，眼界狭窄。

普选产生于大城市，而大城市的眼界超不出城门以外，它们以为整个法兰西都是它们这个样子。这个错误的看法产生了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二年和一八七〇年四次公民投票。愚昧无知的农民四次都拥戴了波拿巴，而在波拿巴以前，农民们就曾经把丝毫也不比波拿巴更好的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扶上了宝座。

一国人民的政治表现，总是它被灌输的思想的反映，二十年的专制、奴役和有计划的愚民统治在人们的头脑中播下了种子，投票箱结出的只能是种子的果实，这一切难道还不清楚吗？

民主派的愚蠢导致了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两次选举的结果①。民主派想在遍撒君主制种子的土地上收获共和国，而收获到的却只是可供他们任意挑选的三个品种的旧作物，这使他们惊得目瞪口呆。

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要让麦子得以生长，首先必须犁耙三、四遍，烧荒还不算在内；否则，就是白白浪费种子。

农民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决不会干共和党人的蠢事。你们要

① 指1848年12月的总统选举和1849年5月的立法议会选举。——译者

以农民为榜样，要把清除杂草的办法应用于他们的头脑。在没有把杂草基本除净以前，尤其不要冒险地使用优良的种子。

二月革命后，本应先花几年时间进行思想方面的准备工作，为实行普选打好基础。要征服一个民族，应该从思想着手，而决不应该依赖武力。不仅如此，还必须使思想得到传播，而保皇党却恰恰根本不允许共和主义思想传播。

由于民主派铸成大错，保皇党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五一年获得了全胜；保皇党立即又把敌人的嘴巴封住，这种状况维持了二十二年，使民主派不能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所以群众批准了一八七〇年五月的公民投票，并且假如明天举行另一次公民投票，群众还会批准，而这次公民投票将使普鲁士国王把我们以及我们的群众的嘴巴封住四十年左右。

反动派渴望着这件好事得以成功，其心情比在沙漠中的希伯莱人祈求吗哪①更加迫切。他们大肆鼓吹公民投票，这毫不足怪。而值得惊讶的是，反动派在实现这件好事的时候，将会在共和党人中间找到许多不自觉的同伙。

在我们中间，普选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即使把这个原则掩盖五分钟，那也将是大逆不道。这种顾虑所造成的结果很明显：如果普选稍为推迟一些时候举行，那么一个新世界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可是由于当时立即实行了普选，我们几乎亡了国；如果我们明天再干同样荒唐的事，我们就会彻底亡国。

可是，大批的民主分子将毫不犹豫地主张选举！我说的并不

---

① 据《圣经》记载，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时，在旷野绝粮，获得神赐的食物，称作吗哪。——译者

是那些梦想获得立法议会议席的人，这样的梦想既不实际，且有危险，却有许多人为此头脑发热。我说的是城市的工人，他们把选票当作公民的私有财产，当作他们获得解放和改良的保证。

在他们看来，暂停选举有损于他们的公民资格，这是回到奴隶制去。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农民仍然处于迷信和专制的奴役下，农民的大量选票将把他们的选票淹没。他们并不因此灰心泄气。他们说："明天我们一定会成功"。而明天，他们所得到的依旧是失败，因为教会和保皇党人在昨天所作的宣传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

如果不首先把洞口扒平，减少坡度，他们永远也不能从洞底下上来。革命也要作这样的准备工作，但是这项准备工作恰恰有碍于在共和国胜利后立即选举议会，因为这样选出的议会只能是已被推翻的制度的翻版和复辟。这样的教训已经有过两三次了，那怕再重复三十次，四十次，得到的结果还会同原来的完全一样。

请看旧时代的卫道士们是如何狂热地要求立即召开这些不祥的"国民大会"，他们事先就已知道这种"国民大会"所要作出的决定。他们每天都为议会迟迟不能召开而猖猖狂吠。在一八四八年，每当出现延期召开的可能性，他们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

今天，俾斯麦和他们结成一伙。他也要立即、马上、在明天就召开一个国民议会！……一个国民议会！妙极了！同竭力使防务瘫痪的国防政府一样。——今天，所有以"民族"的名义所作的号召，其目的都是要破坏民族。

1870年11月22日

保皇派的报刊继续拚命地推行其关于召开国民议会的计划。这是它们份内的事。因为，要推翻共和国，没有比召开国民议会更可靠的办法了。可是，它们推行这个方案劲头虽大，理由并不充

分。

它们的理由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诉诸全国"。不对！这不是诉诸全国，而是诉诸利己主义、恐惧心理、失败主义，以及人类的一切卑鄙感情。当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刻，利用大家惶惑不安的心情，强行通过一项使民族遭致灭亡和蒙受屈辱的决定，这是可恶的，有罪的。

只有敌人才能有这样的打算，而这种打算也确实只有民族的敌人才能想得出来。他们要使法兰西永远愚昧和不幸。他们要用铁链把法兰西重新捆住，重新把它置于贵族和迷信的枷锁之下。

以忠于法兰西的名义，我们要求选举在和平和安静的环境中举行，而不是在外敌入侵、国家处于混乱和失望的情况下举行。正当敌寇在全国各地到处杀人放火的时候，难道陷于恐慌之中的公民能够在刀山火海中作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吗？

惯于搞阴谋的保皇派报纸说，它们不愿意把选举延迟到更成熟的时候举行，正如它们在波拿巴统治时期不愿意接受限制自由，以及停止党派活动。这些反动报纸是自由的死敌，它们居然谈起自由来了，胆子真是不小。它们现在要求召开国民议会，正是为了破坏国民议会，正如他们在一八四八年曾经通过制宪议会之手破坏了国民议会一样，它们召开制宪议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国民议会。

它们采用的手法是千篇一律的。只要重读一下一八四八年三月和四月期间的保皇派报刊就够了。除了很少几篇关于普鲁士的文章以外，这些报刊和今天一模一样。至于新的制宪议会究竟将派什么用场，一八四八年八月十一日关于恢复报刊保证金制度的法律可以告诉我们报刊的命运是什么，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关于秘密团体的法律可以告诉我们，人身自由、结社自由或集会自

由的命运将是什么。

反动派迫不及待地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这在今天比在一八四八年更是一件极大的丑事。因为这件事今天由于有俾斯麦在插手而复杂化了。一方要的是帝制，另一方要的是割地。协议在事先已经达成了。“你答应割地，我给你王位。——你给我王位，我让你割地。”

两个骗子手都将得到一份赃物，而吃亏的将是法兰西。法兰西将因此失去自由和独立。共和党人决心使法兰西既保住自由又保住独立。所以他们要检举国民议会，认为它没有资格决定民族的命运。

他们事先宣布，国民议会的一切决定均告无效，只要还有一个敌人的士兵留在我们的国土上，任何人没有权利缔结和约。

必须彻底破除议会的威望。它的害人的威望是一七八九年前二百年极权统治的产物。三级会议使人看到某种起色。从此，三级会议的光荣就代代传给历届议会，将近一百年来的种种失望并没有足以使我们醒悟过来。

三级会议只是事情的结果，而不是事情的起因。它公开宣布了业已深入人心的结论。在宣布了这个结论以后，三级会议就被淘汰了，变成了阻力。法兰西曾经用以反对国王的工具，却变成了国王用以反对法兰西的工具。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特洛胥和立法议员们是倒戈反对皇帝的王朝工具，他们使我们吃够了苦头，他们直到今天仍然骑在我们头上。——（请一七八九年千万原谅我作这个比喻）——每一种工具都有它的用途，如果该换工具而不换，只使用一种工具，那只能

把活干糟。对于一个想用一把锯子干一切活的木匠，我们能说什么呢？

让我们从这个新的教训中吸取教益，不要再落进议会的陷阱。我们刚刚把压断的双腿从陷阱拔出。难道我们对公民投票还不感到厌倦吗？最近的一次公民投票是十五天以前的事。这次与外省无关。人们也不能埋怨农民。这是巴黎自己的异想天开。

多妙的杰作！

小　偷

1870年11月21日

巴黎即将陷落。资产阶级只求出让巴黎，人民也不愿意再保卫它了。几小时的回光反照，似乎使巴黎见到一线希望，现在又全部烟消云散了。绝望的黑夜笼罩着巴黎，巴黎重新回到了听天由命的状态。

社会是穷人的后娘，它总是把穷人当作罪犯而置于法外，只承认有钱人才是公民。社会始终是那么伪善和凶残，在它的监狱的门上，过去写着慈悲，今天写着自由、平等、博爱。

敌人在社会的城下安营扎寨，社会毫不介意。它懂得敌人对它并不是危险，而是救星，是更能制服穷光蛋的宪兵。

穷人们也完全懂得了这一点，他们流露出来的神情似乎在说：“同样坐监狱，换个狱卒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小偷们为了多赚一分钱，把他们捞来的东西卖给普鲁士人。如果是六个星期以前，他们会感到气愤。但是，六个星期以来，发生了多少使他们看破真情、伤心失望的事情啊！

热情如同在岩石上碰得粉碎的浪潮一样正在消逝。人民又一

次了解到，祖国是富人的私产，不过，这只是富人为了不到三十文钱的好处就随时准备出让的一种财产。富人并不为祖国担心。

富人对临街的山墙、饭厅的一把椅子、以至菜园里的一棵蔬菜的关心远甚于对祖国的关心。侵略者抢劫、掠夺、焚烧，他们认为这是战争的权利，并不生气。

可是，只要那些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无家可归、衣不蔽体的可怜的饥民们从炮火中抢回一件被遗弃的家具，在枪骑兵的子弹下捡回几个萝卜，社会就会对于这种破坏私有制的行为狂怒不已，并向犯罪分子兴师问罪。

伟大的秩序卫道士们，你们为什么自己不去收庄稼！为什么主人们把他们的家具、青菜和胡萝卜扔在那里？他们感到害怕，尽管有割爱之痛，但他们宁要性命而不要他们的土豆了。你们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那些衣衫褴褛的穷人们竟敢冒着生命危险去捡这些扔掉的东西，以缓和空腹之饥和遮盖裸露的肌肤，你们却感到十分憎恶。

既然主人不管，谁又阻止当局去搬走空房里的家具和收取留在地里的庄稼呢？当局难道没有车辆、马匹和人力吗？——我明白了，那是要冒被子弹打中的危险的，为几棵蔬菜不值得去送命。

那么，为什么又气势汹汹地对那些不幸的人们兴师问罪呢？他们豁出性命去干这种事，至少可以为你们节省一点食物。他们清醒地看到，慈善事业不过是一种虚伪，平等只是空有其名。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你们大作文章反对马尔萨斯主义者，而配给的粮食却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日益昂贵。

这还不算什么。在四面被围的孤城处于粮食不足、面临饥荒的情况下，你们的所有权主义（propriétarisme）却竭力保护那些注定要丢失的财物，这是属于你的，那是属于我的，不准别人触动，而这些财物本来可以救好些人的命，丝毫也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你们宁可让人饿死，也不准碰一下私有财产。

这些贱民们，为了回敬你们的杀人叫嚣，也发出了凶猛的吼声。当妇女、儿童和老人熬过了又累又冷的一天，背着他们捡到的木柴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巴黎城门口被命令放下他们捡来的东西；这些木柴是他们从普鲁士人的枪弹下捡来的，为此还死了好几个人，他们被这种命令惊呆了，绝望了，他们放一把火点着了这些木柴，叫道："好吧，谁也甭想要！"

在这些燃烧着的火堆周围，他们开始跳起惨不忍睹的舞蹈，同时咒骂着那些抢夺穷人劳动果实的人。

"谁也别想要！"这是给这个社会的一记响亮的耳光，穷人们对这个社会看透了。"谁也别想要"的意思是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和不顾劳累捡回这点东西，而禁令的发布人和执行人却以虚伪和骗人的正义的名义，要把它夺走。你们自己就是盗贼！"

没有心肝的社会，让不幸降临于你，你绞杀了人民心中的忠诚，你在人民心里播下了复仇的种子！你终于使"**谁也别想要**"这句同归于尽的口号代替了博爱的口号！

我们中间怎么会有人，出于对祖国的蔑视，或者出于对祖国的仇恨，去把我们家园的安全出卖给普鲁士人？除了波拿巴、比埃特里、鲁埃、巴赞，以及成千上万在巴黎昂首阔步为威廉策划阴谋的其他人以外，又是谁给他们作出了这种榜样呢？

不顾人民的疾苦，不惜以野蛮的战争来对付这些小偷，这是何等的神经错乱？只要给这些小偷们一点食物，他们就不会冒着普鲁士人的炮火到地里去捡吃的东西了。这些妇女和孩子们所以在死亡的面前无动于衷，肯定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太深重了。

每天都有大批的人拥向市郊的杀人场地，从普鲁士人的炮口之下，捡几片菜帮、菜叶，这是巴黎被围期间的最悲惨的一段插曲。任何其它阶段都没有如此深重的物质贫困和如此巨大的精神痛苦。真正为祖国服丧的是这些贱民。

正当他们光脚赤身地在泥泞的平原上流浪，被野蛮人当作狩猎的目标的时候，社会的主人们正在歌剧院的坐席上为他们在围困期间所受的苦难而稍事歇息。可怜的受害者，他们已经有六个星期听不到音乐了！没有音乐会，没有乐队的演奏，没有女歌手的歌唱，没有高音歌手的歌唱，没有全家一起散步的机会，也没有在包厢里窃窃私语和谈天闲扯的机会！

啊，上帝！谁有那么多的眼泪能够诉说尽这种痛苦呀！而在这些痛苦之余，混账的小偷们居然还要侵犯私有财产！

幸而，这个可爱的社会不必害怕巴尔塔扎尔[①]的筵宴。尼尼微[②]被围困了，但围城的士兵并不威胁宴席。相反，他们以保护者和朋友的身份来坐上宴席。

敌人已经在十月三十一日失败了。

---

① 巴尔塔扎尔是巴比仑的最后一个国王。据传说，有一个晚上，巴尔塔扎尔举行盛大庆宴，动用了耶路撒冷神庙中的祭器，因而受到上帝的惩罚，当晚就被篡位者所杀害。——译者

② 尼尼微是古代亚述帝国的首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公元前612年被米堤亚和迦勒底联军所毁。——译者

政　　变

1870年11月23日

围城日紧。饥荒逼近。结局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很快就可以看到全貌了。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此感到高兴，那些为这个结局作好准备的人已经不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而是半公开地进行活动，但他们却是谨慎的人。十月三十一日事件使他们获得了力量，他们以波拿巴和巴赞为榜样。

由此可见，一场政变即将发生。谎言和欺骗再也不能麻痹人了。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人们睁开了眼睛，并且确信无疑了。人们看到灾难在逼近，或许一次最后的挣扎还能够把灾难以及卖国贼们一扫而光。

现在是采取非常手段的时候了。今天早晨，大家见到了其中的第一项措施："禁止张贴一切政治标语。"而这不过是开场白，禁令的第一条。禁令的第二条将不会长久地停留在口头的威胁上。请听：

"根据戒严法的规定，军事首脑有责任查禁一切对军队和公民产生恶劣影响的出版物……"

每个人都应该懂得，象特洛胥先生那样的伟大军事首脑不会凭空考虑的……而且他并不是那种只是没完没了地考虑的人。

考虑到……他可以随意地拿它的刀柄塞住他所不喜欢的人的嘴巴，考虑够了以后，他就要采取行动。禁止张贴的命令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禁止印刷的命令。

此外，由于说话的权利同写作的权利一样有害，集会自由将同出版自由一样被送进坟墓。这样一来，伟大的特洛胥将成为一个完人。到处都将是一片颂扬之声，到处都将是奉献给他的桂冠。

在饥饿的帮助下，一切条件即将成熟。到那时，我们将会看到色当、麦茨、巴黎三幕剧的第三幕，这三幕剧分别由三位无与伦比的杰出演员波拿巴、巴赞和特洛胥向欧洲演出，其结局是普鲁士国王得益，法兰西民族受害。

首都将大开城门。德国皇帝威廉国王陛下，弗里茨和弗里德利希-卡尔亲王殿下，俾斯麦伯爵先生阁下和莫特克伯爵先生阁下将光荣地进入善良的巴黎城。陪同他们的有未来的法兰西元帅、复辟了王位和神权、灭绝了巴黎人种的赫赫有名的特洛胥将军。

我看，特洛胥在这场值得纪念的战役中用所杀掉的巴黎人的脑袋换来的报酬，将比捕鼠人在阿尼埃尔的阴沟里杀死同样数量的耗子所得到的报酬还要高些。普鲁士国王陛下和其他信奉基督的国王陛下们决不会对君主制和宗教的这位救星吝于施舍。否则，岂不是忘恩负义，因为正是这位救星把君主制和宗教从远方请了回来。

这里且不谈临时政府中的配角们。他们将同一八四八年那时一样，也得到一份奖赏：先在屁股上挨一顿大皮靴，作为牺牲者的光荣印记，然后允许他们向国王陛下宣誓效忠，并在国民议会的议席上第三次获得政治的清白，——假如他们有幸活到一百一十岁，还可以再次登上市政厅的宝座。这是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古话说得好："人以羞耻为生，不以羞耻而死。"凭着他们那一套犹大的本领，他们能够做到永垂不朽。

不久前，色当、麦茨、巴黎悲剧的第三幕演出者，在公布反报刊法令的同时，翻印了一份在凡尔赛出版的普鲁士报纸。他说："这

是政府收到的第一份报纸。"让这个谎言同以往的谎言一样见鬼去吧。我们祝它一路顺风。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独裁者殷勤地把这期报纸全文翻印而感到高兴。据他看来，这期报纸明白地表达了敌人的想法和希望。确实，报纸的话说得比他自己所想像的更明白，下面这一小段不太谨慎的话就是证据：

"柏林驻外省记者报导说，关于向巴黎发起攻击的问题，命令肯定将要下达，但将在最合适的时机下达，这要考虑到各种情况，尤其是要考虑巴黎内部事态发展的情况。"

"肯定？"不见得！正如普鲁士人的亲信所天真地承认的那样，一切都将取决于"巴黎内部事态的发展"。假如巴黎乖乖地让特洛胥带领到既定的地方去，克虏伯大叔就不会发脾气，而是安静地在一旁看着。

但是，假如巴黎人在发觉他们要被牵到集市上去的时候，敢于起来反抗，不听牧羊人的话，而擅自搞乱仪式的程序，那么，克虏伯大叔就要说话了，这样，事情就会办得比耶利哥的羊角声还要快些。

克虏伯大叔在他的岗位上已有三个星期了，一直没有说话。他像牧羊人的狼犬那样，不屑于回答供人取乐的小狗的汪汪吠叫。争取时间，这是主要的。等到食橱空了，小狗们就叫不起来了。事情也可以就此结束，无须克虏伯的粗暴干涉，因为粗暴的干涉会使软心肠的人们感到有点难过。

好吧！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令人肃然起敬的报纸把戏演得妙极了。这些报纸既是好战的又是和平的，一只眼睛露出威胁的神情，另一只眼睛却在微笑。它们每天有一篇文章主张和平，另一篇文章主张战争。这真是使那些容易上当的傻瓜们既气急败坏又

心安理得的最妙的办法了。向各国人民提供喜剧的巴黎，从来没有向欧洲演出过这样一场戏，它一定能够获得悲喜交集的双重效果，这真是艺术的顶峰和无以复加的光荣。

泰晤士报和特洛胥将军

1870年11月24日

大家都知道《泰晤士报》，这是城市里的商人们的喉舌，是英国报刊的楷模。同它的主顾们一样，这份报纸有一副铁石心肠，它把强者奉为上帝，把弱者视作门前的垫脚石。

这份一问世就与法兰西为敌的报纸，自从八月六日以来，因为胜利而得意洋洋。它用金筹码把我们的每一次败绩都记录下来，公开宣扬它的战略，证明我们一切都完了。从维桑堡到色当，它对我们的鄙视随着我们的失败而逐步升级。

九月四日以来，这种鄙视开始带有一点忧虑的色彩。辱骂变成了怜悯。这位傲慢而虚伪的君子很愿意向我们提出友善的建议，并斥责我们的不谨慎。巴黎的被围困使他感到痛心。他大发慈悲之心，责怪我们不该疯狂地固执己见。

德国的胜利不是已成定局了吗？为什么要违背命运的宣判而作渎神的奋斗呢？事已如此，就该心甘情愿地认输。再固执下去，就简直是造反了。巴黎的毫无目的、毫无希望的抵抗是对于秩序和道德的侵犯。被征服者的真正勇气在于忍耐，而我们顽固地抗战，那是懦怯。

但是，《泰晤士报》的说教没有听众。俾斯麦从自己的海关走私，把这份声名狼藉的报纸的最糟糕的文章偷偷地塞给我们。保皇党的报刊大登特登这类临终劝善和让我们死而瞑目的散文；这

一切都是徒劳的。人们耻笑俾斯麦，鄙视他的同谋者。

有鉴于此，这份惯唱挽歌的报纸改变了腔调，开始大肆吹嘘特洛胥。特洛胥是“法兰西最优秀的一位战士”。他有一个了不起的计划，这个计划十分清楚，十分可靠，所以他决心不告诉任何人。他教训巴黎人说，他们简直是些蠢驴，竟妄想彻底打出巴黎去。这样，他打消了巴黎人的自大狂。

他只允许装模作样的出击，据说这些出击在舍维伊、巴尼厄、夏提荣、吕埃伊等处战果辉煌。他对事情有着十分的把握，甚至可以断定夺取某些阵地是不必要的。《泰晤士报》要谈论布尔歇之战，于是布尔歇之战便成为特洛胥将军的光荣。大家看到，事情全在于怎么报导。

由此可见，赫赫有名的将军成了《泰晤士报》的宠儿。这是不祥的预兆！我国军队的这位掘墓人，这只啄着法国人尸体的乌鸦，来到独裁者的战车中筑巢。它把巴黎陷落的希望不再寄托于俾斯麦和莫特克，而是寄托于我们的老爷兼主人。

这位老爷兼主人，像神明一样，有他自己的一套秘密方案，他对任何人也不说；到目前为止，从局势发展来看，这套方案只是给我们带来了坏消息。一天比一天更黑暗的前途难道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吗？

寻常的人都相信，对一个残酷无情和死不回头的敌人，应该竭尽全力加以遏制和打击。我们的神明却并不这样主张，他宁可走怀柔的道路。他对侵略者和共和党人决不一视同仁。

对共和党人，是鞭打、黑牢、欺骗、杀戮。对于焚烧乡村、虐杀俘虏、枪杀赤手空拳的居民的野蛮人，则是态度和气、彬彬有礼、羞羞答答。

敌人的远程大炮大量地杀伤我军士兵，而我军又没有大炮还击，对此，一位公民主张采用燃烧弹去对付敌人的大炮。滚开！可怕！这岂不违背天理人情！虔诚的特洛胥即使挨了耳光也决不还手。

普鲁士鬼子自从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以来，一直在沉着地等着我们迫于饥饿而不得不就范。一个法国人找到了一种无名烈火，至于是什么烈火，我也说不清楚，据说它能像雷电一样，为我们打开解放之路。

“伟大的上帝！多么可怕的主意！”，可怜的特洛胥叫了起来。“敌人是那么老实，他们只满足于使用克虏伯大炮、严密的封锁和乌哥利诺① 方法，而我们却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手段去对付他们！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们？让我们的城堡在炮火下倒塌，让所有的巴黎人都在自己房屋的废墟下死去！让老人、妇女和儿童忍着饥饿的痛苦苟延残喘！这一切算得了什么！打仗么，天经地义就要死人！”

“使用无名烈火去回击正规的、检查合格的和合法的炮弹，这简直是十恶不赦！只要特洛胥活着，就决不允许世界上发生这种可怖的景象！那怕让巴黎陷落，让法兰西割地、亡国，让法国人一半死掉，一半当亡国奴，特洛胥也决不允许在发射炮弹方面采用不正当的新方法。”

我并不了解上面提到的无名烈火以及燃烧弹，《世纪报》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把它们扔进水里去了，现在还在水里。假如这些杀人的发火器确实存在而不是虚构，假如特洛胥将军出于所谓人道的考虑拒绝使用，那就是一个卖国行为。巴黎如果不惩罚这种行为，巴黎也将有罪。

必须进行调查和法律起诉。

① 意大利的格那得斯卡伯爵乌哥利诺，1288年为其政敌所败，被俘后囚于哥兰底塔中，被饿死。

反动派同俾斯麦的公开勾结

1870年11月25日

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缔结了同盟。

甘必大在十一月十八日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这两派狼狈为奸，一致要求召开国民议会，并拚命地促使其实现。"

不妥协的甘必大先生开始赎罪了。他靠了共和党人的帮助而青云直上。一旦爬上了台，便一脚踢开共和党人，并把他们出卖给敌人，以期博得敌人的青睐。

幻想！敌人可以收买倒戈者并给以奖赏，但决不接纳他们。而倒戈者们却总是荒唐地以为他们被收留了。反动派正着手发配第二批流放犯。而押解第一批流放犯的宪兵们，名列在第二批流放犯的前茅。甘必大先生曾充当抽打共和党人的鞭子，现在轮到他自己挨鞭子了。

甘必大在当初就有嫌疑。他主张抗战。他发了一个拥护巴赞的文告，因为这个巴赞是保守派的希望和宠儿，是社会的救星！巴赞当时曾打算调动他的军队和普鲁士人一起压平无政府主义者！

甘必大现在说："这两派一致要求召开国民议会，并拚命地促使其实现"，这句话使他的罪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要搞错了，在法国，保守党的首领是俾斯麦。合法政府并不在巴黎，而在凡尔赛。俾斯麦要求召开国民议会，他懂得，有钱人阶级拥护他，这些阶级掌握着选票，它们将凭借自己的势力以及人们对外敌的恐怖心理，任命一个为普鲁士人和保皇派所需要的国民议会。

关于这一点，只要读一下反动报刊就可以明白。在这些不知羞耻的报刊上，人们昨天难道没有读到发表在普鲁士《总汇报》上

的那篇伤天害理的文章吗？文章的作者就是这些报刊派驻威廉国王那里的代表。他们把这篇文章称作重要文献。

确实非常重要，因为这篇文章是他们自己在巴黎对于十月三十一日事件的受害者所作的污蔑的翻版，这就表明他们同俾斯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让俾斯麦在凡尔赛翻印他们的谰言，并且无耻到了这样的地步，竟然把俾斯麦当作道德权威加以引证，竟然把同敌人公开勾结看作他们的光荣。

大家看到，事情发展得很快。俾斯麦及其在巴黎的同伙们指责市政厅对十月三十一日的强盗们表现软弱和迁就。我们的独裁者们可得小心。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监狱，因为反动派从此有普鲁士的士兵作为宪兵，而俾斯麦宰相对他的好朋友是百依百顺的。只要反动派把俾斯麦看中的几个省出让给他，他们就能在宪兵的帮助下，把那些违背普鲁士国王和保皇派分子旨意的强盗们随意处以流放、枪毙和绞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位有感于时局而牢骚满腹的儒尔·法夫尔先生也将被当作无政府主义者，也许被当作强盗。儒尔·法夫尔不同意俾斯麦先生及其在巴黎和凡尔赛的报纸向他下达的关于召开国民议会的指令。他居然胆敢说："这项指令，以及对于不服从指令所作的指责，既然是出于分裂和削弱国家抗战力量的需要，问题也就相当清楚了。"

市政厅的驯服的天鹅居然敢对以威廉的大宰相为代表的秩序党人造起反来了！它将受到巴黎的亲普鲁士报刊的谴责，而实际上这些报刊已经在谴责它，不过对它使用的语气不同于对待老革命者，而是隐约地带有一点威胁的口吻。

人们不要忘记，巴黎的亲普鲁士报刊就是反动派，而反动派就

是社会。确实，今天代表法国社会的是普鲁士国王，而其喉舌则是普鲁士国王的宰相。

这并不等于说，法兰西对威廉佩服得五体投地。事情远非如此！法国社会不等于法兰西民族。我们不能把两个不同的和敌对的东西混为一谈。法国社会是资本，——而民族则是劳动。一个是奴隶主，另一个是奴隶。

人们常常说："为什么要把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硬分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呢？"不可分割，确实如此。没有奴隶主就没有奴隶；没有奴隶，就没有奴隶主。而问题应该是：不要奴隶主，也不要奴隶。不过，暂且先别说这些离题的话！这样扯下去会越扯越远。关于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我另有专文论述。决不能说到哪里就是哪里，现在不是这个时候。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政治。

肯定说，是社会统治着民族，而且统治得相当糟。因此，这个两头怪物就像翻筋斗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却总是回到过去的老样子，两只脚着地。于是又重新开始。不过，这次的筋斗翻得非同寻常，中间杀出了个第三者，给了怪物一闷棍，夺走了它的一切财物。

由于两头怪物长着两个脑袋，拦路的强盗便按照老规矩向正在争吵不休中的双方的一方提议，只要能得到报酬，他愿意帮助这一方打另一方，这个提议被采纳了。可是受损害的一方却拒绝这一代价高昂的调停，决心继续打下去。

普鲁士国王这个拦路强盗愿意让法国社会站稳脚跟，因此得到了法国社会的欢迎。法兰西民族生了气，愤怒地把他推开。法兰西民族对于它的坏政府已经感到厌倦，坚持要打败侵略者，除尽法奸，否则决不停止战斗。

法兰西民族的胜利是令人十分怀疑的。它在开始的时候一度占了优势。由于经验不足和思想迟钝，它又失掉了优势。它的对手（社会）却十分强大。贫困和无知的多数人不会战胜享有财富和

知识的少数人。

我们看到，人民正遭到一次新的失败。但是，这一次的胜利将比以往的历次胜利罪恶大一百倍，因为胜利者将在日耳曼强盗的庇护下取胜。

对此，盲目的群众至今还没有看清，等到他们看清楚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

然而，卖国贼的胜利将很快使人们觉悟，他们的好景决不会太长。

背　　叛

1870年11月26日

要知道法兰西究竟落入了谁的手中，就得读《自由选民报》(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份报纸的创办人是现时最有力的掌权人之一，埃纳斯特・皮卡尔先生。让我们引证以下一段话：

“……在其抗战期间，巴赞一直是业已被推翻的帝国和年轻的共和国寄托希望并十分关切的对象。皇后把他看作波拿巴王朝的未来复辟者，向这位圣劳伦佐和格腊韦洛特的英雄致以敬意。儒尔・法夫尔先生毫不怀疑此人对祖国的赤胆忠心。明智的人们预见，如果巴赞被打败，法兰西将会亡国；如果巴赞打胜，他将建立新的独裁，甚至是新的王朝！”

“我们坦率地说：巴赞拯救了法兰西，但法兰西的未来使我们感到担忧……”

于是，市政厅的一位有影响的成员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巴赞不是卖国贼，而是想当皇帝。”他说这些话，很冷静，一点也不激动，完全符合严肃而稳健的国务活动家的身份。“卖国！”算了罢，

这是蛊惑者的语言，这样的话是不能用到帝国时代高高在上的名人们身上去的。这些大人物所处的地位超出了语言的通俗含意的范畴。

一位元帅，听到了炮声，赶忙带着他的三万名士兵，去把他的同僚从敌人的手里援救出来，这样的勇士和男子汉算不了什么。巴赞对整整一天的炮轰听而不闻，而借口没有接到命令，听任普鲁士人在两里路之外把弗罗萨尔将军歼灭，以便自己能得到最高指挥官的任命。巴赞根本不是卖国贼，不仅如此……那是位数一数二的聪明人。

主人明白了这一点，可是由于自己惨遭失败，只得让步。巴赞当上了麦茨的司令官，这很好。可是，在夏龙的麦克马洪，表面上是巴赞的下属；实际上听从波拿巴的指挥，为了两军会师，他下令部队向蒙梅迪作冒险转移。巴赞这方面也行动起来。不过，他对麦克马洪并不比他待弗罗萨尔好。他在完全可以穿越的普鲁士防线面前停了下来，听任色当完蛋。"啊！卖国贼！——住嘴，可恶的革命者！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大家不能冒然地小看他，他毫不犹豫地穿过重重灾难为自己开辟道路。他是个在历史上受人钦佩的大智大勇的人物。"

被困在麦茨的巴赞确实成了法兰西的英雄，成了举世瞩目的头面人物。在一片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他巍然不动，屹立于败军之中，从此他的名声大震。他现在只要作最后一次欺骗，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了。

他着手进行他的为普鲁士和波拿巴效劳的阴谋：以洛林、阿尔萨斯和几十亿赔款为交换条件，取得俾斯麦的帮助或通行证，从而

复辟拿破仑王朝。一旦他和十二万名士兵获得了自由，取得了回旋余地，他就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或者执行普鲁士的协定，或者主持随时准备投入他怀抱的共和国政府。

假如巴赞的军队在外省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进而迫使德国人放弃对巴黎的包围，谁会想到去耻笑巴赞呢？谁还会由于他在福尔巴赫和色当背信弃义、向欧仁妮皇后派遣使节、和普鲁士串通而同他算账呢？正如《自由选民报》所说的那样，他会建立独裁，甚至建立王朝。

可是巴赞并没有比华伦斯泰①更成功。他的对手比他更奸诈。俾斯麦猜到了他的用意，为了消遣一下，把这只想充当猫的小耗子作弄了一番。他允许巴赞向伦敦、凡尔赛、威廉堡派出使节。他为巴赞提供了给布瓦埃、布尔巴基等人的通行证，乐于使这位唯一能够和普军匹敌并曾使德国人遭受重大伤亡的军人丧失荣誉。

巴赞因此而蒙受耻辱以后，接到了敌人的判决："无条件放下武器……同色当一样，军队按俘虏处理……"

巴赞曾经期望，靠着他毫不留情的叛卖行为，能够平步升天，现在他的梦想破产了。有这种品格的人在人间叫作特洛泊孟②。在天上，该叫什么名字呢？

关于这出戏剧以及剧中的人物，我们还没有说完。《自由选民报》很想使我们相信相反的情况。可惜，它举不出一个可以不被否定的名字。

它说："法兰西的当权人物，那些直到九月四日以前压迫着我们的人，统统被推翻了。参与过帝国时代的金融、政治和军事投机的人物不再存在了。自从巴赞元帅同他的皇帝遭到同样命运以

① 华伦斯泰(1583—1634)生于捷克，三十年战争时期德皇军队的统帅。——译者

② 当时著名的杀人犯，于1870年1月19日被处决。这里泛指杀人犯。——译者

来，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正在站立起来……战争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是否就是获得解放的阶段呢？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是共和主义和民族奋起的阶段……我们希望特洛胥、帕拉丹、凯腊特里和布尔巴基将能同意不以战争而名扬天下。”

特洛胥、帕拉丹、凯腊特里和布尔巴基！他们是拥护共和主义法兰西的人吗？我们且不谈奥雷耳将军，他七十岁了，历来循规蹈矩，现在似乎仍在认真地打仗。可是其他三人！布尔巴基是土伊勒里宫的亲信，御林军的司令，巴赞为普鲁士和波拿巴搞阴谋而派出的使者，他携带了俾斯麦批准的通行证从麦茨出走！凯腊特里是在墨西哥搞反游击战的上校，重建帝国特务网的警察局长；最后是特洛胥将军，对于此人，通过他两个月来独裁统治的种种行为，我们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谁能够猜到特洛胥将军的计划？共和国不以为意地听由波拿巴把特洛胥的枷锁加在自己头上。特洛胥按理应该在九月四日同八里桥内阁一起下台，他不过是这个内阁的附庸。此人作风的傲慢、粗暴和飞扬跋扈，超过了从前的皇帝，他是怎么当上独裁者的呢？这种稀奇古怪的政权无疑是未来的一个谜。

经过二十年的军事专制以后，生来就对这种专制满怀仇恨的共和国却比以往更加处于军阀主义的掌握之中。军阀主义过去是愚蠢的和暴虐的。而现在比过去更加愚蠢，更加暴虐。它不仅使人们横遭暴虐，而且它的无能更加令人可怕；因为，由于它的无能，比自由更加宝贵的国家独立遭到了损害。

自从十二月二日以来，民族已经习惯于军人统治。人们厌恶它，却又容忍它。人们不知不觉地向它屈服了。因循守旧战胜了理智，甚至战胜了意志。

我们处于被围困的非常局势下，专制主义对我们的前途的威

胁要比以往的历次专制都更严重，因为今天的专制主义是以刺刀的形式出现的。成见使它具有几乎是无往而不胜的力量。

卖国贼包围着我们，他们在到处活动。我们却闭着眼睛装作看不见。失望使巴黎人变成了沙漠中的驼鸟。

似乎人们已经下决心要接受最残酷的结局，而且人们所要求的无非是希望加快结局的到来。

一个民族是怎样灭亡的

1870 年 11 月 27 日

法兰西从一个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军人的手里，最后落到东罗马帝国的地步。每次转手都是一次堕落。一个民族就是这样灭亡的。在兵营的每个角落里，那些无法无天的丘八都在梦想充当我们的主宰。昨天的主宰还托庇先人之荣华而享有令人怀念的盛名，而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则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王杖是根皮鞭。

这位如此蛮横而又如此无能的新巴蒂夏[1]，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此人原是教士出身，曾经当过保镖。这点经历就足以使群众匍匐在他的脚下。下台的独裁者把缰绳交在他的手里。他于是便成了一贯正确、无可非议、神圣不可侵犯的英雄。

他在三个月内什么事也没有干。但是，三天以来，他似乎有所行动了。群情一片振奋。谁再指责，就是犯罪，谁敢抱怨，就是渎神。人们几乎把他当作我们呼吸的空气和照耀我们的太阳。可是，巴黎之所以没有早在十月中旬就把德国鬼子赶走，完全应当归罪于他的无能，归罪于他顽固地坚持消极被动，归罪于他的麻木不仁。这有什么办法？他根本不相信抵抗能够成功，他认为只有不惜一切代价地求和才能获救。他没有向巴黎城内运进一支枪、一

①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或大公的名称。——译者

门炮、一颗粮食。他没有掘过一立方米的土。何必呢,反正抵抗是不可能的!

这种令人惊诧的状态持续了两个月。十月三十一日事件震动了他,使他醒悟了过来。他首先把那些胆敢搅乱他的美梦的捣乱分子以叛国罪关进监狱,然后,他迫于群众的决心,抖擞起一点精神,勉强地同意采取这一使他感到厌恶的行动。

但是,无所作为地浪费掉的两个月时间,能追补回来吗?人们本来可以在九月四日至十九日期间从法国和外国运来三十万至四十万支速射步枪,这些枪我们现在得不到了,将来也得不到。如果从九月五日起就开始进行制造,我们今天就会有远射程大炮,可是我们没有。我们在两个月内完全可以把大炮增加到两千门,而我们现在只有几十门。

到十月十五日,我们应该具有足够数量的大炮。如果那时我们手中掌握象样的枪炮,那么,我们就能有五十万和敌人一样武装精良的军队扑向敌人。然而,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特洛胥将军不仅忽略了武器,而且也没有考虑过士兵。他把国民自卫军的编制定为每营一千五百人,从而使自卫军发挥不了威力。人们不禁要提出责问:这个以整编部队为名而行瓦解部队之实的政府究竟居心何在?特洛胥先生所干的,是使部队陷于瘫痪。现在当他不得不改变这种畸形编制的时候,他又不知从何着手,因而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国民自卫军应该是取得保卫战胜利的决定性工具。它至少应该提供三十五万名上前线作战的战士。而现在,在庞杂的自卫军各营,要根据年龄、情况,以及各种不同特点进行挑选,大概只能挑

出八万名这样的战士。

人们应该从九月五日起，一分钟也不浪费地进行工作，在每个区恢复军团的建制，恢复军队中通常的各种体制：每五百至六百人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二至三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最后，二至三师为一军团，总之，这要依各区的人口多少而定。

根据年龄，根据未婚、已婚、失偶、无子女等等不同情况分别编队的问题，理应在当时就深入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现在众说纷纭。前几天，人们只是肤浅地接触了一下。这些问题本来在九月份就可以根据群众的意见而加以解决。那样的话，每个人都会加入国民自卫军，因为这是义务兵役制，而且人口登记又可保证无法逃避服役。

今天，由于特洛胥先生的缘故，我们没有足够的远射程大炮，没有足够的好枪，没有足够的国民自卫军战斗部队。应该有五十万人和良好的武器。我们现在有什么？我不知道。

特洛胥先生损害了国家的生存。谁能够对我们的明天作出保证呢？可是，特洛胥先生却依然盛气凌人。他把那些从第一天起就宣传能使祖国获救的主张的人投入监狱。人们对这些人报以辱骂，同时宣布特洛胥先生是个诚实的人。

人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知道，这种判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丧失了主权的民族之命运

1870 年 11 月 28 日

粮食只够吃一个月了。要坚持更长的时间，那是痴心妄想。用不了四个星期的时间，巴黎就维持不下去了。因此，从现在起到一月一日，或者是解围，或者是投降，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特洛胥将军许诺在十一月十五日解除封锁。我们不妨把日期宽限至三十日。以后怎么办呢？难道可以无限期地往明天推吗？无限期推迟，那就是把巴黎交给柏林。

外省确实有所起色，有点希望。可是，谁敢根据这种表面现象而作出可靠的结论呢？我们只应该依靠自己。幻想将是致命的错误。巴黎只能依靠自己的武装才能取胜，否则巴黎将陷落。

到今天为止，特洛胥先生强制推行了他的计划。人人都服从这个计划，但是，自从十一月十五日这个期限过了以后，任何人再也不相信这个计划了。我们将向何处去呢？

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巨大的都城，处在危亡的关头，却驯服地听命于一个默不作声的斯芬克斯，而这个怪物所以取得这种盲目的信任，完全因为他是个已为三个月的经验所证明的碌碌庸才。这个都城的命运决定着四千万人的命运。

这样的事情竟发生在八十年内曾经四次推翻君主制的法兰西民族中。她就这样被一个陌生人用手牵着，安静地向深渊走去，在跌进深渊的时候，她将向陌生人鞠一躬，如同一位妇女在她的舞伴领她回到自己座位时所做的那样。其实，法兰西民族并非不明白她正走向何方，当别人向她指出危险时，她只是微微一笑，简单地回答说："啊！这与我无关，我的舞伴向我保证，由他负责。"

设置深渊的敌人说，这个民族是个疯狂的民族，难道他这样说有什么错吗？

灾难尚未到来，日子平静而又规律地一天天过去。粮食在消耗。每天的配给在缩减。人们勒紧裤带，谈论着天气、饥馑和双方的对射："这场焰火将如何了结呢？究竟以饥馑还是以大炮来结束

节日呢？——啊！我一无所知，我没有看过节目单。——我也不清楚。节目单没有公布。导演要给我们来个出奇不意。这样更有趣些。”

这些老实人或许会就焰火的最后一个节目打个赌吧？现在是开赌的时候了！两种结局，究竟哪一种中彩？来吧！爱逛马路和常跑交易所的先生们，你们大概为你们的长期失业而感到痛苦了。请你们把赌注压在饥馑一边或者炮轰一边。一场好赌，结局将是巴黎的彻底垮台。

无论城里城外，人们暂时都很欣赏这种英勇的沉寂。巴黎人诚然少吃了几口面包，但他们并不因此少拉琴弦。音乐在最初不太吃香。大炮占着上风。现在大炮声都已听厌了，音乐声又响了起来。只缺舞会和芭蕾而已。只要结局不很快到来，不久就会有舞会和芭蕾的。因为人们对它们十分留恋，而且虚假的羞耻感早已成为过去了。

报纸为这种了不起的镇定态度大唱赞歌。人们将象欣赏马尔斯广场或马比勒发射的火箭一样安然自若地观看炮弹落地。小偷被普鲁士人打死，房屋被烧或被毁掉，这都是好看的戏。弗朗科尼① 是很逗乐的。而现在的戏是真刀真枪的打仗，还真的死人。大家都说，巴黎人的愚蠢带有英雄主义的色彩。好极了。不过，这纯粹是愚蠢的英雄主义而已。

一个民族可以被武力压倒而不丧失其荣誉。而我们，在武装力量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却要丧失荣誉。巴黎具有取胜的一切基本条件。只要有一点常识、智慧和尊严，就能够获胜。

那位浪费了由他掌管的军事力量的君王，刚刚被人们推翻。至

① 当时著名的马戏团。——译者

少，不应该立刻重犯愚蠢的错误。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人们从那位君王手下随便找了一个无名小卒，并且让他接位。

人虽然换了一个，但还是一个独揽大权的苏丹，同样无能，同样顽固，而且同样专制。他立即重新开始，或者说，继续推行他前任的事业。像他的前任一样，他有自己的计划，他推行这项计划，从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像他的前任一样，他也是负责的。人人都很高兴，觉得这套制度很好。像在他前任的时代一样，谁敢说个不字，谁就是叛逆者，谁敢于批评，谁就是卖国贼。爱国主义要求沉默和服从。

人们并不因此而沉默，但是人们却更加服从了。尽管新主人的庸碌无能已经有目共睹，那也白搭。巴黎把她的防务盲目地交给一个宣布抗战为不可能的人。巴黎丧失了理智、思想和意志。巴黎丧失了自己的主权。

好吧！巴黎的命运将同那些丧失了主权的民族一样，这就是灭亡和耻辱。

外国人的政府

1870年11月29日

政府无视累累的罪证，无视公众的呼声，一味为巴赞辩护，这究竟是为什么？根据初步的揭露，政府曾威胁要把那些污蔑我们的光荣战士的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且，为了替这位被污蔑的光荣战士报仇，一家报纸几乎横遭血腥的洗劫。而市政厅对于投降活动，对于最近的种种黑暗阴谋，是完全知道的。

后来，这位前元帅的阴谋已经真相大白了。除了他的同伙以外，任何人都不再怀疑了；而他的同伙们却毫不气馁，继续策划阴谋。英国的报刊更是一马当先，疯狂地向着巴赞的控告人发起冲锋。

共和党人当然是这场冲击的主要对象，这是不用说的了。在下流小报的配合下，英国报刊对十月三十一日的蛊惑者开了战。政府随时准备接受它们的命令。根据《费加罗报》的要求，政府决定由波拿巴公司出品的预审法官受理十月三十一日事件。

对于十月三十一日夜晚的事件，政府的先生们对这些刀笔吏们已经作了什么有意义的叙述呢？他们或许会痛快地把他们的敌人嘲弄一番。那天晚上，他们的敌人占领着一个炮台，由于担心发生内战和轻信了诺言，自动撤出了炮台。他们或许会把那些不长眼睛、不长耳朵的傻瓜们好好地取笑一番。这些傻瓜居然相信两个月来一味出尔反尔的人的忠诚老实。此外，法官们或许会向骗子手们讲述，他们怎样玩了花招，把犯人和证人一起牵扯进去，从而向他们逼取假供和伪证。

我们可以打赌，这些没有信义的人决不会良心发现，决不会后悔他们糟踏了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战争公约。这项用以限制武力的唯一约束一旦被践踏，还有什么希望、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无限制的流血呢？在文明世界里，谁破坏了这些不可侵犯的保证，谁就被认为是没有信义和没有荣誉的人，这样的人是一定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

对此，十月三十一日的背誓者当然并不放在心上。由于达成了协议，他们有些人获得了自由，另一些人则取得了政权，他们大家都成了胜利者而趾高气扬。从此以后，这项协议对他们只是耻辱的回忆。这些食言自肥、背信弃义的人接连四天布置了陷阱，对敌人实行突然袭击，为自己报仇雪恨。他们犯下这样的罪过，是长久不了的。他们已经陷入了反动派和外国的控制之下了。

保皇党人向他们发号施令。外国的政府也以建议的形式向他们下达命令。俾斯麦在他的《导报》上发出了训令，要他们消灭共

和党人。俾斯麦已经不以消灭十月事件的被捕者为满足了。欧洲的反动派又开列了要受到惩处的第二批蛊惑者的名单。人们已不再掩饰。图尔的政府代表团终于懂得了祖国的危险处境，单凭这一条它就足以被宣布为非法。它竟敢要外省摆脱萎靡不振的状态，号召它们援救共和国，购买武器和弹药。这是对鼓吹秩序和君主制的普鲁士人的反叛。

对于这些阻碍贩卖停战和投降的新革命党人，皮卡尔先生的报纸横加斥责，并挑动温和派群起而攻之。这些搞阴谋的老手们，手段是何等的巧妙！他们自己是普鲁士人的同伙，却喋喋不休地大骂普鲁士奸细。不过，他们说话的那种腔调，让人感到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就像戏子在演戏一样！他们的举动，不禁使人想起，拉格朗日的帮凶们对着弗拉卡瑟上尉①的社会主义所发出的狺狺狂吠。

英国的报刊跟着随声附和地喊叫。它们狂怒得喘不过气来。怎么，法兰西没有死去！她又张牙舞爪地站立起来了！她在征集军队，而且是配备着大炮的军队！她不再使人怜悯了。她墓前的那些虚情假意的祷告无须再念下去了！但这又多么可怕呀！市政厅在动什么脑筋？赶快，快把十月事件的被捕者处决掉，再开始处决十一月的那批人。

十一月的那批人，就是甘必大及其朋友们。这谁能想到？现在轮到他们了。反动派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要拿他们开刀。反动派已等不及先处决贝尔维尔那伙人了。危险十分紧迫。该死！普鲁士人在外省碰到了对手，这些对手不是投降分子，而是既没有卖身投靠又没有被人出卖的战士。少说废话！皮卡尔和克雷

① 法国和意大利流行的喜剧中的人物，性喜吹牛、夸大，实际上却总是受人欺侮。——译者

松① 快来帮忙!

皮卡尔兄弟们的这份报纸的战争叫嚣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他以三大栏的版面擂起了冲锋战鼓，继而用一行字把敌人打垮了以后②，就以胜利者的口吻宣告:“列强将在谈判中更好地帮助我们。——列强将为我们争得更好的和平条件。——列强将以更加明确的态度处理我们的和谈事务。”

这份好战的报纸猎取胜利的桂冠，无非是为了把它们奉献于列强们的脚下，以便加紧策划他们的外交阴谋。不用说，九月四日以来，经过出访费里埃尔和矮个子的长途旅行③以后，法兰西就不再指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我们不幸的祖国，在儒尔·法夫尔先生和梯也尔先生的护理下，奄奄一息地被抬进四个中立国的医院，完全交给这些大夫们去医治。治疗工作就由他们绝对领导。

无论如何，不能让病人任性。否则，医生就不能负责把他治好。何况，对这样高明的大夫，也不应冒犯。大夫可能会发脾气，而大夫发了脾气，对病人是危险的。

这就是不称职的市政厅政府向人家磕头下跪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使我们从属于欧洲。今天，主管我国事务的是欧洲，它已经习惯于把我们当作未成年的孩子和法定受监护的人看待。

至少，人们总可以从这些监护人那里得到一点东西吧！可是，他们只是与我们为敌，与其说愿意保护我们不受勒索，不如说更愿意同勒索者一起分脏。现在是法兰西自己掌握自己命运并把聚集在她的床头和遗产旁边的那伙商人赶走的时候了。

---

① 爱内斯特·克雷松(1824—1903年)，律师和政治家，1870年时曾任巴黎警察局长。——译者

② 这里，作者语意双关，也可译成“他以三路大军发起了冲锋，继而全线击溃了敌人以后”。——译者

③ 这里指的是梯也尔去欧洲各国进行的求和活动。——译者

无耻之尤

1870年12月3日

报界对特洛胥的圣旨唯命是从。特洛胥威胁说，任何报纸若敢议论军情，将被勒令停刊。于是报界就卑贱地宣传这项不许人说话的法律。啊，刺刀呀，刺刀，你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在你的面前，只能唯唯诺诺。

《祖国在危急中报》也许是巴黎唯一的从不议论计划中的或正在进行中的军事行动的报纸。这并非因为它认为这样的议论会产生什么危险。那些身佩肩章的高级军官们竟然要从这份报纸里发现某种危险，这样的不讲道理实在令人惊奇；报纸的报导几乎总是落后于既成事实，并且，即使在相反的情况下，也与其说是为敌人提供情报，还不如说是为了迷惑敌人。不过也得承认，把战争写成连载小说，以满足那些饱读保尔·费瓦尔和蓬松·迪·泰拉伊作品的傻瓜们的乐趣，这是再可悲不过的了。

装腔作势的高级军官们一方面争先恐后地夸夸其谈、招摇撞骗，另方面却又为泄露了他们的所谓机密而怒气冲冲，要卡住那些犯下多嘴多舌的滔天大罪的记者们的喉咙，这是精神堕落和道德堕落的可悲征兆！

好人们，请放心吧。你们值得自责的无非是欺骗了你们的读者。俾斯麦和莫特克先生对于他们的间谍交回的成堆废话，大概只会一笑了之，而这些废话在巴黎却被当作严重的泄密。即使在平时，人们对于人类的愚蠢，也多少有所感触。而在严重的危机时刻，人类的愚蠢就暴露无遗了。所有的人都大量地和贪婪地干着

蠢事。看到成千上万的瞎子睁着眼睛顺从地跟着别人走去，这真叫人感到既可怜又可恨。

然而，谁敢试图阻挡他们前进的道路，谁就活该倒霉！他们将像羊群一样，蜂拥而上，从你的肚子上践踏过去，向着深渊奔跑，直到掉了进去，才在渊底叫喊："上面有没有人把我们救出来？"那时候，别人在走自己的路，回答说："傻瓜！你当初不应该掉进去呀！"

最后，碰巧有些好心人去拉他们一把，而他们在惊慌地走出深渊时，又把他们的不谨慎的朋友撞倒在地，踩在脚下。然后，他们飞快地跑着，一头再撞进另一个深坑。——在骗子手的棍棒的驱赶下，这些受骗者始终就是这样地来回奔跑。如果有人从敌人手里把棍棒夺来交到他们手里，他们立即把这个可怜虫猛打几棍。

读者，以上足以向你说明，为什么某些报纸对特洛胥苏丹如此温顺听话、如此献媚取宠，而对一个与它们毫不相干的同仁却如此蛮横粗暴，为什么它们被特洛胥苏丹在屁股上踢了几脚以后，却向《祖国在危急中报》的肚皮上回报几脚。这是向主子讨好而又能练练腿脚的妙着。

威名赫赫的将军不喜欢别人议论他的军事才能和所打的胜仗。这触犯了他的谦虚。他请报纸谈论别的事情，谈论天气、俾斯麦、哥尔查科夫①、上帝的光荣和无政府主义的罪恶。凡符合这些条件的报刊，他就允许存在下去。

当然，正直的办报人选择了最后一个题目，这帮家伙的马车把我们这份始终步行的报纸溅了满身泥水。而且，他们溅了别人一身泥水，却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的马车行驶时总是

① 哥尔查科夫（1798—1883年），俄国当时的外交部长，推行俄德亲善的外交政策。——译者

关着车门，既没有牌照又没有点灯。人们知道这些车子是流动的妓院，它们为主人挣了许多钱，并使浪荡女神① 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大约在二十年前，有一条法律曾规定车辆必须开门行驶，携带牌照和灯。这条法律使车主们十分恼火，他们最愿意做秘密的和见不得人的生意。有些资本家是很不乐意公开亮相的。

九月四日使流动妓院重获了自由。他们乘机到处卖淫，并把污泥溅在不带面罩的公民们身上。对于这些妓院和浪荡女神，即那些隐姓埋名的报纸和作家，公民们理所当然地报以最大的鄙视。

不署名的信件和文章同他们是一路货色。

至于那些自称为共和主义俱乐部并以此来掩盖其保皇派阴谋活动的反革命团体，共和党人对它们表示了应有的厌恶。人们知道，他们的动机是要金钱和地位，他们的手段是污蔑和取缔，他们的目的是恢复保护一切丑恶和暴行的君主制。

他们今天推行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明天就会用保证金和印花税扼杀报纸，封闭俱乐部，禁止公众集会，消灭一切自由。他们的每句话都是谎言，每个行动都是虚伪，每个希望都是威胁，每项计划都是破坏。他们能够依靠卖国而取得胜利。不过，我们知道他们的胜利意味着什么。一八四八年的经验使共和党人不再抱有幻想了。

① 罗马人的爱与美之神维纳斯的别名，这里借用为妓女的别名。——译者

侵 略 者

1870年12月5日

法夫尔先生在他的第一个和平宣言中曾经声明:"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堡垒上的一块石头",当时,《祖国在危急中报》立即补充道:"决不出让舰队的一条船,决不交纳我们预算中的一个金币。"

共和党人已经懂得了这一疏忽的意义,而且也清楚地看到,在骄傲的面具下隐藏着虚弱,这就是由于心虚而含糊其词。我们早就猜到了这一点。市政厅决不愿根据共和党人的修正而把那句话说全。

不仅如此,市政厅为了保住领土,很快就放弃了堡垒上的石头。而且,在期望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的秩序党人眼里,这也还太过份了。大家记得,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后,这伙胆小鬼怎样在他们的报纸上攻击法夫尔先生的口号,训斥犯有哗众取宠罪的法夫尔先生,叫他赶快滚蛋。他们至今不以此为耻,并且自从威廉降低了调门以来,他们对他的态度也从下跪磕头而变为破口大骂。

然而,虽然原来的计划已被梯也尔先生在他的俾斯麦式的演说中撕得粉碎,但它在官方的告示中却从未消失,人们将会看到它还会浮上水面。那些不久前假惺惺地擦着眼泪出席我们葬仪的外交官们,既然行了礼节,就不愿意得不到报答,而且他们是言而有信的人,他们答应了在威廉面前保护我们,就一定让威廉接纳这些大律师的花言巧语。

住嘴!车轮在滚动……也许晚了一点,但毕竟在滚动了。假

如法兰西的领导不是那些和平乞丐，而是一些有良心和有思想的人，那车轮本该滚了六个星期了，并且早已把普鲁士人打得人仰马翻。在整整两个月里，那些和平乞丐只想感动俾斯麦和列强各国。但是十月三十一日事件使他们进退维谷，不得不在法兰西亡国和战争之间作出决择，他们勉强地放弃恳求而拿起武器。他们终于同意了使用一个伟大的人民交给他们的武力，经过一个月的半心半意的准备，从今天的情况看，人们可以判断，如果一开始就认真准备，经过六个星期的努力，已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侵略者的地位在动摇。外省已经成立了几支军队。外省具有巴黎唯一缺少的东西——枪支和大炮。而巴黎之所以缺少，完全是由于无能的当局只顾乞求和平而不准备武装。

如果他们同意向外省发出号召，外省早就奋起响应了。

当然，外省想到苦难中的巴黎决非自今日始。有人说外省长期无动于衷，这是错误的。外省忧心忡忡地等待着巴黎的号召，而号召却迟迟不到。为什么外省要抢先行动呢？既然外省已习惯于巴黎的主动，而且，不论怎么说，这种习惯还是好的。因此，巴黎应该首先说话。

可是，这个不幸的政府没有用脚去跺祖国的土地，以召唤出几支军队，它却去敲各国政府的门，向它们苦苦哀求。现在政府跺了一脚，军队立即就出现了，赶到了，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可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普鲁士和儒尔·法夫尔方案了，甚至共和党的“决不出让我们舰队的一条船，决不交纳我们预算中的一个金币”这一修正也谈不上了。自从提出了这个卑贱的要求以后，已经经过了多少流血的日日夜夜。法兰西国土的三分之一被蹂躏，整个国家濒于崩溃。为什么？我们并没有把德国鬼子请来。威廉每天都在反复地说，德国受到了挑衅。他这样说是徒劳的，他

在扯谎。对此谁还不明白呢？

战争的挑起者就是那个四年来默不作声地在暗里准备消灭我们国家的威廉。

战争罪犯就是那个自称为优等民族并把全人类当作它的天然踏脚板的日耳曼民族。

法兰西人过去怨恨日耳曼族吗？他们对日耳曼族的狂怒和咒骂根本置之不理。他们甚至听而不闻，这就更得罪了那些神经错乱的人，更加深了他们对法兰西人的莫须有的愤恨。

是的，圈套是整个日耳曼民族设下的。它认定法兰西是受上帝诅咒和谴责的一个国家，因此它开进我们的国土，谦虚地自称是上帝之鞭阿梯拉①。这位替天行道的阿梯拉没有忘记其特有的职业习惯，用尽了阴险毒辣的手段。上帝总是派妖魔鬼怪来执行报复的。

伪善是他们的首要品德，是他们一切其它品德的核心。难道还有比霍亨索伦的陷阱更加可恶的吗？难道还能有比他们选择的办法更好的办法来引人上钩吗？欧洲对此当时就明白了。尽管欧洲对我们怀有嫉妒，它还是把过错归于俾斯麦。

可是俾斯麦很了解他的波拿巴。他知道波拿巴希望随便找一个借口以摆脱革命。他向波拿巴伸出这根救命竹竿是为了淹死波拿巴。

俾斯麦打算把法兰西一举淹死，而条顿人也有这样的打算。恶棍！他们居然痛骂拿破仑第三。难道我们所有的敌人不是都希望我们要拿破仑第三吗？他们难道没有为他的十二月罪行而庆幸吗？他们懂得，波拿巴是我们的催命鬼，他们打他的脑袋，只是为了使他在我们的土地上站住脚跟。

---

① 阿梯拉（卒于453年），匈奴领袖。据认为，他残暴凶狠，被称为上帝之鞭。——译者

威廉这位上帝的使者，他只同波拿巴作战，而不同法国人民打仗！可是，当法国人民把波拿巴推翻以后，威廉却要把波拿巴重新安置在法国人民的肩上！这也许就是上帝的惩罚吧？

由于让波拿巴的同伙们以及那些在波拿巴政府中担任过某些官职而声名狼藉的人掌舵，法兰西的航船几乎沉没。她之所以能够逃脱灾难，简直是个奇迹，完全是靠着一阵意想不到的顺风。只有愚蠢的舵手才能让航船如此长久地处于覆没的危险境地。

让法兰西最后重新站立起来吧，现在该轮到她去惩罚那些所谓的惩罚者了。

即使取得的胜利是暂时的，胜利者的傲慢自负也很难改正。处于全民武装包围下的俾斯麦同样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的美梦，他妄想像路易十四那样稳坐凡尔赛的宝座，并说："朕即法兰西"。那些曾经在他脚下匍匐的人至今心有余悸，他们或许认为，能站起来走着离开就算便宜的了，或许会把强盗放走。

这样的错误将是不可原谅的，并且会后患无穷！像俾斯麦和德国人那样的强盗，他们是劣迹累累的惯匪。如果巴黎逃脱了他们的手掌，他们会以为是别人抢走了他们的巴黎。假如受他们抢劫的居民把他们放走而不加惩罚，那他们为什么不卷土重来呢？

出于贪婪和嫉妒，这伙强盗制造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们的头上，要以此来惩罚我们。他们的罪恶是世界上人所共知的，他们的博士们不是在热烈的掌声中勇敢地说过，拉丁族和日耳曼族是生死不相容的吗？

我们认为，一切种族不仅要共处，而且要友爱。那些表面上看

来似乎是低级的种族，总有其特殊的才赋，因而能够在人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当一伙强盗背信弃义地向一个和平的民族扑去，高喊他们负有天命，要把这个民族消灭的时候，难道人民没有权利向他们回答说："你们是一伙强盗，应该灭亡的是你们！"

即使人们不把这伙强盗消灭，至少可以开出账单，要强盗们偿付这笔旅费。

我们相信，到最后，人们定将采取这个必要的措施，使我们的不幸遭受阿梯拉入侵的外省得到充分的赔偿。

沉　　默

1870年12月6日

没有任何力量能比二十年的专制统治更能软化人民的意志，并使他服从随便哪一个主子的胡思乱想。当暴君垮台的时候，他有把握能找到一位丝毫也不会丢失这笔遗产的继承人。

为什么波拿巴的继承人特洛胥先生不向报纸下命令，要他们硬说在白天看到了星星呢？报纸对此已经十分习惯，决不会违抗一个如此自然的命令，它们将找出种种巧妙的言辞，以崭新的方式把这种真理介绍给公众。人们甚至很快就会怀疑，星星竟敢在黑夜出现。

每天早晨，人们在报纸上看到，一场战斗在某地发生，但是报纸决不会说出战斗的地点、时间、原因以及谁同谁打，恐怕使敌人得到情报。

见鬼！让敌人得到情报！这岂不是卖国吗？显然敌人并不知

道他自己打了仗。他既不明了敌方的国籍和兵力，也不了解战斗的场所和结果。他不知道究竟打了胜仗还是败仗。总之，他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诚然，他是战斗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难道不能一古脑儿都忘掉吗？或者，他也许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打的仗，以致事后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象。

而人们却冒险地向他泄密！多么可恶！简直应该送军事法庭审判。“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真心实意的……我们处事谨慎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所以……所以我们在白天不会看不见星星。如果有人胆敢说他没有看见，我们将异口同声地对他说，他是个坏公民。”

报界为说了这一番话而感到无尚光荣。他们向那些坏心眼的人说，他们懂得吸取有益的经验，挨了二十年的鞭打，使他们知道了说话要掂掂分量。

当然，波拿巴从来没有规定报刊不许多管闲事。只要报刊笔下生花，美言一番，他还是允许它们对既成事实进行报导的。因此，专制主义还只是处于青年时代，而其继承者则比较成熟练达。假如他高兴要人们发誓说在深更半夜见到了烈日当空，那么，为了拯救祖国，人们就得这样发誓！……并且高呼：“消灭普鲁士！共和国万岁！”

特洛胥将军有他自己的计划。就其整体而言，这份计划是令人捉摸不透的，但是，其中的某些细节却不是这样。人们不难看到，巴黎的独裁者企图用他的纪律性来吓普鲁士人一跳。“啊，我的威廉，你为你的装着曲柄的德国手摇机枪而骄傲！呸，这只不过是些死的机器！我要让你们看一点活的东西。这里有一群记者，我

给他们随便出一个题目，他们就会根据这个题目做出各式各样的文章来：如果报导了三天前已经结束的战斗，那就是为进行了这场战斗的敌人提供情报。”

《祖国在危急中报》的记者没有就这个题目交出自己的文章，他不愿意再拖着不去尽自己的责任。他建议由特洛胥先生个人起草战报，战报在加印密封后存档，等到二〇〇〇年十二月隆重开封，供后代瞻仰。到了那时候，也就不会被敌人当作情报利用了。

这也许有点过份地夸大了羊群对沉默的热情了，但事关重大，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怎样热情也不算过份。

戏剧的结束

1870年12月7日

最后的冲突业已开始，而且将继续到戏的终场为止。从此以后，我们必须进行的是一场无休止的斗争。饥馑紧逼着我们，不容我们有片刻的喘息。我们已没有后退的余地。

今天特别令人感到忧虑的是战局未定。虽然普鲁士人正进退维谷，但谁胜谁负还有待分晓。时间既对他们不利，也对我们不利。在我们方面，原因在于饥馑；在他们方面，则是全法兰西的奋起。饥馑和援军，谁首先到达终点呢？

假如饥馑领先，那怕只领先二十四小时，那将是多么大的打击呀！巴黎的守军一旦被俘，侵略军将能集中兵力打垮外省的军队。至于巴黎的陷落将引起的恐慌和混乱就不必说了。因为，无论如何，巴黎毕竟是法兰西的灵魂和保证。

当然，即使援军到达太晚，也可以在临时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作

战，可以从这一城市逃到那一城市，最后躲到土伦这个坚不可摧并得到海军支援的要塞去。但是，这支军队肯定会起内哄。谁能保证互相竞争的各个保皇派别不会从威廉手里接过王冠，而绝望中的法兰西不会屈服于由德国鬼子在首都拥立的儿皇帝呢？

因此，巴黎必须不依赖任何人。如果外来的援军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帮助她获得拯救，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巴黎则应当自己解放自己。

特洛胥将军曾试图在十一月三十日突破普鲁士的防线。他没有成功。十二月二日，他在大前天攻占的阵地上有力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认为也许挡不住第二次进攻，就回渡了马恩河；他做得很对，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次失利就会一败涂地，而我们再也不能冒这样的险了。

况且，这次撤退和以往的历次撤退不同。它并不意味着吃了败仗。这是在一次胜利的军事行动后的主动撤退，因为我们感到没有力量打退比前一次更为强大的进攻。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很可能率领他的一部分军队赶到，如果我们不撤退，就可能遭到不可弥补的失败，那样就未免冒然从事了。

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二日的战斗不能算是胜仗，因为我们不得不又后撤。然而，这两次战斗更不能算是败仗。经过五、六次这样的算不了胜仗的战斗，巴黎可能被解围。我们的损失很重，预计以后的损失将会更重，对此我们是感到痛苦的。但是，敌人即使不是遭到更严重的损失，至少也遭到了同样的损失。他们两次丢失了战场，这对他们来说是少有的事。这场历时三天的战斗并没有使巴黎人灰心丧气，相反，却肯定会使德国军队士气低落。

他们的处境变得危急了。法国军队纷纷向巴黎拥来，越聚越多。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原来一股劲地向里昂进军，以图消灭

抵抗运动的基地，现在不得不大踏步向后撤退，以掩护并加强受到很大威胁的围城部队。

巴黎可惜缺少武器，人们不禁要咒骂政府；由于政府的无能和消极，巴黎处于外无援军内无武器的境地。而武器的不足使三十万国民自卫军，即占全部巴黎守军的一半以上的人，不能作战。这是多么令人懊恼呀！

假如我们现在得到三十万支沙斯波式步枪或施奈德枪①，以及相应的大炮，德国的防线一定能被突破、被粉碎，侵略者一定会失败。何况，如果我们早有了这三十万支枪，威廉也一定已经滚蛋了。

现在，威廉还在坚持，因为巴黎的解围将是普军的溃败。无论对普鲁士人或是对我们，局势都是十分紧急的。如果他们攻下巴黎，这也许就是完全的胜利。如果他们攻不下来，那肯定就是彻底破产。从现在起，在短期内就能见到分晓。

我们依然可能由于饥馑而失败。我们的解救者离得不远，但他们要对付卡尔亲王的部队。他们根据特洛胥将军的预告，估计我们将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出击，因而曾在十五日左右向我们靠拢过，但后来不得不后撤。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使凡尔赛的敌人感到极大的恐慌。

现在没有任何根据足以证明他们将能压倒堵截他们的敌军。敌我双方正在决一胜负，如果僵持下去，这对敌人将十分有利，而对我们十分不利，因为僵持局面将使我们忍耐不住饥馑而告终；处于这样的情况下，巴黎应该自己拯救自己。

---

① 施奈德是一工厂名。——译者

因此，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进攻，再进攻，不断地进攻。虽然我们不能期望每次这样的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有七、八次像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二日那样的战斗，就能迫使普鲁士人滚回老家去。他们经受不起这么大的损失。他们的部队士气十分低落，因而不允许他们再受这样的损失。

配　给　制

1870年12月8日

九月二十七日，《祖国在危急中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配给制**的文章。

从此以后，《祖国在危急中报》没有发表过同一题材的重要文章。要发表也只能是重复。问题很简单，并不需要作长篇的论证。

问题是要知道，既然产生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法则的社会条件和依据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法则现在是否可行。

巴黎的现状如同几个人乘着一条船在大海里触了礁、或被挤在北极的冰块中、或由于长时间的飘泊而在大洋中迷失了方向。处于这样的形势下，根据惯例，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法则呢？那就是平均分配各种生活必需品。

谨慎和常识要求我们从九月二十日起就严格地执行这条法则。可是为什么人们却把它抛在一边呢？这是因为普鲁士军队的封锁不像海洋和冰块的封锁那样显而易见，而且巴黎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外表。

直到今天，人们仍旧不肯承认这个比喻，因为这里缺少一个条件，即在海洋中受难者对危险是无力抗拒的。而巴黎，只需要一句

话，她就能摆脱冰块和海洋，并登上陆地。可在达到人力的最后极限以前，巴黎会说这句话吗？我们大家有为共同救亡忍受苦难的特权，难道能因为一点小事抛弃这光荣的使命吗？

大多数人慷慨地接受了这个使命，不惜付出最大的代价。也许还有少数人，他们甚至不能容忍在他们的玫瑰花瓣上出现一个皱褶。他们宁肯抛弃祖国。大家要警惕，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并作出不可改变的判决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

有人不久前曾向世界表示，他们不能忍受一个多月听不到音乐，他们在虚伪的借口下，把娱乐说成是忠诚的表示。巴黎的被围对这少数人至今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甚至没有牺牲一点消遣。大家应该知道，一切钱财方面的慷慨都是绝对没有价值的，因为这样的慷慨并不意味着愿意同甘共苦。扔掉多余的东西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关键在于同意放弃一部分必需品。

无情的敌人企图以饥馑来制服我们。由于我们缺乏预见，浪费了我们的一部分资源，为敌人实现其计划提供了方便。如果从巴黎被围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我们的食物就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人们却愚蠢地得过且过，想着明天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些。经济问题上的乐观主义同军事问题上的乐观主义对我们同样都是致命的。

人们只是把随时可能复发的军事傲慢狂克服了一半。而在食品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状态却依然如故。人们在摸索着，想了一个又一个的办法，而浪费还在继续。政府拒不接受主张采取果断措施的全面观点。

巴黎要对法兰西负责。巴黎的陷落也就是法兰西的灭亡。巴黎应当不惜任何代价维持自己的存在。人们切莫再谈贸易自由了。今天，贸易自由是个自杀的口号，因为它将使民族灭亡。马尔

萨斯主义者对祖国并不比对个人更有同情心。他们甚至否认囤积居奇。在他们的眼里，囤积者就是上帝。宁可让一国的人民永远灭亡，也不能让投机受到一天的阻挠！

国家面临着深重的灾难，再也不能迁就这样的胡言乱语了。一丝不苟地严格分配我们最后的资源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两项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进行财产登记；二是实行配给。

实行登记包括：对一切属于配给的食品强制实行登记，然后对一切公私仓库和储藏室实行严格检查。其中包括对那些被控告为隐藏食品拒不登记者进行检查。对于违法者的处分有：罚款，没收，关押。

实行配给制必须有一系列的办法，其细节这里不一一尽述。这显然是这些非常措施的最困难的方面。要进行人口调查，这是配给制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究竟对哪些东西实行配给？1.一切食品无例外地实行配给，这是不容分说的。2.一切燃料。3.布疋、皮革等用于制作衣服的必需品，其中包括被褥及其它床上用品。

反对实行这些措施的人说，这会给国家造成一笔庞大的开支。但是，配给制首先不是一项长久之计。其次，配给并非是免费的，这依然是交换。配给的每一份食品和燃料都要以现金为媒介出售给一切希望实行这种交换形式的公民。没有现金的公民将以劳动偿付食物、燃料和衣服。

必须指出，不论是哪一项配给品，都将由负责收购和出售的国家压低到普通的价格。现在的高价是人为的。这些征购商品的占有者在购进时的价格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将有权取得一份合法的

报酬。国家将以成本价格出售，不论是以现金或以劳动来偿付。

食物和燃料的配给份额的价值只会是相当低微的，因为配给将根据现有的库存和围城的期限进行分配，同时考虑到既要使人能够活下去，又要体现爱国主义的需要。必须拯救巴黎，从而拯救法兰西，但至少必须让人活着。

国家将把每天的配给品折成劳动小时加以扣除，剩下的劳动仍归享受配给制的公民所支配。国民自卫军服役的时间自然算作劳动时间。

至于那些不能以现金或在国民自卫军中服役来偿付配给品的妇女、孩子或老人，政府将根据防务的需要，采取义务劳动的办法加以解决。

关键在于使巴黎的居民在围城的最后阶段能有饭吃，以便把战斗进行到底。如果不迅速组织平均的配给制，战斗将不能进行到底。

一旦把巴黎现存的一切食物和需要享受配给制的人数调查清楚，那么，只要把最起码的配给指标确定下来，就很容易知道防务还能支持多久的确切天数。配给品的登记和严格征用也许可以发现过去还不知道的存货。无论如何，政府在了解到抗战的极限以后，将采取措施。而当然首先不能让这个极限泄露出去。

政府应该知道，保密的最大困难在于不让《自由选民报》假装不说而实际上泄密。

又及：这篇文章刚写完，我们听到了不幸的消息。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无论如何，结论只有一个：战斗到底，直到最后一块面包。外省可能再次发动攻势，并和巍然屹立的巴黎会合。

只要外省始终听得到巴黎的炮声，即使这次遭受失败，也一定还会回来同我们会合。

结 束 语

本书到此告一段落。

布朗基还有多少话要诉诸纸上！

因为，就在《祖国在危急中报》被迫停刊的那天，传来了卢瓦尔军团打了败仗和奥尔良城再次失陷的消息。

十九天以后，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炮轰巴黎城开始了。

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九日，特洛胥在比桑瓦耳搞了最后一起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为了证明巴黎总督决不投降，他把一月二十二日在市政厅广场枪杀妇女和儿童的光荣让给了十二月杀人犯维努亚将军①，而这些妇女和儿童正是在蒙特勒图牺牲的战士们的妻子和儿女。

一月二十八日，巴黎投降了，虽然它的炮台依然屹立，城堡未受损伤，军队完整无缺，粮仓装满了食物。

既然由维努亚签署了投降书，巴黎总督还没有投降。

二月八日，一个由俾斯麦指定的无耻议会——刚被出卖的人分别在十七个选区和十一个选区把梯也尔先生和特洛胥先生选作

① 维努亚参与了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故称十二月杀人犯。——译者

议员——签字接受肢解祖国，出让洛林和阿尔萨斯，偿付五十亿赔款和蒙受耻辱的和约。

法夫尔先生——伪证制造犯和盗窃遗产犯——曾向法兰西和欧洲发誓说，九月四日政府决不会让出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堡垒上的一块石头；从他发誓那天起到今天，四个月已经过去，在战场上和弹洞累累的巴黎民房中，已经流了够多的血和泪，足以抹去伪善者的誓言。

这难道不是……惨痛的历史吗？

可是，就是这一伙人——他们出卖了全国人民，把法兰西的部分国土奉送给了外国，以期外国把共和制一起带走，他们把那些在十月三十一日竭力保住宗庙免遭卖国贼出卖的人判处了死刑，他们在一月二十二日向着那些抱着祖国不肯放手的爱国者和共和主义者群众开枪——就是他们这伙人，今天都聚集在凡尔赛，代替了普鲁士人，开始了对巴黎的围困和炮轰。

从二月八日到今天这段时间里，确实发生了一场革命，一场最伟大和最富有成果的革命。

这就是三月十八日革命。从那天起，被人民称作卖国贼并将为历史打上耻辱印记的那伙罪犯们，集中了兵营中的全部军队和从德国遣返的战俘，攻打巴黎。

巴黎又一次被封锁了。炮弹重新落到了城里。人民再一次血流成河。

凡尔赛发誓要消灭共和国。

为此，在巴黎被围期间始终只知磕头求饶的梯也尔先生，现在已征集了“法兰西历史上空前的一支大军”。

为此，被俘的战士们不能回到他们的望眼欲穿的母亲们身旁；他们只得荒废掉等待耕作的土地，不能亲吻年迈的双亲和向本村的邻居们诉说他们经受的苦难，他们将在兄弟残杀中死于沟壑。

为此，多少房屋被破坏，多少人死于非命。

为此，田野里尸骨成堆，巴黎城内送殡的灵车绵延不绝，妇女和儿童相随饮泣。

够了！如果必须经受帝国的全部苦难和九月四日政府的全部耻辱，才能到达新的境界，那让我们就感到自慰吧。

如果必须经受这些新的痛苦和殉难，才能使共和国得到永生，让我们就忍受了吧！

因为，不能说这些殉难不够多了。

不能说我们白白地度过了一八七〇年七月以来的这可怕的九个月。

鼓起勇气！永远向前进！

前进！——在这场天崩地裂中，被消灭的将是旧世界。

平民们，——再助一臂之力！

卡西米尔·布衣

布朗基传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法国十九世纪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年2月1日生于阿尔卑斯滨海省的普吉-泰尼埃城。他的父亲让·多米尼克·布朗基(1757—1832年)是个意大利血统的法国人，早年在当地中学任哲学和天文学教师。他深受启蒙思想影响，法国大革命期间曾是十分活跃的革命者，1793年作为阿尔卑斯滨海省的代表被选入国民公会，政治上倾向吉隆特派。拿破仑帝国期间，他又出任普吉-泰尼埃州州长。布朗基的母亲索菲(1779—1858年)是一位意志十分坚强的妇女；在布朗基的革命生涯中，索菲的母爱是极其可贵的：为了拯救她的小儿子，她曾一手筹划了儿子的两次越狱行动。布朗基的哥哥阿道夫·布朗基(1798—1854年)选择了一条和弟弟不同的道路。他崇尚自由贸易，拥护七月王朝，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过他的著作，并顺便提到"这位布朗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①。

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布朗基全家于1810年迁居沙特尔城。在复辟王朝统治下，布朗基的父亲作为波拿巴分子备受歧视，找不到职业，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因此，布朗基在十三岁那年不得不离开父母，前往巴黎去找哥哥阿道夫。当时阿道夫正在私立马桑中学任教，布朗基也就进入马桑中学读书。不久他考入了巴黎的

① 参见《资本论》，第一卷，307页。

著名中学——查理大帝中学，该校的学生多半是富豪和名门子弟，但布朗基以他的勤奋和天赋而出类拔萃。阿道夫曾赞叹说："这孩子将震撼世界"①。

布朗基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关心政治。1822 年 5 月 21 日，拉罗歇尔的四名共和主义青年士官在巴黎格雷夫广场被处死。当时盛传，烧炭党人可能乘机发动起义，解救四位革命者。布朗基听到消息后，便混进人群，等待烧炭党人发出进攻信号，准备助以一臂之力。但是，信号没有发出，布朗基目睹四位烈士引颈就刑，感到无比的悲痛和失望。后来他说，这是他在感情上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尽管如此，这位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还是在 1824 年加入了烧炭党这个法国当时最强大的密谋组织。

1825 年，布朗基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医学。为了谋取经济上的自立，他利用课余时间在一些私立学校教书。那时，法国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加尖锐。在复辟王朝初期，由于路易十八经受过多年艰辛的流亡生活，只是靠着外国入侵者的战车才登上了王位，他在推行复辟旧制度时多少有点顾忌。但是，1824 年查理十世即位后，这位狂妄自负的君主一味迷恋于"君权神授"的思想，肆无忌惮地推行反动政策，企图把历史车轮倒转。1827 年 11 月，巴黎爆发了反对查理十世的群众示威，群众筑起了巷战工事，与前来镇压的军队相对抗。在拉丁区，布朗基与许多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同敌人浴血奋战。在这场战斗洗礼中，年轻的布朗基受了一处枪伤和两处刀伤。

起义失败后，布朗基躲藏了起来；在母亲索菲的精心看护下，他养好了伤，便离开法国去意大利和西班牙旅行。在路过尼斯时，有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去郊区观赏风景，却引起了意大利警察当局

---

① 转引自让·梅特隆：《法国工人运动人名词典》，第一集，242 页。

的注意。他们怀疑这位前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来尼斯从事越轨行动，就下令逮捕了他。这是一次误会，布朗基不久即被释放。但是，谁能想到，布朗基在今后的生活中将要在牢房里度过三十多年①的漫长岁月。

1829年8月，布朗基从国外回到巴黎，在比埃尔·勒鲁②创办的《地球报》编辑部任速记员，负责议会报道。《地球报》是一份具有全欧洲影响的日报，编辑部内人才济济，聚集了圣贝夫③、梯叶里④、库辛⑤、雨果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名流学者，基佐、梯也尔等也经常为该报撰稿。布朗基当时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他对这些自由派的权威并不赞赏；他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尊重正日益向圣西门主义靠拢的勒鲁，认为他是“混在野心勃勃的星座中的一颗灿烂明星”⑥。当时，由于查理十世的倒行逆施，法国的革命已处于一触即发的局面，资产阶级、工人群众和革命学生正酝酿着对复辟王朝的最后冲击。报纸是社会的脉搏，是政治气候的最好观测站。布朗基就在这个岗位上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了解各种情况，随时准备投入反对君主专制的决战。

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悍然颁布了反动敕令：限制出版自由；实行新选举法；解散议会；举行新的选举。这一挑衅行动点燃了七月革命的导火线。备受失业之苦的工人们首先行动起来了，他们高喊“打倒波旁！自由万岁！”的口号，在街垒上同反动军

① 据莫里斯·多芒热统计，布朗基在狱中关押共三十三年七个月零十六天，软禁共两年八个月零十四天，流亡国外或受警察监视共六年十个月零二十四天。——见《奥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附录。

② 比埃尔·勒鲁(1797—1871年)，圣西门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③ 奥古斯特·圣贝夫(1804—1869年)，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

④ 奥古斯特·梯叶里(1795—1856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⑤ 维克多·库辛(1792—1867年)，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主义者。

⑥ 转引自萨缪尔·伯恩斯坦：《奥古斯特·布朗基》，33页。

队进行三天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历史学家把这三天称为“光荣的三天”。七月革命的发生在《地球报》编辑部内引起不同的反应：当布朗基带着战斗已经打响的消息回到《地球报》时，自由派的编辑先生们正在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但却丝毫没有参加战斗的打算。茹弗鲁瓦① 甚至断言“决不会有开火的事”。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老爷式态度，使布朗基甚为愤慨，他忍无可忍地说：“武器决定一切；至于我，我要拿起枪来，佩带三色旗的臂章。”② 他毅然走出编辑部大门，来到已经聚集着数千工人的格雷夫广场。在光荣的三天里，布朗基向人民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要求“十六岁至五十岁的全体公民动员起来，保卫祖国和自由”③。他亲自参加了攻打土伊勒里宫和市政厅的战斗。

巴黎工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了七月革命的胜利，而资产阶级却玩弄诡计夺取了胜利果实。巴黎大街上的硝烟刚刚消失，布朗基就猛然发现，那些反对动用武器的《地球报》的“同仁”们如今都成了路易-菲力浦政府的要员，取得了高官厚禄；比埃尔·勒鲁等一些赞成圣西门学说的社会主义者虽然没有同流合污，但却鼓吹非暴力主义的改革。布朗基决心走自己的道路，坚持共和主义理想，继续为人民自己夺取政权而奋斗。为此，他于1830年底加入了“人民之友社”。

“人民之友社”是戈德弗鲁瓦·卡芬雅克④ 领导的青年共和党人团体，社员人数约为四百至六百人。这些青年人在报刊上激烈攻击路易-菲力浦政府，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们举办的演讲会

---

① 德奥杜尔·茹弗鲁瓦（1796—1842年），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衷主义者。

② 转引自萨缪尔·伯恩斯坦：《奥古斯特·布朗基》，35页。

③ 《布朗基全集》，第一卷，64页。

④ 戈德弗鲁瓦·卡芬雅克（1801—1845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镇压六月起义的刽子手欧仁·卡芬雅克的哥哥。

开得生动活泼，听众往往达一、二千人。反动当局对它恨之入骨。1831年7月，内政部长卡西米尔·佩里埃①以“违背出版法和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下令逮捕布朗基、拉斯拜尔②、胡贝尔③等十五名“人民之友社”的领导人。翌年1月，塞纳省法院开庭审判，这就是著名的“十五人诉讼案”。布朗基代表十五人发表了一篇气壮山河的辩护词。他首先声明，他以无产者的身份出庭发言，并斥责法院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他说：“在我面前的不是法官，而是敌人；我为自己辩护是毫无用处的，我接受可能给我的一切惩罚，但我要抗议这种以暴力代替法制的做法……总有一天，控告和被告的地位将会颠倒过来。”他还揭露政府通过税收制度把钱“从穷人的口袋掏出，装进富人的口袋”，指出政府在原则上似乎代表全国，实质上不过是一小撮特权阶级和寄生阶级的工具而已④。这篇声讨资本主义制度的檄文，赢得了旁听席上广大听众的阵阵掌声。从那时起，布朗基的名字便开始为巴黎工人所熟知了。

塞纳省法院由于缺乏证据，被迫宣布十五人无罪释放。但是，法庭庭长借口布朗基的辩护词“危言耸听，危害公共秩序”，悍然判处他一年监禁和二百法郎罚款。在友人的帮助下，布朗基获得了缓刑两个月的时间，暂时取保假释。作为“人民之友社”的副主席，他始终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积极参与这个团体的各项活动。1832年2月2日，就在取保假释期间，他在“人民之友社”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发表长篇演说，精辟地分析了七月革命前后法国的阶级关系。他指出，法国存在着三种利益，即上等阶级（贵族）、中等阶级（资产

---

① 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年），银行家，曾任内阁总理。

② 弗朗斯瓦·拉斯拜尔（1794—1878年），著名的法国学者，自然科学家，政论家，社会主义者；1855年后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

③ 路易·胡贝尔（1815—1865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④ 参见《布朗基全集》，第一卷，74—89页。

者）和人民。七月革命推翻了上等阶级的统治，但人民没有懂得利用自己的胜利，他们拱手把政权让给了资产者。政府的所作所为表明它同波旁王朝一样是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人民从此懂得了必须自己夺取政权。他还说，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中，它像“一柄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里斯剑”悬挂在政府的头上；1831年的里昂织工起义标志着“阶级与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已经开始①。这篇著名讲话获得了当时侨居巴黎的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的高度评价，他在为《奥格堡世界报》撰写的报道中盛赞“年轻的演说者的雄辩和分析才能”，说“这篇充满活力、坦率和愤怒的演说……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气氛”②。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布朗基的空想共产主义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位青年人广泛地接触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各种思潮，研究了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又亲自参加了火热的群众斗争和革命的密谋活动。他是个善于学习、精于观察和勤于思考的人。早在中学时代，他同他的哥哥阿道夫虽然在生活和感情上十分融洽，但在政治和学术问题上始终没有共同语言。著名的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③有时和阿道夫一起探讨自由贸易的经济理论，布朗基怀着极大的兴趣在一边旁听，但他感到他们所讲的和他自己所想的格格不入。后来，布朗基在他的代表作《社会批判》一书中曾尖锐指出，萨伊宣扬的“听之任之”的自由竞争学说，是“一部倡导互相残杀的法典”④。

对布朗基影响最大的思潮无疑是巴贝夫的平等学说。虽然布朗基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提到过巴贝夫主义，他本人于1879

---

① 参见《布朗基全集》，第一卷，94—106页。

② 转引自罗热·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国源泉》，232—233页。

③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④ 转引自萨缪尔·伯恩斯坦：《奥古斯特·布朗基》，23页。

年 4 月 28 日接见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时，也断然否认他是巴贝夫的门生，但是，他最早参加的密谋团体就是以巴贝夫密谋思想为武器的烧炭党；他不仅读过邦纳罗蒂[1]的《为平等而密谋》一书，而且两人在 1830 年前后曾有过多次交往。我们从他的实践活动也可以看到，布朗基所组织的密谋团体同巴贝夫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三十年代在法国知识阶层中盛极一时的圣西门主义对布朗基也有所影响。他主要是在《地球报》工作期间，通过和比埃尔·勒鲁的接触而了解圣西门学说的。虽然在七月革命前，勒鲁还没有加入圣西门派，但他在《地球报》发表的文章已明显地带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在勒鲁的影响下，布朗基曾仔细研读过圣西门的著作。他接受了圣西门的一些观点，象主张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组织人类向大自然开战，等等。但是，在本质上，布朗基的思想和圣西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主张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统治，而后者则希望由统治阶级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布朗基身上也可以找到傅立叶主义的一些痕迹，如对"金融统治"的谴责，主张用"协作社"的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等等，但他不同意傅立叶的"情欲引力"理论，认为这会把人降低到动物的地位。

布朗基虽然从这种或那种学派吸取思想养料，但他首先是一个"实干"的革命家；对他说来，重要的不是抽象的逻辑推理，而是斗争实践的成败。1830 年革命的教训使他深深懂得，为了实现平等社会，必须以革命手段推翻旧制度，而且在革命后还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保住胜利果实。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是布朗基的最可贵的品格；他一生始终忠实地执行着自己的座右铭："革命者的职

① 菲力浦-米歇尔·邦纳罗蒂（1761—1837年），法籍意大利人，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主要门生，法国烧炭党的创始人。

责是坚持斗争，百折不挠，直到生命最后一息。”[1]但是，布朗基过分强调少数“优秀人物”的作用；在他看来，“优秀人物”就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革命应该由他们来发动和领导，保守的大多数群众的任务是响应和实行他们的革命号召。这种错误观点在实践上导致了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决定了布朗基所领导的历次密谋活动必定要以失败告终。

1834年初，布朗基在巴黎圣泊拉惹监狱服刑期满。他出狱后立即加入了巴尔贝斯[2]领导的“家族社”。在当时的法国，密谋组织名目繁多，大部分从事暗杀活动，而“家族社”是其中组织最严密的一个；尽管如此，由于各组织之间往往发生横的联系，也给奸细的活动留下了可乘之机。七月王朝在详细了解了各组织的内部情况后，决定首先拿“家族社”开刀。于是，它策划了一起假案，即所谓“火药事件”。1836年2月，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巴斯基埃男爵[3]以审讯为名，亲自去牢房会见因谋刺路易-菲力浦而被判死刑的贝潘。会见后，贝潘突然“灵机一动”，招供谋刺行动是由“家族社”指使和安排的。同年3月，警察当局在巴黎的一条偏僻小巷卢星街抄出了大批火药。尽管贝潘从未见过“家族社”的领导人，并且也毫无根据可以证明卢星街找出的火药与“家族社”有关，检察长还是对布朗基等二十四名“家族社”领导人签发了通缉令。被捕那天，布朗基正在巴尔贝斯家里。当警察闯进屋子时，布朗基机警地把装在口袋里的“家族社”成员名单送进嘴里嚼碎吞下，但警察却从巴尔贝斯手中抄获了一份号召巴黎人民推翻七月王朝的宣

---

① 转引自让·梅特隆：《法国工人运动人名辞典》，第一集，242页。

② 阿尔芒·巴尔贝斯（1809—1870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期间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法国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③ 艾蒂安·巴斯基埃（1767—1862年），复辟王朝时曾任掌玺大臣，外交大臣；七月王朝时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言。就这样，布朗基作为“火药事件”的首犯，被判监禁二年和罚款三千法郎。

布朗基在冯特弗洛中央监狱服刑刚满一年，就赶上1837年的大赦而被释放。“家族社”的组织业已遭到破坏，警察当局密切监视布朗基的行动，不准他在巴黎居住。但布朗基那时已是声誉卓著的领袖，又有丰富的秘密活动经验；他表面上同妻子苏珊-阿梅丽一起在离巴黎不远的让西镇过着宁静的家庭生活，而暗地却通过联系人把原“家族社”的成员汇集到他的周围，并着手建立新的密谋组织“四季社”。吸取以往的失败教训，他在“四季社”的组织工作中特别强调纪律和安全。根据他的规定，新成员入社要蒙上双眼带到一定地点进行严格审查，必须宣誓保守秘密，永不出卖组织，如果违誓，愿被组织以匕首处死。他还规定，每七名成员成立小组，名为星期，组长的代号为“星期天”，每四星期组成月，包括二十八名成员和一名代号为“七月”的负责人；每三个月组成季，季的首领为“春天”，领导九十八名成员；每四个季合成年，包括三百五十三名成员。“四季社”计划编制三个年，分别由布朗基、巴尔贝斯和贝尔纳① 三人领导，他们同时是最高领导机关三人委员会的成员，而布朗基是“四季社”的总司令。为了保证组织不受大规模破坏，各级组织之间不得发生横的关系，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

有了这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布朗基就为武装起义进行周密的准备工作。他曾多次混过警察的耳目，亲自到巴黎测绘地形和制订计划。他选择了市政厅、警察局和塞纳省政府作为起义的首要攻击目标，计划以这三点联成一片，在四周构筑大小街垒。他甚至为每个街垒事先确定了宽度、高度、火力发射点，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布朗基具有非凡的军事组织才能。

① 马丁·贝尔纳（1808—1883年），排字工人出身，“家族社”和“四季社”创始人之一。

1839年5月12日，预定举行武装起义的日子来到了。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相当多的警察和政府官吏在马尔斯广场观看跑马比赛。两点半钟刚过，起义者首先在圣马丁街夺取了军火库，接着便兵分两路，一路由布朗基率领攻下了市政厅，另一路由巴尔贝斯率领攻下了警察局。突然袭击取得了成功。巴尔贝斯在市政厅阳台上激昂慷慨地宣读了公告，宣布临时政府的成立，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推翻七月王朝。但是，参加起义的"四季社"成员不过五百来人，加上临时附和的群众也还不到八百人。政府当局在克服了措手不及所造成的慌乱以后，迅速调集了军警，把起义者包围起来。经过两天毫无希望的抵抗，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

这次起义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它表明布朗基的密谋势必成为"'夺取政权'的儿戏"①。在布朗基看来，只要密谋组织作好了准备，即使革命形势不完全具备，也可以举行革命的武装起义。他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声号召，巴黎群众就会纷纷响应；然而，正是由于巴黎工人事先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起义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因而尽管"四季社"的组织十分严密，在起义的行动上安排得十分细致，起义者毕竟是脱离群众的少数人，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这是布朗基作为革命者的悲剧，也是布朗基主义的重要特征。

布朗基在起义失败后隐藏了六个月，但在偷越国境时被抓了回来。最高法院判处他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押解到蒙圣米歇尔监狱服刑。蒙圣米歇尔是个周长不到九百米的小岛，与拉芒什省的圣马洛城隔海相望，退潮时与陆地有一径可通。岛上寥无人烟，满目荒凉；囚禁犯人的堡垒孤零零地矗立在离海面七十米高的岩石上。由于与外界隔绝，看守们为所欲为地虐待犯人。在长三米宽一米的牢笼里，冬天寒风刺骨，夏日热似蒸笼，还有臭气熏天的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29页。

便桶，跳蚤、老鼠的骚扰……犯人有时被加上脚镣手铐，甚至被关进暗无天日的地牢。

布朗基是个特别危险的囚犯，监狱当局对他更是严加防范。尽管如此，凭着他多年的铁窗生活经验，他还是设法同外界建立了联系。从他给他的朋友弗尔让斯·钱拉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虽身在囹圄，仍时刻关心着狱外的政治生活。他写道："请你告诉我，目前的政局如何；你对未来、现在、战争、和平、路易亲王等等有什么看法。请你跟我谈谈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吧！"①

一年的监狱生活使布朗基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但是，一个更严重的精神打击在等待着他。1841 年 2 月，他得知他的爱妻苏珊-阿梅丽因忧伤而得病去世。这个噩耗使他痛不欲生。这位在种种危急关头从不怯懦的英勇战士感到如此痛苦，这是不无原因的。早在 1825 年，布朗基还是一个穷学生，依靠在私立学校任教谋生，而苏珊-阿梅丽正是其中一所私立学校的学生。这位年龄刚过十三岁的女孩子爱上了她的老师。他们的爱情遇到了种种波折。苏珊的父亲是位体面的建筑师，对自己的女儿选择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浪荡子弟"作为终身伴侣，感到十分气恼。他以父亲的权威，禁止女儿和布朗基见面；而布朗基自己，出入于街垒的硝烟之中，辗转在各监狱之间，也顾不上谈情说爱。到了 1832 年，苏珊已经成年，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和社会的非议，毅然到圣泊拉惹监狱，和在牢房里的布朗基结了婚。对于同他患难与共，给了他热情、温柔、忠贞和希望的爱妻的去世，布朗基怎能不极度的悲痛?!

精神创伤和肉体折磨都没有压倒这位坚强战士的斗志。布朗基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考虑如何逃出牢笼。他利用母亲索菲探监的机会，陆续得到了小锯、锉刀等必要工具，经过两年时间的筹

① 《布朗基全集》，第一卷，137 页。

划，越狱的条件具备了。他和朋友弗尔让斯·钱拉商定了接应措施。1842年2月10日夜晚，他和其他四名难友把床单、被单撕开搓成绳子，又把铁窗用工具撬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巴尔贝斯从窗口顺着绳子往下滑的时候，因长期监禁身体十分虚弱，在半空中抓不住绳子而摔下，发出很大响声，被看守们发觉。越狱失败了。

布朗基的健康每况愈下。1844年3月，他患严重的喉结核症，被解送到图尔监狱就医。长途跋涉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五名医生会诊后，确认病人已无可医治了。由于布朗基是全国著名的政治犯，七月王朝怕他死在狱中而引起舆论哗然。此外，政府又阴谋利用蒙圣米歇尔监狱部分政治犯之间的不和（当时，巴尔贝斯等人曾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布朗基在1839年起义过程中斗争不坚决），假意表现出对布朗基特别优待，以破坏他的政治声誉。于是路易-菲力浦亲自下令赦免布朗基。具有敏锐政治警觉的布朗基一眼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断然拒绝国王的赦免，坚持留在监狱就医，直到1848年2月革命发生。

在七月王朝统治期间，金融资产阶级把持了议会和行政的全部权力，贪污舞弊、盗窃贿赂之风大盛。拉梅耐神父① 曾把议会比作一个大商场，"每一名议员都在这个商场里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友谋得一个官职、一项升迁和一点金钱好处而出卖自己的良心"②。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濒于破产。1845和1846连续两年因马铃薯病虫害造成的农业歉收，以及1847年的工商业危机，更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破产、倒闭、饥饿、失业，这一切都表明旧制度已经病入膏肓。1848年2月22日，

① 费里西德·拉梅耐（1782—1854年），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② 转引自萨缪尔·伯恩斯坦：《奥古斯特·布朗基》，116页。

巴黎的工人、学生、小店主冒着滂沱大雨上街示威，高呼“改革万岁！”“把基佐送上绞刑架！”当晚，示威群众夺取武器，筑起了街垒。两天之内七月王朝就被摧垮了。

2月24日革命在首都胜利的消息传到图尔，25日布朗基来到了巴黎。当天，他会见了原“四季社”的一些成员，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作了全面了解。晚上，他参加了群众集会。经过1830年革命和1839年起义的失败，布朗基总结了经验教训。他充分估计到二月革命后局势的复杂性，意识到必须在行动中保持最大的谨慎和小心。他在集会上劝说群众对临时政府暂时取静观的态度，强调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单凭革命热情，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将使外省陷入恐慌，并有可能使逃往国外的路易-菲力浦卷土重来。他说：“让市政厅的人们无所作为地留着吧。他们的软弱无能是他们必定要垮台的征兆。”① 他指出，必须广泛团结工人、学生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努力阻止临时政府向后倒退。同时，他从组织、武装和宣传三方面积极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他在会上当场建立了“中央共和主义社”。这个组织不再是从事地下活动的密谋团体，而是一个旨在扩大工人武装和加强宣传群众的俱乐部。3月2日，布朗基发表了《中央共和主义社致临时政府书》，提出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九项具体要求；其中第八条要求把“全体领取工资的未婚工人组织成国民自卫军并武装起来”②。临时政府为了早日结束巴黎的革命状态，决定在4月9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针对这一阴谋，布朗基于3月7日和14日又向临时政府递交了两份请愿书，指出“即将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对于共和国是个危险”，因为倘若在群众意识到自己利益之前举行选举，“反动派的胜利是无疑的”；他还说，“人民没有觉悟：必须使人民觉悟起来。这不是一天或一个月

① 转引自萨缪尔·伯恩斯坦：《奥古斯特·布朗基》，136页。

② 《布朗基全集》，第一卷，161页。

所能办到的事情"①。3 月 17 日，布朗基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一支十万工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来到市政厅的门口。临时政府慑于群众压力，被迫接见了布朗基为首的代表团，并答应推迟选举日期。

与此同时，布朗基警告人们决不可相信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口号，指出："如果共和国只是用一种统治形式代替另一种统治形式，它将是一场欺骗。字面的改变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实质……没有面包的人就没有自由。富豪们的穷奢极欲和贫困相并列，这不是平等。当女工带着饥饿的孩子沿着富宅求乞，就谈不到博爱。"②此外，正当布朗基努力把工人团结起来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以路易·勃朗③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却在竭力鼓吹"组织劳动"和成立"国家工场"。这一口号当时确实也反映了大多数工人的天真愿望。工人们相信能与资产阶级并肩求得自己的解放。也许出于策略考虑，为了不脱离群众，布朗基对卢森堡宫的政府劳动委员会和国家工场没有公开进行批判，但也始终不给予任何支持。

伟大的 1848 年革命表明，布朗基不愧为"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④。在他的策略思想指导下，革命在有秩序地向前发展；因而反革命派对他怀有切齿的痛恨，蒲鲁东当时在《人民报》写道："仅仅听到布朗基的名字，整个反革命派便吓得脸色发白"⑤。反革命派懂得，为了镇压革命，必须首先除掉革命的领袖。于是，他们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来陷害布朗基。

---

① 《布朗基全集》，第一卷，163—166 页。

② 《布朗基全集》，第一卷，171—172 页。

③ 路易·勃朗(1811—1882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④ 斯大林语，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四卷，278 页。

⑤ 转引自罗热·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国源泉》，241 页。

1848年3月30日，《回溯评论》的创刊号以社论形式发表了一个据说在二月起义中从基佐内阁内政部缴获的文件，题为《×××对内政部长的供词》。文件罗列种种假象，含沙射影，似乎布朗基在1839年被捕后曾出卖同志和变节投敌。这一文件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四季社"的另一领导人巴尔贝斯一口咬定，文件涉及的细节除了他和布朗基以外，没有第三人知道。这样，在巴黎的各俱乐部中议论纷纷，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各俱乐部曾推举蒲鲁东、勒鲁等人组织了一个荣誉审判庭，负责对指控进行调查。但是，由于某些人的派别成见和意气用事，加上反动派从中挑拨离间，调查没有得出结果就不了了之。

布朗基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政治背景的恶毒阴谋。他花了两星期时间反复核对事实，义正词严地对这个诽谤性文件据理驳斥。他首先强调，文件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并指出："如同你们所说的，这是你们的报复行为。你们这样干是出自仇恨、恐惧和私利！为了除掉一个危险的对手，你们不择任何手段。"① 事实证明，文件的炮制者茹尔·塔什罗是反动派豢养的无耻文痞，此人在七月王朝期间曾担任过塞纳省政府的秘书长。二月革命后，他在马拉斯特② 和加尔涅-帕热斯③ 的卵翼下，翻阅了警察局的秘密档案。他根据"四季社"中的一名叛徒拉米厄森的招供和给警察局送的各种报告，串编成了这一假材料，其目的显然是要使布朗基威信扫地。至于巴尔贝斯，他完全出于嫉妒布朗基的领导能力和为了满足自己的领袖欲望，因而不顾事实肆意给布朗基抹黑。关于他们之间的纠纷，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一文

---

① 《布朗基全集》，第一卷，184页。

② 阿尔芒·马拉斯特（1801—1852年），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领袖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

③ 加尔涅-帕热斯（1803—1878年），临时政府成员，曾任巴黎市长和财政部长。

中曾公正地指出："长期以来巴尔贝斯和布朗基一直在相互争夺对革命法国的真正的领导权。巴尔贝斯不断地污蔑布朗基，指责他勾结政府，借以破坏他的声誉。"①

反动派的诽谤没有能够动摇布朗基在工人中的威望。但是，随着制宪议会的选举、临时政府的解散和五人执行委员会的成立，资产阶级右翼巩固了自己的阵地，他们企图迫使无产阶级在劣势情况下进行决战。为了抗议国民议会和五人执行委员会的倒行逆施，十五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代表冲进了国民议会。布朗基利用了国民议会的讲坛呼吁解决社会问题，要求给工人面包和工作。五人执行委员会终于凶相毕露，下令军队以武力驱散了群众，悍然逮捕了布朗基等人。当巴黎无产阶级在没有自己领袖的情况下，举行绝望的六月起义时，布朗基正囚禁在文森监狱，他听见战斗的枪炮声，但只能坐视革命即将遭受到的又一次失败。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② 这是马克思对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总结。六月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革命的失败表明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敌对阶级，也暴露了路易·勃朗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对于工人运动有多大的危害。1849 年 4 月，布朗基被布尔日高等法院判处了十年徒刑，而路易·勃朗却渡海去了英国。当布朗基在杜朗和贝尔岛监狱受尽苦难的时候，路易·勃朗又在伦敦大放厥词，继续侈谈阶级合作。1851 年 2 月 24 日，以路易·勃朗为首的一部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和以巴特尔米③ 为首的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共同决定，利用纪念二月革命三周年的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55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418 页。

③ 艾曼纽尔·巴特尔米（约 1813—1855），伦敦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负责人之一。

会，邀请各国流亡者举行一次国际性聚会，即所谓"平等者宴会"。会前，巴特尔米请求布朗基为这次纪念活动撰写一篇献词。布朗基对于巴特尔米自作主张地和路易·勃朗混在一起很不满意，为了教育在伦敦的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他在献词中淋漓尽致地斥责了包括路易·勃朗在内的原临时政府全体成员，说他们是"把人民出卖给反动派的叛徒"，"愿工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可恶的人的名单；如果即使有一个名字，是的，即使有一个名字将来列入革命政府，那就让全体工人一起高喊：'叛变！'"① 这篇献词对路易·勃朗无疑是当头一棒。因此，宴会的组织者故意压下了这篇献词，不让与会者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特意把这篇敌友分明的献词译成英文和德文，并广为散发，以揭露路易·勃朗的叛徒面目。布朗基本人也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当有人批评他言辞过激时，他反驳说，据了解，献词获得了"无产者的鼓掌"，"我不企求其它的选票"②。

贝尔岛的囚禁生活是布朗基一生中时间最长和最沉闷的一次，他在那里整整耽了七年之久。从狱外不断传来坏消息：法国革命形势日趋低落；拿破仑第三利用了各阶层的不满情绪，轻易地爬上了总统的宝座，不动干戈就举行了一次政变，当了皇帝。在狱中，除了恶劣的待遇，还有巴尔贝斯一伙处处同他作对。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关节炎和官能性疼痛越来越严重。他的唯一安慰是七十岁老母的探监，但是每次见面又使他心酸。他何等渴望自由，何等怀念火热的战斗生活。在母亲索菲的帮助下，他和一位难友于1853年4月侥幸逃出了牢房，但他们只呼吸了一天的自由空气，又因人告密而被抓了回来。后来，他又被转送到科西嘉岛的克罗特监狱和阿尔及利亚的马斯卡拉监狱，直到1859年8月才由于大赦而释放。这时，他已经被关押了十一年多，超过了十年的徒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631页。

② 转引自萨缪尔·伯恩斯坦：《奥古斯特·布朗基》，213页。

期。

布朗基出狱后回到巴黎，首都的沉闷空气使他十分难过。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比以往更加恶劣，但工人们却默默地忍受着剥削和压迫。相反，部分工人还寄希望于拿破仑第三，企图依靠帝国政府的"开明政策"来改善自己的命运。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钻进"象牙之塔"，借以追求个人的功名；他们对政治生活感到厌倦了。波拿巴的警察统治使舆论窒息了。由于害怕告密，人们在公共场所不敢议论政治。布朗基感慨地说："虽然还有个别革命者的存在，但革命党是无影无踪了"①。然而，他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他说："革命不是自动发生的，它是人们努力的结果"②。他到英国和比利时作了短暂逗留，又去法国各地旅行。警察当局始终严密监视着他。1861 年，布朗基筹划出版一个地下刊物，但是计划还没有实现，波拿巴反动政府就于 3 月 20 日以组织秘密团体的罪名把他逮捕，投入马扎斯监狱；同年夏天，他被判处四年徒刑，关押在圣泊拉惹监狱。

由于革命处于低潮，布朗基在狱外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能够联系上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人们往往避开他，免得惹是生非，引起警察的怀疑。在圣泊拉惹监狱里，他却遇到了许多热情、坚定的青年革命者。这些青年人虽然具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但在仇恨第二帝国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钦佩布朗基为革命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定精神，尊敬而亲切地称他为"老头"。更重要的是，以他为首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团体，他们后来成了布朗基派的骨干力量。圣泊拉惹一年半的监狱生活再次严重损害了布朗基的健康，他被送进奈克尔医院治疗。在养病过程中，他利用许多人来探病的机会，指挥狱外的布朗基主义者加强组织和扩大宣传。

① 转引自萨缪尔·伯恩斯坦：《奥古斯特·布朗基》，239页。

② 同上，240 页。

正是在这个时期，布朗基主义才真正成为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派别。

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这期间对布朗基十分关心，而布朗基对马克思也深为感激。1861年5月8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里谈到："布朗基还被关在马扎斯监狱(巴黎)，在那里根据侦查员的指令，他在肉体上遭到宪兵等的残酷折磨。他是利用大赦的机会，以一个商人代办的身分从这里去巴黎的，毫无阴谋计划可言。"① 同年6月1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布朗基本人通过德农维尔，非常热情地感谢我和德国无产阶级党（在国外的）对他的同情。我们同法国最极端的党重新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认为这非常好。"② 接着，11月10日，马克思在给瓦托医生(化名德农维尔)的信中给予了布朗基最高的评价，他说："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的命运。"③

1865年8月，布朗基经人营救，化装逃出了奈克尔医院，来到布鲁塞尔的瓦托医生家里养病。那时，第二帝国正日趋没落。路易·波拿巴对外的穷兵黩武政策造成国库空虚，人民怨声载道，墨西哥远征的失利更激起舆论界的普遍不满。在国内，大规模兴建市政工程虽然一度缓和了工人的失业问题，但是劳动者非但没有增加收入，反而由于物价上涨而生活下降。客观的革命大好形势正在形成。布朗基在比利时从事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一支精干而坚强的队伍。这支队伍在素质上与过去的密谋团体已大不相同，他们多数是同工人接近的大学生，热情奔放，意志坚强，具有牺牲精神，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并且对布朗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598页。

② 同上，178页。

③ 同上，612页。

具有不可动摇的信仰。其中特别是特里东、爱德、里果、瓦扬等人后来在巴黎公社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朗基这一阶段的努力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公社起义训练了干部。

与此同时，布朗基在这阶段(1865—1870年)用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他把他妻子苏珊-阿梅丽的名字缩写成苏萨梅尔作为笔名，在特里东主办的《老实人报》撰写了许多重要理论文章。这些论文后来由他的门生格朗热收集整理，于1885年出版，题名为《社会批判》。这部两卷集可认为是布朗基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著作中包括的文章都是布朗基的随笔，或者用布朗基自己的话来说，是"有关社会问题的一系列见解"①，因而读起来显得不太连贯。此外，应该承认，布朗基不是一位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方案。"②

布朗基的经济观点是肤浅的。他读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对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十分赞赏③，但这并没有使他避免犯和蒲鲁东相同的错误。他给资本下的定义是"被盗窃的劳动"④，是"从高利贷的成千上万的阴沟里吸取出来的金钱"⑤。他看不到资本的秘密在于剥削他人的剩余价值，他在承认资本的剥削的同时，更加强调资本的统治和压迫，因而认为资本家是通过不合理的税

---

① 转引自莫里斯·多芒热：《奥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588页。

③ 1869年5月，拉法格写信告诉马克思，布朗基有一本《哲学的贫困》，"他把它借给自己所有的朋友们阅读……他对摩尔收拾蒲鲁东很高兴。布朗基对你们极为敬重"。——参见《"资本论"书信集》，289—290页。

④ 转引自莫里斯·多芒热：《奥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76页。

⑤ 同上。

收制度而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由此可见，布朗基对资本的认识和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那句名言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归根结底，他象蒲鲁东一样，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观察资本，把剥削的罪恶归结于高利贷和税收制度。

和许多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学派相比较，布朗基的社会主义观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他从不离开国家问题而侈谈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首先由工人夺取政权，并且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阶级实行专政。他指出：“一旦把塞在工人嘴里的布取出来，就要把它塞进资本家的嘴里去。如果在1848年实行一年的巴黎专政，就可以使法国和历史免遭二十五年的压迫。即使专政需要搞十年，那也不应当动摇。”① 另方面，他对未来社会的远景却避免提出任何设想，他说：“让我们管好今天的事吧。明天不属于我们，明天与我们无关。我们唯一的职责是为明天的组织工作准备好材料。其余的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② 但是，他又认为，共产主义的到来主要靠文化水平的提高，他指出：“共产主义必定而且只能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产生”③。

在哲学思想方面，布朗基的主要特征是无神论和机械唯物主义。他对宗教的批判充满着冷嘲热讽，尖刻而又锐利，他说：“宗教是企图解释一切，但又无法解释一切，并阻碍解释一切的一个词。这个词把无知装作有识，从而使懒惰和傲慢得到满足”④。他还有一句名言，说“宗教是无知、剥削和贫困的唯一源泉”⑤，从而把对宗教的批判和对剥削制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他也反

---

① 转引自莫里斯·多芒热：《奥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171页。

② 同上，137页。

③ 转引自罗热·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国源泉》，257页。

④ 同上，264页。

⑤ 同上。

对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实证主义所推崇的“新宗教”，认为这是“进步伪装下的倒退”，并指出这种“新宗教”的共同特点是“离开革命、摒弃革命、辱骂革命和仇视革命”①。布朗基继承了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发展观，认为人类不断地朝着正义和平等的高级形式发展，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必然趋势。他还强调物质利益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并问道：“群众开枪和起义，如果不是为了利益，还能是为什么呢？难道观念、原则不始终是利益的代表吗？”②

但是，布朗基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其突出表现就是他的英雄史观。他夸大了少数“优秀人物”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贬低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他看来，普通工人在贫困的压迫下往往只顾眼前的物质利益；他们在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毒害下往往容易受骗；他们由于缺乏组织而始终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因此，必须有一些有事业心、有头脑和有纪律的优秀分子来领导他们；而他所说的优秀分子无非是一些倾向于冒险和盲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上所述，布朗基比较安静地从事写作的时间只有五年。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在等待着他。1870 年，处于内外交困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府，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企图通过战争来寻找出路。同年 7 月 19 日，在普鲁士和法国的统治者都需要战争的情况下，战争终于爆发了。8 月 9 日，拿破仑第三率领的军队在连续三次会战中都被打败了。布朗基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夜动身，徒步越过法比边界，于 8 月 12 日匆忙赶到巴黎。

8 月 14 日，几百名布朗基主义者在拉维叶脱林荫道袭击了消防队营地，但由于得不到群众的响应而自动解散。事先，布朗基估

---

① 转引自罗热·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国源泉》，268 页。

② 同上，270 页。

计到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他还是参加并领导了这次行动。他认为自己作为首领，应该作出勇敢的榜样，因而甘愿冒险而决不后退。

9月7日，布朗基创办了《祖国在危急中报》，到12月8日停刊为止，共出了八十九期。当时的形势是：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战败投降，资产阶级组织了国防政府，普鲁士兵临巴黎城下，法国工人阶级处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复杂形势之下。面对这一局势，布朗基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社评。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揭露、愤怒的斥责，象利剑一般直刺敌人的心脏。在布朗基犀利的笔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梯也尔、特洛胥等卖国贼假抗战真投降的狰狞面目。为了抵抗普鲁士入侵者，布朗基在他的社评中，从战略、战术、武器、编制等各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对普军军事动向的某些预见性分析同恩格斯当时给《派尔-麦尔新闻》所写的《军事短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布朗基对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痛苦十分关切，他几乎绝望地高喊："光明呀！不在这黑暗中找到光明，我们就将在黑暗中死去！"这一激昂悲壮的呼声代表着将近五十万巴黎工人的悲愤心情，而巴黎公社的起义正是这种感情的火山般的爆发。但是，必须指出，布朗基的这些社评也暴露了他的某些缺点。例如，他看不到群众的力量，把群众说成是"一群惊恐四散的羔羊"。此外，他还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所有这些社评由他的门徒卡西米尔·布依收集在一起，在巴黎公社期间出版，书名为《祖国在危急中》。

在这个时期，布朗基除了办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参与了十月三十一日事件。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他在《祖国在危急中报》的社评中作了详尽的介绍。那天下午，布朗基在家里得到通知：群众攻占了市政厅，并扣押了国防政府的成员，他已当选为新政府的成员。布朗基赶到市政厅后，力图克服当时的混乱状态，接连签署了

大约二十个命令。他指示立即调集一些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来保证市政厅的安全，把留在市政厅内的资产阶级营队赶出去。可惜，他的这些命令没有被很好执行。因此，当新政府的成员们正在为起草纲领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忠于国防政府的部队不仅包围了市政厅，而且有一部分已拥进了大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立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起义者方面同意释放扣押的国防政府成员，国防政府则许诺迅速举行巴黎公社的选举，并对起义者不予追究。十月三十一日事件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一次预演，它的失败表明，内部的意见分歧是巴黎革命派的致命弱点，它消耗和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因而丢失了已经到手的胜利。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夺得了政权。在这新旧交替和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有一位经验丰富和享有威望的强有力人物来总理一切。在当时，从各方面来看，布朗基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不幸的是，布朗基在前一天（3月17日）被梯也尔政府在波尔多附近逮捕了。为了营救自己的领袖，公社曾多次与凡尔赛进行谈判，建议用巴黎大主教等七十四名人质换取布朗基一人。梯也尔顽固地拒绝了公社的要求，因为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①。因此，在整个巴黎公社期间，布朗基虽然当选为公社的委员，却被秘密关押在“斗牛”堡垒，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凡尔赛当局下了命令，不准布朗基与任何人谈话，如发现他企图越狱就立即枪杀。

公社失败后，1872年2月，军事法庭以布朗基参与十月三十一日事件为借口（尽管国防政府曾有“不予追究”的许诺），对这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97页。

六十七岁的老人判以死刑，后来又改判为无期徒刑。

到了1879年，布朗基在克列尔沃监狱已关押了七年时间，他重病缠身，经常连续数月卧床不起，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政府，始终把他视为洪水猛兽，不顾舆论界的呼吁，一再拒绝给予赦免。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怀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于同年4月在波尔多市把身在狱中的布朗基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他的议员资格虽然被宣布无效，但政府也只好把这位深孚众望的政治犯释放出来。

就在布朗基出狱的第二天，保尔·拉法格从伦敦托人给布朗基带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正当我们迫切需要有人创建无产阶级的政党，进而夺取政权的时候，您冲破了黑暗，站立在我们的面前……1848年前，人们还沉缅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梦想之中，您已经光荣地宣告了阶级斗争，今天，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您再次出来充当我们的旗手……公民，您的生命对我们太宝贵了，我们不能不首先关心它……如果您能和我们一起生活几个星期，我的夫人和我将不胜愉快……始终以极大的关切注视着您的全部政治经历的马克思希望有幸同您认识。"① 鉴于保尔·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这封信又以"我们"的口气出现，人们有理由认为，信中对布朗基的赞扬代表了马克思的意见。

布朗基生命中的最后十八个月也是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度过的。他没有接受拉法格邀请他去伦敦休养的建议，而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在波尔多、马赛、尼斯、里昂等十来个南方城市作了一次长途的巡回旅行。他到处发表演说，呼吁对巴黎公社的老战士实行大赦。他在巴黎创办了《无上帝无主人报》，又不顾疲劳，参加各种公

① 转引自莫里斯·多芒热：《第三共和国初期的奥古斯特·布朗基》，71—72页。

众集会。直到1880年12月27日，他应邀参加一次工人集会，发表即席讲话，他表示："红旗是我为之奋斗终生的旗帜。你们不会同意我在我的晚年抛弃这面旗帜。"① 没有想到，这篇感人肺腑的讲话竟成了他的最后的遗言。集会结束后，布朗基回到意大利林荫道（今奥古斯特·布朗基林荫道）的寓所，已是凌晨两点钟了。他没有丝毫睡意，还同他的门徒格朗热谈论集会的情形。突然，他站立不住，摇晃了几下，倒在地上。中风使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五天以后，1881年1月1日晚9时13分，布朗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成千上万的工人 学生和革命者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前来向烈士的遗体告别。在三天时间里，人流不断涌向五层楼上那间简朴的卧室，卧室里堆满了花束、花环和鲜花。革命诗人欧仁·鲍狄埃用他不朽的诗篇记录了这一感人的情景：

"他的遗体躺在五层楼的那间屋子里；
人群沿着楼梯慢步向上走去；
他们，这些身穿工作服的巴黎劳工，
带着妻子儿女，脸色苍白，哀思万重。
啊，这位至高无上的上帝，
他的去世使人们茶饭无味；
三天来，朋友们纷纷来到这里，
我站在楼梯口，无限怅惘，等着向他告别。"②

1月5日，二十万人陪同布朗基的灵车来到贝尔-拉雪兹公墓。公社的老战士路易丝·米歇尔作了墓前演说，她说："他的精神和榜样，是他为我们争取胜利留下的武器。埋葬在这墓穴中的伟人将以他的光辉形象，带领我们去迎接社会革命的到来。"③

① 转引自莫里斯·多芒热：《第三共和国初期的奥古斯特·布朗基》，141页。
② 同上，145页。
③ 同上，147—148页。

总括这位伟大革命战士的一生业绩，我们现在来看看，布朗基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可贵品德，他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曾经起过什么积极作用，以及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

布朗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点，无疑是他坚毅的性格。他曾两次被判死刑，十五次被逮捕，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但这些痛苦的经历丝毫没有磨损这位革命者的锐气。他之所以忍受得了种种无情的打击、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侮辱，是因为他具有对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因为他具有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和对事业的必胜信心。布朗基的战斗历程，是当年法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历程，他的意志和理想是当年法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和理想。在布朗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称之为具有"冲天"革命精神的巴黎工人的形象。每当斗争遭到挫折的时候，布朗基总是对他的门徒们说："好吧，我们得整顿一下，重新再干。"① 在狱中，他横眉冷对敌人的虚情假意，宁肯把牢底坐穿，也拒不接受路易-菲力浦的"赦免"。这种忠于革命理想，为人民忍受苦难的牺牲精神是何等崇高和何等感人啊！

此外，布朗基的主张，在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体系和流派中，表现出了彻底的革命性。的确，在从 1848 年革命到巴黎公社起义这个阶段中，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包括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②，他们的代表人物，如比埃尔·勒鲁和维克多·孔西得朗（1808—1893年），一味鼓吹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因而已不再具有任何实践意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经过 1848 年革命实践的检验，已经表明自己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礼拜堂"的祭

① 转引自莫里斯·多芒热：《奥古斯特·布朗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4 页。

② 马克思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44页。

司①，是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他们的说教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削弱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导致巴黎工人在六月起义中遭到血腥屠杀的可悲后果。另一个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即蒲鲁东主义，也同样处心积虑地想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使劳动和资本结成同盟。虽然在巴黎公社起义过程中，不少蒲鲁东主义者（如欧仁·瓦尔兰）没有按照蒲鲁东的精神办事，而是根据他们革命的本能，积极投入了夺取政权的斗争，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蒲鲁东主义对于法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和以上各社会主义流派不同，布朗基始终坚决地反对阶级调和，主张阶级斗争，反对改良，主张革命，而且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要自己夺取政权。这一特点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因为在1871年前，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工人中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布朗基的旗帜就在客观上代表着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诚恳地指出布朗基主义的错误的同时，充分地肯定了它是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革命的派别。

我们承认布朗基所起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位革命家的弱点和错误，而这些弱点和错误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首先是布朗基只具有革命的本能，却没有革命的理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布朗基曾写下了为数不少的著述；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社会批判》和《祖国在危急中》两书外，大量的文稿、书信和演说至今还存放在法国国立图书馆里。作为作家，布朗基的文笔犀利有力，真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尤其他对宗教的批判，充满着辛辣的讽刺和揭露，不乏脍炙人口的妙言快语。但是，他在理论分析上往往是肤浅、粗糙、混乱和缺乏系统。布朗基的这一弱点反映着十

① 马克思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401页。

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工人阶级刚刚从自发阶段走上自觉阶段这一客观历史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1874年在《流亡者文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①

但是，对布朗基说来，要害还不在这里。他的最关键的错误在于他的英雄史观。他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但却看不到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领导革命，而只能等待或跟着少数知识分子实干家去建立丰功伟绩。他在《祖国在危急中》一书中甚至把群众比作落进深渊的羔羊，谁出于同情心而去营救他们，这些羔羊就会从谁的身上践踏过去。这种鄙视群众的错误观点使布朗基的许多次革命行动因脱离群众而遭致失败。与这一错误相联系，布朗基把少数优秀分子看作历史的创造者，认为即使革命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只要少数优秀分子有了准备，也可以发动胜利的革命。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倾向在小资产阶级比较广大的国家里，是容易发生的。就法国而言，直到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尽管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法国在经济上主要地还是个农业国家；在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由于落后和分散的手工业方式还占着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习惯和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市场。布朗基的盲动和冒险倾向正说明了他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深刻烙印。

作为历史人物，我们对于布朗基的以上缺点错误是不能苛责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布朗基的精神遗产时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批判他的这些错误，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作为今天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借鉴。

（顾　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589页。